

山東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三輯

山東省政协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山東人民出版社

D350.97
48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济南

本 辑 编 审 人 员

李 志 陈 登 曦
弓 健 行 范 解 人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济南市中袁东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65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 11099·343

ISBN 7—209—00097—6

K·12 定价: 1.29 元

於本週入城 強化城中之軍事以運軍火 中共奪取麵粉
八百廿號 為分配給運軍火之機關之運貨
我方對上述事件真相調查結果以備 希即速告
據 俾得照信答覆是也

此致

敬禮

全

我們有責任

但我們早點有腳步。以後印

都 莊
董必武
十月廿一

注：此件是周恩來、董必武為解決黃河堵口問題所寫的親筆信件。

目 录

一场严峻的黄河归故斗争	段君毅(1)
花园口堵口始末回忆	陶述曾(38)
我对黄河归故谈判的片断回忆	王化云(92)
华东大学始末	余 修(99)
回忆抗日根据地的胶东公学	李芸生(122)
从八路军山东干部学校到抗大一分 校的回忆片断	孔福亭(142)
抗战初期的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 部聊城政治干部学校.....	许 法 邓愧余(164)
从复旦到山东师大	章 益(169)
和澄之同志共事的岁月	陶 钝(175)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伞兵	钟汉勋(179)

国民党伞兵三团起义的前前后后 钟汉勋(208)

吴佩孚的晚年生活 王振中(217)

国民党济南空军与宪兵的一
场冲突 黄 倜(224)

一场严峻的黄河归故斗争

段 君 毅

一、蒋军决堤花园口

洪水横流豫皖苏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密令，炸毁了黄河花园口河堤，霎时间滚滚洪水象猛兽一般地吞噬着沿岸300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蒋军的这次决堤放水，给沿河人民造成的损失，据国民党行政院对黄泛区灾情的不完全统计为：

一、淹没耕地面积：河南省450,553公顷；安徽省284,598公顷；江苏省109,108公顷，总计是844,259公顷。

二、逃亡人员：河南省逃离1,172,639人，死亡325,589人；安徽省逃离2,536,315人，死亡407,514人；江苏省逃离202,400人，死亡160,200人，总计逃离3,911,354人，死亡893,303人。

三、按动产与不动产计算，所受经济损失，以战前法币折人民币计算：河南省是19,328.5亿元；安徽省是25,265.8亿元；江苏省是3,210.3亿元，总计是47,806.5亿元。

四、按农业减产计算：河南省22,452.7亿元；安徽省18,104.6亿元；江苏省6,916.7亿元，总计减产47,474亿元。至于土地变异，河道淤积，水利设施破坏等项的损失，更是无法用金钱计算。

以上各项损失，仅财产及农业减收两项的统计，即达95,230.7亿元，与同一年度里全国发行的建设公债相比，超50%以上。

以上各项统计中说明，在日军大举犯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的关头，国民党政府密谋的花园口黄河决堤事件，给豫皖苏三省人民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严重损失！可是不料，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政府却又耍花招，提出要堵塞花园口口门。很明显，其用心是不良的。

二、国方要堵黄河口 震惊两岸百万人

抗战胜利，万众同乐。国民党政府为了独吞胜利果实，一面玩弄和谈烟幕，一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加紧准备打内战。冀鲁豫解放区地处陇海、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干线，背后是广大的晋察冀、太行、太岳解放区，也是刘邓大军所在地，东面与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相互配合；南面与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的中原野战军遥相呼应，黄河故道从其中心贯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政府对冀鲁豫解放区无时无刻不在虎视眈眈，他们要黄河归故、东流入海的企图，不言自明。

中共中央虽然深知黄河归故后会给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但为了照顾豫皖苏黄泛区人民的利益，并且考虑到黄水久注淮河，必致淮河淤淀，南泛长江，势将危及大半个中国。所以，中央通过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同志与

国民党会商，在不使下游发生水灾的条件下，原则上是赞成此举的。关键是要在复堤整险竣工后，才能堵口移河，否则，将会出现第二个更大的黄泛区。

所谓黄河故道，是经过八年战乱的故道。在八年抗战期间，黄河大堤很多堤段被日伪军作为进攻解放区的封锁沟、封锁墙，再加上风雨的侵蚀，损坏程度已达十分之三以上；两岸防险坝埝的砖石，大部被日伪军拆去修碉堡工事，更是破烂不堪；河床高出地面丈余，且淤沙大部变为沙丘，高者丈余，低者二三尺不等；黄河三角洲淤塞的面积达200余里，在洲上居住着十余万人民，建立了347个村庄，这里的土地大部分被开垦成良田。据统计冀鲁豫解放区沿河自长垣至齐河（缺长垣、考城、寿张三县统计），有813个村庄，307,457口人，426,899间房屋，1,426,249亩土地。其中新建村庄213个，62,070口人，79,691间房屋，396,248亩土地。山东渤海区沿河有347个村庄，105,630口人。因此，在黄河堵口之前，必须精细勘察，妥善修理堤坝与河道，更须对堤内人民予以妥善安置，方不致因黄水骤至而演出天痛人怨之惨剧。

整理黄河故道的工程是十分艰巨的，决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完成的。同时，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冀鲁豫解放区人民，也决无独立完成此项工程的能力。如果不复堤修坝整理险工，不迁移救济河床居民，就堵口放水，不仅故道内的居民村庄要惨遭黄水的浩劫，就连故道两岸的广大居民村庄，也将遭到黄水的灾难。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国民党政府却在解放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了堵口放水的部署。

1945年12月下旬，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下同）移驻开封，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做堵口放水

的筹备工作。

1946年1月11日，美籍水利工程师、黄委会工程顾问塔德等一行四人，突然由开封来菏泽，声言要勘察黄河故道。冀鲁豫行署给予热情接待，并派专人领其至临濮集一带勘察了黄河故道的堤坝和河床。他们仅停留三天，便匆匆返回。不料，返回不久，国民党中央社便造出谣言，说：“由于中共之一再阻挠，迫使勘测工作无法顺利进行。”以此为他们不复堤整险制造借口。

1月22日上午九时，河南救济总署署长马杰召开救济灾区座谈会，联合国驻中国办事处主任范海宁（加拿大籍）专程到会致词。在他的致词中，只谈堵口如何重要，却闭口不谈下游复堤。

1月31日，国民党水利委员会、黄委会及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下同）豫分署，连日视察花园口口门情况，研究堵塞口门方案，计划建立堵口复堤工程局，分设冀鲁豫三个复堤工程处，并对工程款项、器材、工人食宿、卫生等做了详细的研究，大有即刻就叫口门合龙之势。

2月1日，水委会派遣工程师及技工偕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下同）驻该会工作的道特（美籍）前往河南泛区勘察，在泛区同胞中散布堵口言论，制造堵口气氛。

2月4日，国民党黄委会顾问王恢先，黄泛区复兴与建设协会常委易伯坚及社会处代表等在黄泛区举行座谈会。他们只谈对黄泛区居民的救济问题，却不谈对黄河故道居民救济的工作。

2月6日，联总中国业务处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该处

长奥斯德说：“黄河堵复计划最为重要，可使20万农民及其眷属重返昔遭泛滥之地。”企图在全国造成强大的堵口舆论。

2月中旬，在国民党水委会的领导下，成立了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简称堵复局，下同），赵守钰兼任局长，李钟鸣、潘镒芬任副局长。

2月16日下午三时，赵守钰在黄委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工程计划问题提出以下困难：一、中央核拨之工程款5亿元，中央银行不能一次提取。二、整修汛区堤防预算需费11亿元，尚未核准，以致无法动工。三、考城以下国、共军阻挠，测量工作无法进行，盼新闻界代向各界呼吁。要求疏通河道，修筑河堤，妥善救济和迁移沿河居民；吸收沿河群众代表与民主政府，组成统一的治河委员会，并筹移河大计。

3月1日，国民党政府不通知冀鲁豫解放区政府，指示堵复局在花园口正式开工堵口。以塔德为首的外籍工程技术人员带着桥梁材料、木船、汽船、推土机、开山机、钢轨、斗车、汽车、修理机械等投入了施工；行总派出工作队、卫生队；河南省政府组织了招工购料委员会；交通部彰洛段工程处赶修通往花园口的铁路专线；平汉铁路局拨出了赶运堵口器材的车皮。一时间，整个花园口堵口工地上，人来车往，机器轰鸣，一派忙乱不堪的景象。根据塔德的建议，国民党最高当局作出决定，花园口堵口工程6月底以前完成口门合龙的任务。

国民党抢先堵口的消息传出后，冀鲁豫解放区沿河各县群众无不震惊万分，纷纷向各级民主政府请愿，反对国民党不复堤就堵口的做法。为此，冀鲁豫行署认为：国民党既要在花园口堵口，位于黄河下游的解放区必须得做好思想上、组织上、人力上、物力上等方面的工作，准备黄河水回归故道。于是冀鲁

豫行署通令沿河各县，要立即调查黄河故道居民新辟耕田、林地，所建新村房屋、户口材料，以及堤坝破坏情形等，动员群众反对国民党利用黄河归故嫁祸解放区的做法。

2月中旬，中共中央来电指示：“黄河归故，华北、华中利弊各异。但归故意见全国占优势，我们无法反对。此事与我解放区关系极大，我们拟提出参加水利委员会、黄委会、治河工程局，以便了解真相，保护人民利益。”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冀鲁豫行署决定，除在群众中宣布国民党要改河归故的消息外，并就如何使群众的损失得到赔偿，应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什么条件，什么要求，如何参加治河机构等问题，通知全区各级组织，加以认真研究和对待。

2月22日，冀鲁豫解放区政府为了确保自己对治理黄河的领导权力，决定在菏泽成立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以王化云同志为主任委员（据《冀鲁豫日报》1946年3月7日第二版报道：“在冀鲁豫区设立治河委员会……徐达本兼任该会主任委员”），并于沿河各专、县分别设立黄河修防处及修防段，作为治黄的专门机构，具体的组织与推动修堤整险工作。

2月27日，冀鲁豫行署又作出决定：在行署和一、二、四、五专署以及沿河各县立即成立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迅速清查河道历次决口的时间、地点、流经区域、受灾面积、修复时间、工程耗费、目前河滩土地面积、村庄、人口、林木数目、河道淤塞情况，堤内外地势高低及堤坝破坏情形，并收集群众对黄河归故的意见，做到有准备、有对策，以便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防止河水突然到来。于是，沿河各县的党、政、军、民在冀鲁豫区党委、行署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治理

黄河故道的紧张战斗。与此同时，沿河各人民团体、群众组织、进步人士，纷纷组织集会，发表谈话，游行示威，呼吁国民党政府要顾全民命。

沿河人民的正义呼声和正当要求，得到了国民党黄委会和堵复局大部分人员的同情。1946年3月3日，黄委会委员长兼堵复局局长赵守钰亲赴河南新乡市，会晤了正在进行军事调处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特使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融洽的气氛中，共同商谈了有关黄河堵口复堤问题。

3月23日，边区政府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决定派遣参议会副议长晁哲甫，冀鲁豫行署副主任贾心斋、参议会副主任赵明甫三同志，赴开封与国民党有关当局谈判黄河归故问题，从而揭开了黄河斗争的序幕。

三、国共同定开封协议

双方又聚菏泽古城

晋冀鲁豫边区代表晁哲甫、贾心斋、赵明甫三同志，肩负着沿河人民的生命大患，恨不得即刻就达开封，与国民党共商一个妥善解决黄河堵口复堤的办法。不料，他们在途经安阳时，却遭到国民党四十军的无理留难。一个佩带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议官衔，名叫李谊渲的人，明知三代表是专为解决黄河归故问题而来，却说什么“来的十分冒昧”，“共产党现在不合法”，并极力污蔑解放区军民。三代表极感气愤，给以正义的驳斥，使其理屈词穷无言可答。但是，他们还是处处设置障碍，不让赶赴开封。在这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贾心斋同志对国军这种鄙卑的行径，进行了当众指责：“我们此行，是

受边区数百万人民的重托，担负着沿河数十万居民生死攸关的责任，谁阻碍了我们这种为人民的神圣意志，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向其展开斗争！”接着又向其提出了严厉的书面质问和批评。到了第四日，赵守钰闻讯后，也感到分外生气，即刻派王恢先、孔令榕二人，用专车把三代表接到了开封。从此次事件中，人们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对黄河归故问题到底怀着什么样的用心。

三代表于1946年4月5日抵达开封，国民党黄委会、行总给予热情地迎接和招待。当日，赵守钰就主持召开了预备会议，商定谈判程序与谈判要点。次日，即开始了第一次会谈，各有关代表相继发言后，中共代表就关于黄河的实况，人民八年来所遭受敌祸灾荒的痛苦生活惨状，及其听到黄河归故消息后的惊慌情况，做了真实的报告，与会各代表无不表示深切的同情。

4月7日，国共双方就“先治河后堵口”、“解放区派代表参加治河组织”、“救济河床居民”三个问题进行了继续会谈。第一个问题，国方认为，水的季节性很大，如不早日下手，秋水泛滥将无法堵口。因此，协议认为：堵口与浚河、复堤并进，但堵口到一定程度即行停工，等待治河工竣。浚河、复堤未及全部完成前，绝不能最后堵口。

第二个问题双方协议：直接主办堵口、复堤工程的施工机构，应本着统一合作原则，双方参加人员协商办理。解放区工段由国方黄委会与解放区治河委员会双方组成施工机构，共同负责办理浚河、复堤、救济等事宜。

第三个问题曾引起争论。中共代表提出“河床居民迁移应由国家每人赔田地三亩，房屋一间，以维持最低生活”一项

后，国方认为：“河床土地是国家所有，政府不能给予赔偿。”此种说法，显系曲解是非，对人民疾苦不负责任的态度，没能获得多数代表的同意。经中共代表据实说明“国家从来也不可能购买过黄河河床土地”后，大家才一致认为：“河床内居民的迁移救济工作，自然是必要的。”第三个问题的协议是：一面由黄委会拟具预算，专案呈请政府核拨；一面由马（杰）署长、荷海宁分向行总、联总申请救济。

此次开封谈判，虽然不能满足人民的希望和要求，但是，总算获得了初步协议，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了我们的部分意见。

为进一步完善开封协议，了解河床居民状况及堤坝破坏情形，以决策浚河复堤的施工计划，国民党黄委会特组成黄河故道勘测团，在中共代表的陪同下，于4月8日由开封出发，沿黄河故道至海口，历时七天，途经17县，跋涉2,000余里，对黄河故道进行了较全面的勘察。一路上勘察团的团员们亲眼看到了千疮百孔的大堤，破坏惨重的大坝，故道内堆积的沙丘，林木掩映的村庄及河床内青青的庄稼苗；并亲耳听到了故道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先复堤，后堵口”的呼声。勘察团的人们均说：“黄河故道破坏情形超乎预料之外。”国民党黄委会委员长赵守钰说：“黄委会必须与解放区各方合作，中央（指国民党）也不应不顾民命。黄河治不好，是国家的耻辱。”他又说：“黄委会编造预算时，按事变前物价增加2,000倍，在郑州物价已增长6,000倍，可是中央只按增加800倍批准，真叫我管黄河的人做难。”他还说：“勘察团从开封出发时，有人劝告我‘给共产党联系麻烦会更多’，但事实是，解放区的群众有组织，政府能协助，工程一定能更快更易进行。”在利津县勘察时，该县参议长和副议长对赵守钰说：“本县老百姓都不愿叫黄河再回

来。”赵守钰在说明了黄河泛人民的悲惨生活后，表示意见说：“无论那里的老百姓都不应该被淹，黄河归故必须先修理河道和筑堤，保证不使这边的百姓受淹。”堵复局总工程师陶述曾向赶来请愿的群众表示说：“我是水利工程师，是叫黄河为人民造福的，不是叫黄河祸害人民的，不复堤，绝不堵口放水，如果蒋介石不听，我就辞职不干。”

黄河故道勘察团于4月15日返回菏泽。当日下午3时，我代表冀鲁豫行署设宴为勘察团洗尘。晚上7时在菏泽交际处又一次举行了黄河问题座谈会，参加人员有我和冀鲁豫行署的贾心斋、罗士高、赵明甫、成润、华夫等；国民党黄委会的赵守钰、陶述曾、左起彭、孔令榕、许瑞鳌等；渤海区的刘季青同志也参加了会谈。

在座谈会上，中共代表赵明甫同志首先根据开封会谈精神及勘察情形，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此次黄河归故系国民党政府有所计划，与黄河自然泛滥改道不同，应力求一劳永逸。根据勘察情况，浚理河道较为修堤修坝尤为重要，因此，必须于浚河复堤工程完竣后，方能合龙放水。第二，经此次勘察后，更感救济工作之艰巨。故道内新建村庄很多，救济问题应再慎重考虑，必须保证每人维持其适当生活。第三，冀鲁两省之黄河故道90%在解放区，为施工方便及增强工作效能，治黄各级组织，均须解放区政府参加领导及一切工作。后经6时30分钟的分项讨论，获得协议，概述如下：

一、明确决定浚河、复堤、修坝等工程完竣后再行合龙放水。堤线问题，除修补旧大堤外，鲁省南北两岸部分地区先修旧临黄堤，裁湾取直部分，得测量后再行决定。

二、施工机构问题，仍以开封决议之统一合作精神，双方

配备人选，具体人数俟双方请示上级后再决定。

三、迁移救济问题，河道内村庄之迁移，已确定概算标准，由黄委会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负责拨发迁移费，救济则代请行总、联总负责办理。

四、为施工方便，急须恢复之交通，应根据施工情形逐步修堤，但不得作为军事运用。

其他具体问题尚待继续商谈，但不得由此而拖延所有测量施工工作之进行。

菏泽协议，是一个比较公正的协议。它的成立，使解放区人民，因黄河归故而惶惶不安、疑虑焦急的心情，才稍觉有点宽慰。然而，在菏泽协议刚刚签定后的两天，治河形势又突趋严重，群众情绪又再度焦急不安起来。

四、陶述曾重定堵口计划

南京城国共再成协议

1946年4月17日，菏泽协议的墨迹未干，国民党中央社却发出了“黄河堵口复堤决定两月内同时完成”的消息。4月2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又在发出的一则消息中声称：“倘黄河汛前不克全部完成堵口工程，政府方面实不能负其全责。”接着，国民党所有的报纸在其中央社和《中央日报》的煽动下，也都异口同声地撒起谎来了，说什么“中共方握有雄厚之人力物力，有完善的组织，足以为两个月内把复堤修坝浚河工程，配合花园口堵口工程同时完成”。

从以上事实，人们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的黄河归故企图到底是什么。谁都知道，国民党在东北的内战正在继续扩大，

对中原野战军的围攻到了一触即发的阶段，在平汉、陇海、同蒲铁路线上，正紧张地进行着军事部署，长江沿岸苏皖地区军队的调动，也越来越加频繁，他们蓄谋已久的全面内战就要开始了，为此，国民党撕毁了菏泽、开封两协议的一切条款，加快步伐，抢时间堵口，阴谋以黄河归故分割解放区。

国民党政府两个月内完成堵口的决定，不但引起解放区全体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也引起国民党黄委会、堵复局内部，以总工程师陶述曾为首的大多数技术人员的不满。陶述曾认为，在下游堤防未修，河床居民未迁，秸料、石料运至堵口工地甚少的情況下，要两个月内完成花园口堵口，是决不可能的。因此，在赵守钰的支持同意下，就堵口计划问题，陶述曾与傲气十足的塔德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并果断地否定了塔德的堵口计划，停止了原计划的引河开挖工程，卸掉了打桩架，还准备放弃200米长的浅水占，留600米宽的口门浅水，以防河床刷深。陶述曾又根据对花园口口门的周密考查，制定了自己的堵口计划：

一、复堤工程和河槽裁湾取直工程本年11月底完成，加培堤工明年4月完成。

二、堵口工程大汛前仅做成西部浅水占800米，留下东部的深水工程到本年10月初复工，12月底完成，黄水于12月间回复故道。

三、利用已回故道的水道，运输沿河险工所需的石料，整理险工工程及修防备料明年6月底以前办完。

四、本年大汛前加强防泛新堤，开通涡河通泛水道，分泄洪水，减轻泛区灾情。

这是一个十分切实可行的施行计划，它既顾全了故道两岸

人民的利益，又减轻了泛区人民的灾难，所以，此施工计划上报后，得到了赵守钰和黄委会、堵复局的批准，解放区政府也表示同意。

1946年4月30日，国民党水委会委员长薛笃弼，带领一批水利专家，到花园口堵口工地视察工程，经过一番细致慎重的研究后，也批准了这一计划。可是，如此一个合情合理的施工计划，却遭到了塔德的坚决反对。当陶述曾刚一提出自己的施工计划，塔德就跑到上海，向联总中国分署告状，说什么“工程完成无问题（指两个月内堵口成功），只是黄委会（指国民党）不肯出力去做”。联总负责人根据塔德的报告，向行总提出威胁说：“如果黄河的工程不急进，就停止供应器材。”与此同时，塔德又从上海跑往南京，向国民党行政院长宋子文告了同样的状。这样就引起了联总、国民党行政院、行总对其水委会、黄委会、堵复局批准陶述曾施工计划的做法极为不满。

1946年5月1日，就是薛笃弼亲自批准陶述曾施工计划的第二天，薛正在一个堵口工程技术会议上称赞着陶述曾的施工计划之际，突然，他接到宋子文一封关于“堵复工程应依原定计划积极进行，未可展缓”的电报。宋子文在电报中指出：“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前经决定于本年枯水时期修复，兹闻黄河水利委员会据鲁豫两省河工局报告，以下游工程未能赶筑已定堵口工程缓至秋后举办，此事关系重要，未宜遽定缓修，且国际视听所系，仍应积极兴修。已电飭交通部迅速修筑未完工之铁路，准备列车，赶运潞王坟之石方前至工地。希速飭依照原定计划积极提前堵口，如有实际不能完成堵口时，届时可再延缓，此时未宜决定从缓也。”薛阅电后，当众推翻了自己前一天的决议和刚才的讲话内容，并宣布“本人的决议和讲话全不算

数，希诸位遵照宋院长的电报指示，依照原定计划，积极提前堵口。”

陶述曾的施工计划被否决了。堵口工程虽然依照塔德的原定计划在进行着，但是，绝大多数中国技术人员的情绪都大大低落下来，对宋子文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电报指示，产生了疑问。与此同时，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军事将领白崇禧、胡宗南、范汉杰等，也纷纷以“视察”“参观”的名义，赶到花园口工地，为加快堵口工程督促打气。1946年5月5日，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等在“视察”堵口工程时，亲口对薛笃弼、陶述曾讲“黄河归故，可抵十万大军”，有意指使黄委会、堵复局堵口放水，显系包藏着军事企图。

国民党政府这种不顾下游人民死活，决定两个月内完成堵口的片面意见，引起了解放区人民的坚决反对。他们到处呼吁，推选代表，组织请愿团，向国民党政府请愿。1946年5月3日，《冀鲁豫日报》发表社论，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忠实实践菏泽协议”。同日，冀鲁豫工农青妇联合总会和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冀鲁豫办事处，向全国各党派、团体、学校、报馆及全国同胞发出通电，吁请国民党政府“花园口堵口工程应立即暂行停止”，“对河床新旧村庄居民即刻发出救济”，“对河南新泛区同胞大力进行救济”。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将军也在这一日，特致函薛笃弼、赵守钰。函中说：“黄河之为祸为福，端赖河床之坚固与否，今即从早治理，深望以巩固安全为主旨，不应以军事交通之便利为急务……党派的政事是暂时的，人民的生存是永久的，究竟对人民负责，还是对少数党派负责？果真不浚河复堤而先堵口合龙，则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吾兄岂能脱卸责任？”

5月8日,《冀鲁豫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揭露国民党政府“最近津浦、陇海、平汉各线,国民党军运频繁,正在计划向豫北、津浦进行之大规模军事部署。蒋介石亲飞郑州、西安视察,白崇禧亲赴徐州、新乡巡视,并亲往花园口‘视察’黄河堵口工程,不难判断,国民党当局正在策划着一个巨大的军事阴谋,这个军事阴谋不是和堵口放水没有联系的,他们策划随黄水而来的是向解放区大举进犯,我们不能麻痹自己,阴谋毒辣流氓成性的国民党当局,是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干出来的。”社论要求解放区人民“不要对国民党存丝毫幻想,他们不会有什么仁慈怜悯,他们说话不当话,协议定了可以不执行,他们不会听从人民的意见,除非人民起来用力量把他们的阴谋打得粉碎的时候,才能逼他不得不向人民让步”。

5月10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认为,国民党政府“借治河为名,蓄意淹毙冀鲁豫三省同胞,而是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分不开的。中共对于千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决不能坐视不顾”。并声明“如果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不顾民命,首当其冲的冀鲁豫解放区人民,为了生存,将被迫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其后果应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

5月13日,冀鲁豫行署主任段君毅,副主任贾心斋,为民请命,致电全国,呼吁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堵口工程。电文称:“经开封磋商及黄委会勘察团之勘察,而有4月15日明确之决议,先浚河复堤后堵口之菏泽协议,此与目前国民党积极准备重挑内战有密切关系,两月堵口实是国民党向我冀鲁豫军事进攻之一部,如此种反动阴谋一旦实现,则全边区1200万人民将重罹内战与洪水之严重灾难。”电文恳求:“各民主政党、法团及各界政界人士为冀鲁豫边区1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共同采

取有效办法，制止国民党当局此种灭绝人性之阴谋毒计。本府决率领全区人民誓死力争菏泽协议之实现，倘国民党政府不幡然悔悟，本区人民不甘坐以待毙，决奋起自卫自救，情逼出此，不能沉默。”

鉴于菏泽协议有被国民党政府彻底撕毁的危险，5月15日，冀鲁豫解放区派遣赵明甫、王笑一两同志偕同联总河南区主任范海宁共同前往南京，期望在最高层解决问题。赵、王到达南京后，首先听取了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接着便与治黄各有关部门，各有关人士交换意见。各方人士均一致赞同应先复堤，治黄问题不应受任何军事政治影响。5月17日，在国民党行政院水委会，中共、联总、行总、水委会、黄委会、堵复局的代表赵明甫、王笑一、陶述曾、杨乃俊、顾恺、阎振兴、郭暄、李家琛、朱光彩、张季春等，正式开会商谈讨论复堤堵口问题。中共代表提出，堵口工程应即刻暂时停止，国方则表示，虽不合龙放水，但堵口工程仍应进行。由于双方争论激烈，未达成协议。

5月18日继续商谈堵口复堤问题。经过一番辩论后，在堵复局副局长工程师张季春的提议下，商定了一个折中方案：打桩继续进行，至于抛石与否，须待6月15日前，视下游工程进行情形，然后经双方协议决定。如决定抛石，亦以不超过2公尺为限。并以此折中方案为基础，获得如下协议：

一、关于复堤工程。甲、下游急要复堤工程，包括险工及局部整理河槽优先完成，同时规划全部工程衔接推进。乙、急要工程所需配合之器材及工粮，请行总、联总优先尽速供给。丙、急要工程所需工款，由水利委员会充分筹拨。丁、此项复堤工作争取于6月5日以前开工。戊、复堤工作关于技术方

面，由黄委会统一筹拨。施工事项在解放区区域以内地段，由解放区办理。

二、关于下游河道以内居民迁移救济问题，黄委会已呈请有案，请中央（指国民党）从速核定办理，俾能配合堵口复堤工程之需要。

三、堵口工程继续进行，以不使下游发生水害为原则。

中共对此提出了保留意见：大汛前打桩抛石以不超出河底二公尺为限，但须：子、不受任何军事政治影响。丑、新汴铁路、公路暂不拆除，不挖引河。寅、由晋冀鲁豫边区代表团派工程师驻花园口密切联系。

同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志与联总负责人福克兰芮及堵复局顾问塔德，关于黄河问题亦获得如下口头协议：

一、下游复堤浚河应克服一切困难，从速开始。

二、关于工程所需要之一切器材工粮，由联总、行总供给，不应受任何军事政治影响。

三、行总为办理器材物资之供应事项，在菏泽设立办事处，由中共代表参加。

四、关于下游河道内居民迁徙之救济。由三方（中共、国民党、联总）组成委员会，负责处理。

五、在6月15日以前，花园口以下故道不挖引河，新汴铁路及公路不得拆除，至6月15日，视下游工程情形，经双方协议后始得改变之。

六、打桩继续进行，至于抛石与否，须得6月13日前，视工程进行情形，然后经双方协议决定。如决定抛石，亦以不超过河底二公尺为限，以上两条所说下游工程进行情形，以不使下游发生水害为原则。

以上两项决议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特使马歇尔，国民党水委会委员长薛笃弼再三磋商后制定的，并由三人确保执行，所以三方代表均异常高兴。

三方代表由南京回到开封后，又开会商定，第一批工款100亿元，面粉6000吨，于最近运抵菏泽、惠民。并且又商谈了急要工程施工程序，第一期至7月20日完成，第二期至12月前完成。

中共代表对此次南京两项协议的成立，感慨地说：“这是解放区人民据理力争及顾全大局的结果，也是双方互信互让的结果。”

五、国方拖欠修堤粮款

上海谈判供给方案

为了忠实执行南京谈判制定的两项治河协议，中共代表返回解放区的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5月26日，冀鲁豫行署便即刻做出决定，命令“沿河各县府应立即动员组织群众即日开工”。次日，全区就有113000余人奔赴工地，修补堤坝。

6月4日，行署召开了各修防处、段长联席会议，明确规定，自6月10日起，沿河18个县，要动员23万群众，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复堤工程。解放区人民要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忠实地执行南京协议。

时值麦收大忙季节，解放区的23万人民自愿献砖献石、献物献料，自备工具，自带食粮，自筹款项，头顶着烈日的曝晒，艰苦奋战在千里黄河大堤上。车声，人声，打碓的歌声，控诉国民党抢先堵口的怒吼声，响彻故道上空。可是在国民党

统治区的考城、长垣以上的黄河堤岸上，依旧是冷冷清清，不见一人一车上工修堤。6月20日，塔德与张季春等来解放区视察复堤情况。塔德对复堤工作表示满意，张季春则加以评论说，解放区“执行（治河协议）百分之百，联总执行一半，国民党政府则等于零。”

在解放区，一个轰轰烈烈地整修黄河堤岸的高潮已经形成了。但是，国民党政府对于南京协议明确规定的“工程所需之器材工粮，优先尽速供给筹拨”条款，却置之不理。截至6月12日，只运到汽车4部，仪器两套（均破烂不堪），面粉100吨（仅够民工一顿饭之用），这使解放区人民对国民党政府执行南京协议还有没有点诚意，不得不表示怀疑与焦虑。因之，冀鲁豫行署坚决要求国民党政府、联总、行总将工程所需之器材、工粮及时迅速运来，技术测量人员亦应立即派来，否则会使整个工程无法进行，复堤计划将遭受破坏。可是国民党政府对于解放区的正当要求，依然不予理睬。冀鲁豫行署迫于无奈，于6月14日，又派遣赵明甫等五人，再赴开封、南京两地，与国民党政府商谈是否继续堵口工程的问题。同时，来解放区视察黄河故道新村的联总救济专家罗惠士，联总驻冀鲁豫办事处主任彭安杰及韩森三人，亲见修堤群众粮款困难，气愤地说：“我们要去南京，督促坐在大办公桌上的先生们。”于是便同赵明甫一行共赴南京，与国民党政府商谈关于迅速拨发工款、工粮、器材及迁移费、救济费等问题。然而，国民党政府的大员们照旧相互推诿，不予解决。为此，《冀鲁豫日报》6月18日发表了《救济二十三万修堤工人》的短论。短论指出：“由于工粮、工款（国民党政府）没有拨下，工人饮食恶劣，加以工具缺乏，工作繁重，工人体力劳动过度，再由于工

人没有帐篷休息，日晒夜露，致工人疾病累累。”我们“要求国民党政府要执行南京协议，保证物资供给，立即拨发工粮工款及器材，要求联总、行总救济患病工人的急需救济药品与医生”。

解放区人民因缺少食粮，缺少药品，修堤工程就要被迫停止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却按塔德的原施工计划，加紧了堵口工程。从5月20日深水打桩开始，至6月21日全部造桥工程即告完成，桥面铁路通车，并开始运石抛石，直接违背了南京协议中“至于抛石与否，须待6月15日前，视下游工程进行情形，然后经双方协议决定”的条款，在如此情形下，解放区政府发出了急电，呼吁南京政府“必须暂停堵口工程，立即停止挖引河，拆除汴新铁路”。

正当国民党政府对堵口工程加紧运石、抛石之际，不料天不作美，河水日益上涨。6月26日，北风大作，大溜顶撞桥桩、桥身为之动摇。次日，大溜更加凶猛，冲去四排桥桩，折断了桥身，此后虽经多方抢救，终因洪水过大过猛，塔德的堵口计划宣告失败，赵守钰、陶述曾一气之下，分别辞掉了堵复局局长、总工程师的职务。由朱光彩继任局长之职。随即，国民党政府又作出决定，放弃旧桥，在下游另修新桥，作为二坝，继续打桩，继续做防护东西坝工程。

国民党政府对堵口工程如此拚力赶进，但是，对解放区人民所需工粮工款却一拖再拖，迟迟不予拨付，至7月初，解放区复堤工款已用去80亿元，国民党政府才拨付40亿复堤元，且尚未送至工地。更为残忍的是，国民党政府还经常派遣武装特务和军队，潜入复堤工地，抓人抢劫，枪杀干部群众。6月14日晨，济南国民党武装特务11人，在长清县8区小

燕庄，惨杀了该县修防段长张兴保等7位治河干部。驻长垣县蒋军七十四旅，自6月14日起，连日抢劫修堤工人的烧柴、粮食、衣物多起，抓捕枪杀修堤干部群众多人。国民党长垣三区区区长憨贯德，在7月18日5个乡乡长会议上，凶狠地说：“谁修堤，国军来了，杀他个鸡犬不留。”在此严重情形下，1946年7月1日，冀鲁豫行署及各机关团体，打电报给周恩来、马歇尔、薛笃弼等。电文称：“今工款、工料、器材尚未拨付，考城国军及济南何思源派遣军队、特务、捕杀我工人、村干及修防人员”，致使我复堤工作无法进行，“其目的不在治河，而在配合国民党反动派正准备之大规模内战”，并“希诸先生急派三人小组来汴，监督执行南京协议”。同时，行署主任段君毅也向全区人民发出了“自卫自救”的号召。

1946年7月11日下午4时，中共代表董必武同志在上海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如实报告了解放区所得救济实物后，又告诉记者说：“最近政府（指国民党）方面，更不经协议，亲自挖了引河，准备在花园口待机放水。当此复堤工程尚未完成，工款未发，故道居民未移情况下，如擅自放水，势必造成大祸，此责应由政府方面全负。”

为了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7月18日，以周恩来同志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伍云甫、成润、章文晋、王笑一与国民党行署总长蒋廷黻、水委会委员长薛笃弼、堵复局代表张季春及联总代表福兰克芮、塔德等，在上海进行了谈判。上午，周恩来、成润、蒋廷黻、薛笃弼、塔德、福兰克芮、张季春先后发言，阐述了各自的看法。虽然各方代表都同意了“自堵口以下修堤所需工款与材料费用完全由国民政府供给”的原则，但是，塔德、张季春通过实地勘察，估计解放区复堤包括已用和

将用的款100亿元，薛笃弼却不如期支付，提出“获得国库款项可能较迟”和“数额可能被行政院核减”两条意见。

周恩来同志当即指出：“如既往同意付款之工程今已完成，国民政府应立即履行其协定中之责任而付款。”他请在记录中明白表示：“对工程师们核定工程的正当用费之核减可能性，不能同意。”“如不能偿付金额，即系政府及其代表之失信行为。”

下午，对复堤用粮、设备和河床居民之补偿等问题进行了协商，特别是对救济河床居民问题作了反复辩论。中共方面提出，河床居民救济费最低限度应为304亿元。蒋廷黻认为这个数额“实属过巨，远非行总之财力所能及”，只同意“于8月中请求拨款30亿元，9月请求拨款30亿元，10月请求拨款20亿元，然后再视该区（指解放区）是否尚需救济资金而再作决定。”

周恩来同志认为，“共区代表自始即坚持此一问题之重要，如无照顾受害人民之保证，渠等最初即不能同意黄河之改归故道。”周恩来同志还指出，解放区“人民对此问题曾详加研究而得出此304亿之数字，吾人在此会谈既远离该区，又未熟悉当地实情，不宜将此数字削减。”蒋廷黻看到中共态度比较强硬，又提出“在8月、9月、10月付给80亿元”外，“愿更进一步提供70亿元”，总共150亿元，“其中包括现款及行总捐赠之物资”。

周恩来同志接着指出，他“不信地方政府（指解放区）能接受此种办法”，“拟亲至各地与地方政府在当地商谈此事。”同时，周恩来同志又提出一项原则，即“行总救济费定为304亿元，其中四分之一由中共及地方政府有关者担负之，余280亿元由国民政府供给”，并要求“8月、6月、10月至

少应拨给解放区100亿元”。由于双方争论激烈，意见难以统一，因之，未获协议。

周恩来同志为了了解黄河堵口及黄河复堤的真实情况，于1946年7月19日下午，偕同成润和王笑一同志，由上海乘飞机赶赴开封，并亲自勘察了堵口和复堤的情形。20日上午9时，在国民党黄委会红洋楼里举行了黄河问题座谈会。参加者有冀鲁豫解放区来汴代表段君毅、王化云、管大同、杨公素等；联总、行总、黄委会、堵复局、河南省府等各方代表及其他有关河工人员共30余人。在座谈会上，工程师们一致认为：堵口工程在大汛前不能进行堵口，下游复堤浚河的工粮、工款、河床居民救济迁移费等问题，仍按南京协议给以解决，对工程师所提之意见，中共代表亦表赞成。因双方对工程意见尚未完全一致，所以，未成立协议。

会后，周恩来同志对段君毅、王化云等同志指示说，为使人民免受黄灾之苦，对国民党谈还是要谈的，但不能对一纸协议抱有希望，重要的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修筑堤坝，迁移居民，做好黄水骤来的一切准备。

21日上午9时，周恩来同志一行成润、王笑一等，携带着解放区完成工程之数字，乘机飞回上海，继续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7月22日上午，周恩来同志与蒋廷黼、福兰克芮、薛笃弼等人的继续谈判中，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采取了适当的灵活方式和有理有节的斗争，正确地处理了谈判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终于签署了黄河工程协定备忘录10项，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为修复中共地区以内黄河故道堤坝，中共地方当局所支付之全部工料款项，政府（指国民党）水利委员会薛笃弼先

生及行总之蒋廷黻博士同意用其最大努力即速从国库支款付还。请还之款数，须根据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各工程师经调查后，所报之已成工程数量确定之。此种调查应由黄河水利委员会顾问塔德加以审核，并应经其签准以为已成工程数量之证明……关于该工程其余部分所需之工料款数，塔德先生应做一估计送呈。兹经协议，如该工程其余部分物料用款所提之请求，当以20亿元为应获准之最低数目。

二、用以偿付工料之款项，已有40亿元汇至开封转交中共地方当局，另20亿元在南京拨定。兹经协议，此20亿元应存入一上海银行中，单立一账，须有蒋廷黻博士及周恩来将军之联合签字始能提取，该项存款及以后依中共之意存入此账的后续存款，应用以购买适用旧黄河沿岸各区善后救济之物资。

三、兹经协议，行总应出面粉8600吨付给中共管理各区黄河工程工人。在数目中，应有三分之一左右经烟台或其他适当港口交予鲁东，此外均应送往鲁西之菏泽。

四、行署亦应将塔德先生认为在山东可以有利使用之任何现有器材贷予中共。

五、兹经协议，因黄河堵口而受不良影响之人民应受救济及善后扶助，该项救济每人所得之数额比例应较中国任何其他区域为大，被迫迁离旧黄河河床之居民，无论彼等系在中共地区或在国民党地区，均应一律平等。至于在中共地区遭受不良影响之人民，兹经协议，蒋博士应以同样之努力自国库取得拨款交予政府水利委员会与善后救济物资一并用于此等地区，其供给总数如下：甲、8月、9月、10月，每月40亿元。乙、11月30亿元。总计在11月底以前共应拨给150亿元。在7月间能拨出之物资应算入8月期之分配……此外，蒋博士承诺，至多为

78亿元之另批款项亦可筹办，此款应由技术人员及救济专家之就地考察予以确定，该款亦须视行总全盘计划中对钱款物资之筹划而定。

同时，协议还规定，在洪水期间不再堵口，以尽量维护口门已成各种工程为原则。9月中旬以后开始堵口，复堤、整理险工及局部整理河槽应配合堵口工作进行。

为忠实于上海协议，解放区政府克服种种困难，发动群众，不分日夜，不怕风雨，不惧蒋军的骚扰破坏，严格按照标准赶修堤坝，连塔德也不得不承认“堤及险工修得均好”。张季春也满意地说：“此次修堤规模宏大，为黄河有史以来所未有。”行总河南分署驻菏泽仓库主任马风台说：“黄河复堤工程如此成绩，都是解放区的政府和老百姓的功劳。”至7月下旬，黄河复堤整险工程，在解放区党政军民的努力下，大部分均已完成。

六、国民党限令堵河口

下游人民怒声吼

1946年7月，此值冀鲁豫解放区军民的复堤整险工程进入高潮时期。可是，国民党政府却背信弃义，集中了50个旅的兵力，沿陇海、平汉、同蒲三条战线大举向冀鲁豫解放区进攻，8月份又调增了20多个旅的兵力，企图“驱逐刘伯承主力于陇海铁路以北而歼灭之”。国民党政府在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又加紧实现引黄归故的计划，阴谋以此形成“西起风凌渡，东迄济南，完成一条长逾千里的黄河封锁线”。国民党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罪恶目的，不但公然撕毁了签订的一切协议，对复

堤工款及河床居民救济费仍然不予支付，而且还派出军队大肆抢劫与毁坏治河物资，派出飞机狂轰滥炸治河员工及渡口，致使下游复堤整险工作无法进行。国民党政府又于7月下旬起，开始对花园口工程抛石。10月5日开挖了引河。12月22日，国民党黄委会副委员长沈百先等人至花园口督工，并限令堵复局在50天内完成堵复工程。

国民党违背治河协议的举动，引起了解放区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全国各界人士的无比关注。11月12日，周恩来同志致函联总驻中国署长艾格顿和行总署长霍宝树，指出：“国方迄今未遵守上海协议，致使我方整理险工等工程无法进行。在下游工程未复，救济河床居民款项毫无拨给之际，而花园口堵口工程则在积极进行，且国方又有限令50日完成堵口之命令，是直欲使下游千百万及河床数十万居民为鱼矣，危险莫大于此。”同时，他还建议国方“立即停止堵口工程”，“依约迅速拨付复堤欠粮欠款，整理险工款项及救济河床居民等费”，“赔偿我方在陇海路以北地区国军抢去治河物资。并保证以后黄河工程不受军事政治之影响”。11月19日，《冀鲁豫日报》发表的社论中指出：“近几个月来，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得美帝国主义之援助，进行全面内战，大举向各解放区进攻，其欲利用黄水造成我区重大灾难。”同时，冀鲁豫行署主任段君毅、副主任贾心斋致书黄委会、堵复局，抗议国方违约堵口，“贵方未得敝方同意，竟突然片面加紧堵口，对中下游工程则置之不理，显系实行蒋介石淹汲我区之阴谋，此种背信弃义之行为，敝方特向贵方严重抗议。”即日，边区参议会及工青妇联合会向全国、全世界发出呼吁：“蒋方加紧堵口，限期50日完成，窥其用心，势必淹死我解放区人民而已，其手段之毒辣，实旷古所未闻。”解

放区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也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又要放水淹我们，沿河同胞快起来自卫自救，只要我们大家动员起来干下去，蒋介石这一笔债是一定能讨还的。”接着，解放区黄委会于11月20日召开了各专署、各县、各修防处、段负责人联席会议，贾心斋同志针对国民党要以黄水永远分割河南、河北解放区之阴谋，要求大家要抓紧修堤、造船、迁移河床居民，奋起自卫自救。

国民党政府对解放区人民及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和呼声，不得不做点姿态，以便掩人耳目，所以，联总、行总于11月23日，又一次空口许诺，说：“于次年1月5日以前拨出河床救济费100亿元，1月底再拨50亿。”可是对停止堵口事却不予置理，依然赶进，就连蒋介石也亲自出面过问。11月26日，蒋介石亲发密电给其水委会，严令“督饬所属昼夜赶工，并将实际情形具报”，从而更加快了工程进展。12月6日，堵复局顾问熊观民赶赴南京，向国防部长白崇禧“报告工情，并接洽要公”，背着解放区政府，密谋策划黄河归故，阴谋淹毙下游人民。

为了制止国民党这种恶劣的行径，1946年12月18日晚在张秋镇，冀鲁豫解放区的领导同志段君毅、贾心斋、罗士高，冀鲁豫黄委会的领导同志王化云、张方，中共谈判代表赵明甫，与联总、堵复局的代表塔德、韩森、齐寿安、阎振兴等，就当前迫切解决的黄河问题进行了座谈。中共代表赵明甫揭露，国民党不遵守协议，片面堵口，“显然美帝国主义者与蒋介石已把黄河作为军事、政治阴谋的组成部分”，并强烈要求：一、整理险工，裁湾取直与居民迁移等工作，要求马上解决。二、今后粮款与救济物资，均由联总直接拨付，不必经国民党包办的行总机关。三、我方堤工被国民党耽搁5个月，应

再推迟5个月，至明年6月再堵口放水。四、复堤整险工程款由堵复局直接与解放区结算，并按解放区堤线长度应分配工程款201.6亿元。对于这些合理的要求，连塔德也表示“推迟堵口的时间，我个人同情”，但语辞含糊，态度不明，只愿把问题“提交马歇尔将军处理”。齐寿安、阎振兴却以“复堤款离实际需要太远”为借口，不愿签定任何协议。

12月19日晨，五六百群众聚集在黄委会门前，质问齐寿安、阎振兴“为啥先堵口？”齐寿安说：“一切问题我都和段主任谈过了。堤修不好？不让水过来。”却又说：“我没有权，不敢当家签字。”最后，段君毅主任对群众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谁不知道，谁不反对呢？我们得起来斗争和争取。”

由于张秋镇会谈未能签定任何协议，为此，国民党政府更加督赶堵口工程，12月27日，竟敢单方将一部分黄水引入故道。河床人民眼看就要遭受黄患之苦了，因之，人人自危，个个惊惶，但是蒋介石却不顾人民的死活，于12月29日复电水委会及堵复局，表示他的堵口决心“已令各有关部队，协助运石车辆”，让其赶进堵口工程。

1947年1月2日，蒋介石在上次电令发出后的第五天，又一次亲自指示水委会负责人：“堵口工程务须按照原拟进程表所定元月五日完工，不可拖延。”可见蒋急赶堵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是路人皆知了吗？

滔滔洪水继续东流，故道两岸妇孺皆惊，形势的发展愈显严重。为此，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特派饶漱石、滕代远、戎伍胜、赵政一等，邀请联总驻华有关人士兰士英、卜敦、塔德、韦士德、朱治民等，来邯郸举行黄河问题座谈会。

会谈前，塔德认为，堵口放水为单纯的工程技术问题。饶漱石当即指出：这不是单纯的工程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军事政治阴谋。联总救济中国的物资，不应被利用为帮助蒋介石放水残害中国人民，这也是一种罪恶。

会谈开始后，首先由塔德报告堵口经过，接着韦士德发言，说“放水应特别慎重，并须听取解放区人民的意见。”继而，赵政一指出：“片面堵口，片面放水，塔德先生不能辞其责。”认为“塔德先生有权也有义务执行协议”。

会谈期间，戎伍胜对解决黄河问题，提出三项最低要求：

一、迅速拨发救济费。根据上海协议，第一期复堤费为100亿元，除已拨发之60亿元外，尚差40亿元，解放区复堤已实际开支109亿元，故须补发49亿元……

二、河床居民救济费。根据菏泽、南京协议，解放区河床居民救济费应为600余亿元，以后又减为225亿元，现在已允拨150亿元，应迅速拨付，其余75亿元亦须照数补发。

三、根据历次协议精神，合龙放水必须推迟到今年5月底或6月初，否则解放区人民将坚决反对，采取自卫自救行动。

对上述三项合理的最低要求，塔德却以工程观点作搪塞，说什么很难定合龙日期。座谈会之后，他又自行举行小组会议，并同意实行下列三点意见：

一、即日派工程师调查河务，并即刻拨款。

二、即刻堵塞流入黄河故道之水闸，不让再流。

三、即到上海拨款，并与艾格顿将军商谈工程计划。

最后，滕代远着重指出：“黄河问题的实质就是蒋介石企图利用黄河归故，来淹没我沿河7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而黄

河问题的处理，美国朋友不但是参加者，而且是主持者，如果这件事做得公平合理，对中国人民是一件很大的功绩，中国人民是很感激的。反之，则屠杀中国人民刽子手的责任，今天的美国朋友是要担负一部分的。”滕代远的讲话，使塔德很觉尴尬，迫其不得不表示一下态度：明天即停止堵口，并分赴上海、郑州进行停堵和督促拨给迁移费诸工作。但是，国民党政府在堵口问题上，向来是言而无信、行而无果的，对待协议随时都可以当一张废纸撕毁。

七、董、周声明惊中外 国共上海再会谈

为了制止国民党违约堵口的行为，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除派代表与联总驻华有关人士举行了邯郸会谈外，董必武同志又在上海致函联总署长艾格顿、行总署长霍宝树、水委会委员长薛笃弼，严正申明了中共的立场。函中不但严厉谴责了国民党政府撕毁历次治河协议，而且还提出了下列意见：必须立即停止堵口放水工作，并追究放水的责任；花园口堵口工作必须推迟至5月之后；堵复工款660亿元之分配，应按照堤线长短工程大小，公平合理分配；救济协助黄河之物资器材，应由联总直接交付解放区，不必经过行总。

1947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就黄河堵口问题也发表了严正声明。他首先指出：“目前陇海路东段内战正在异常紧张之际，蒋介石政府突于上月底严令郑州军事当局及开封黄河堵复局，立即在花园口合龙，以放水东淹黄河故道居民及两岸群众与解放区自卫部队，现此流水已过汴新路，不日即将经过济南

东趋渤海。”“蒋介石之所以如此狠毒，其用心就在想利用黄水淹死豫鲁解放区的人民和部队，隔断解放区的自卫动员，破坏解放区的物资供给，以便于他的进攻和侵占，以达到他的军事目的。”

在声明中，周恩来同志还指出：“联总素以善后救济工作为工作方针的，但他的救济物资，分配给黄河堵复工程上的各种机器、工具、运输器材等，绝大部分都用在花园口工程上，而解放区复堤工程方面所得的几乎等于零。如果再将联总每次都参加黄河堵复问题协议，而每次又不去阻止蒋介石政府之违背协议的事情联系起来看，我们便不能不怀疑联总机构对遵守没有政治歧视及分配公平的原则尚有几许真意？假使联总领导者欲证明其为真意，那我们就有权利要求联总中国分署在黄河堵复问题上采取公正而明确的态度，立即制止蒋介石政府目前堵口放水的行动，要蒋介石政府和行总依照过去协定，立即拨付解放区应得的全部工款、工粮、机器、工具与运输器材及河道居民的全部救济费用，必须在复堤、整理险工、裁弯取直全部工程完成之后，才能堵口放水。蒋介石政府如不服制止，不接受上述要求，联总有权停止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救济，而首先就应将花园口堵口工程上所用的机器、工具、船只及运输器材等全部撤走。这种合乎正义的压力，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因为联总这些物资如不撤走，如不停止救济，中国将有数百万人民受其损害，反之，这些人民才能得救。我仅代表解放区1亿4千万人民向联总及各国的人民作此呼吁。”

最后，周恩来强烈提出：“数百万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将决定其存亡于今后一个短促的时间之内，望全国同胞，全国舆论共起呼吁，急图挽救。”

董必武、周恩来同志的严重声明,进一步阐明了中共对黄河问题的坚定立场,使全国人民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堵口的军事企图,引起了中外人士的极大注目。为此,联总不得不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1947年1月11日,艾格顿、塔德等特邀请中共代表董必武、伍云甫、成润等,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磋商。塔德认为:“目前工程情况3个月内可无水灾危险”,“整理险工估计12万人2个月完成”,并且说什么“当地人民对工程有经验,只需送去器材和仪器等就行”,完全推翻了1月3日在邯郸会谈中,他所说“明天即刻停止堵口”的诺言。艾格顿对中共建议“停止堵口,停止放水,不然联总即应撤退人员器材”的问题,除表示“愿意向各方商讨适当办法”外,又说什么“堵口延期三礼拜可以,但要停止堵口是不可能的”。伍云甫则坚持下游屡遭蒋军破坏骚扰,修堤整险困难,“堵口非推迟5个月不行”。因双方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最后,艾格顿提议“以后再考虑办法”而散会。

鉴于联总这种含糊态度,1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玩水者灭顶》的社论,指出:“蒋政府已开始在花园口堵口,引黄河入故道,使冀鲁豫解放区成为泽国,眼看数百万同胞的生命财产即将毙身鱼腹……联总应该负起其对自身应负的责任,立加制止,撤退其对蒋方的一切供应。”同日,冀鲁豫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同志,也对记者详细叙述了蒋军杀害修堤员工及抢劫修堤物资的大量事实。1月13日,边区工农青妇联合总会通电全国、全世界各界人士,控诉蒋介石放水淹没解放区,“国民党背信弃义的开堤放水乃是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者联合参谋本部中的一个巨大军事政治阴谋计划,他们企图利用黄水来分割与切断解放区的联系,因而不惜以黄河中、下游人民的生

命财产，作为其军事政治赌博的牺牲品。”

由于国民党政府急于堵口放水，没能慎重顾及堵口工程质量，1月15日深夜，石坝陡然下陷，大溜汹涌冲出，坝身立即塌断，半小时后，有四排桥桩被洪水冲走，接着其他桥桩相继折断，石坝缺口扩大，上游水面下降，坝顶全部露出水面，上下游水位差一米左右，至此，堵口工程再次失败。

堵口工程再次失败，影响了国民党最高当局妄图利用堵口放水，分割解放区的整个军事部署。1月16日，陈诚、顾祝同等高级军事将领，亲往花园口“视察”工程，督促堵复局找出失败原因，重定堵口计划。即日，堵复局便召开了工程技术人员会议，讨论了失败原因，并研究了在平堵的基础上，采取平堵与立堵相结合的办法与实施此办法的具体措施。

1月18日上午10时，蒋介石在南京亲自召见了水委会委员长薛笃弼、行总署长霍宝树，并听取了薛笃弼对1月11日艾格顿与董必武在上海会谈的报告。同日，蒋介石指使水委会副委员长沈百先，致电堵复局，转达了他对堵口工程的严令“飭局长督促员工，拚力赶进”。

堵口工程在蒋介石“严令”的督促下，堵复局制定了增挖引河、接长及增修挑水坝，加强大坝，盘固坝头，抛堵合拢五项计划，并决定：从正坝金门两旁东西坝头起，用平堵方相向分抛大铁丝石笼与柳石辊，先将正坝堵塞合龙，然后再用立堵法在边坝合龙的具体堵口方案。

国民党堵口合龙迫在眉睫，解放区人民无不惊恐万状。1月18日，《冀鲁豫日报》发表了《抗议国民党水淹华北》的社论，指出：“历史事实有千百次的证明，造成历史惨案的，一定在不久之后，必受人民之处分，这是丝毫不差与无可逃避

的。”1月20日，边区参议会代表全边区人民，向全国同胞呼吁，国民党水淹华北的阴谋，“是过去日寇处心积虑的图谋。全国同胞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蒋介石此种惨无人道的罪行。”

对于解放区人民的呼声，国民党充耳不闻，照样对花园口堵口工程加紧赶工。1月14日，薛笃弼在给董必武的信中，甚至无理的指出：“本会与贵方代表仅有35年5月18日一次谈话（指1946年5月18日的南京协议），凡关于黄河堵口复堤工程之进行，自当悉以该项协议为依据，至来函所谓历次会议记录与协议，本会既未参加，自不受其拘束。”态度之蛮横，大有全盘否定历次协议之势。

国民党政府在花园口堵口合龙的气氛愈来愈紧张了，迫于此种形势，1947年2月7日，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有中共、联总、行总、水委会等方面代表董必武、伍云甫、林仲、向景云、艾格顿、毕范理、薛笃弼、霍宝树、李卓敏参加的黄河堵口会议。由于国民党堵口合龙的方案早已决定，中共代表虽然几次据理力争，推迟合拢日期，也是无济于事，仅达成以下协议：

一、黄河共区复堤工程即刻开始，堵口工程仍照常进行，以维持保护原有工程为原则。合龙日期至3月中旬视下游抢修险堤及合龙工程需要，再由水委会、行总、联总与共方会商确定。

二、联总即刻通知塔德工程师，会同水委会及中共工程人员，协同救济队进入共区，携带器材勘察复堤及办理救济工作。

三、水委会于日内先拨行总40亿元，转中共为复堤工程

费，垫款人由行总以解总（解放区善后救济总署）户名存储银行，以便解交施工地点。提款手续仍采行总与解总代表双方会商办法。

八、黄河堵口合龙

两党谈判告终

上海会谈后，在解放区政府及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40亿元的复堤工款，150亿元的河床居民救济费，陆续拨出，交付中共方面。但是，黄河堵口工程仍不停止，昼夜加紧赶进。薛笃弼甚至还胡说什么“放水有益无害嘛”。

在国民党加紧堵口工程的同时，还经常用飞机轰炸扫射解放区复堤员工，船只渡口；并派遣军队在已修好的大堤上挖掘了许多工事，抢劫了大批复堤物资；就连联总救济河床居民的运输队，亦成为蒋机的空袭目标。为此，1947年2月20日，联总代表韩森电告艾格顿，“国方飞机一直继续滥施轰炸与扫射，堤上行人被打死，复堤材料被炸毁，载有标帜之联总装运救济之卡车，亦被扫射而遭焚毁。”

1947年2月15日，冀鲁豫行署主任段君毅、副主任贾心斋通电全国及全世界，控诉“蒋政府派遣大批美机沿故道轰炸，大小船只被炸毁达76只，价值1亿3千万元；秸料被烧76万斤，价值7000万元；员工死伤25人，加上被袭击伤亡群众，已达94人。因此，我方堤不能修，险不能抢，河床居民不能救济。”

国民党政府对下游复堤工程千方百计地破坏与捣乱，对花园口合龙工程却愈加赶进。3月7日，上海各家报纸都发出了“花园口合龙工程3月开始，20日前可全部完成”的消息。

中共代表伍云甫对此种违背2月7日上海协议精神的作法，提出了强烈的书面抗议，国民党政府却根本不予置理，依然积极堵口，竟敢于3月8日提前开河放水，3月10日开始口门合龙工程。至13日口门仅剩7公尺的宽度，进入故道的黄水，已达全河水量的三分之二。3月15日凌晨，终于将花园口口门合龙成功，从而，滚滚洪水全部流入了故道。

据不完全统计，这次黄水回归故道，使1044个村庄受灾，266280人遭难，被淹土地910583亩，倒入水中的房屋64972间。国民党政府这一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引起了全国各界的强烈抗议与谴责。

1947年3月18日，解放区救济总会就国民党破坏治黄协议，片面堵口合龙，水淹解放区人民，向中外人士发出了申诉书，揭露了国民党“自始至终都想以黄河归故来加害解放区人民，以达其军事目的”，并且“把黄河当作进行内战的第二大军的阴谋”。

3月24日，董必武同志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国民党政府违背协议，实行黄河堵口，联总也竟然坐视灾情不救，并要求世界人民予以声援。声明中指出：“和蒋介石进攻延安的同时，竟不惜用黄河堵口的办法，以遂其军事上隔断我解放区的目的”，并指责“行总、联总为参加治河协议并保证此协议之实施的，但对蒋政府此次破坏黄河协议，从未予以指责”，最后，警告蒋政府“我们保有声讨此种罪行之一切权利和自由”。

黄河归故后，蒋介石自以为黄河战略可抵40万大军，阻止人民解放军于黄河以北。于是，一面调60万大军，向鲁南“重点进攻”；一面于4月间断绝解放区驻开封代表邮电联系，5月间又驱逐解放区代表离开开封。在六七月间，虽然各方曾

一度同意组织复堤工程混合委员会，终因国民党坚持内战，缺乏诚意而破裂。此后，由于内战形势愈来愈紧，所以，国共两党的黄河谈判也就被迫告终了。

（祝厚江 整理）

花园口堵口始末回忆

陶述曾口述 祝厚江整理

一、报 国 心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用刺刀和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在我国神圣的土地上，杀人放火，无恶不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蒋介石借口“遏制日军西犯”，派他的军队用炸药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汹涌的洪水没能阻止日军西犯，却使我豫皖苏600万同胞失去了家园，悲惨景象难忍目睹。

我是个怀有治水之技的中国知识分子，眼望着苦难同胞在洪水中啼饥号寒，却是有技无处使，有力无法出，心里简直如油煎刀剜，只能对天长叹。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不料，曾被日本侵略者吓破胆的蒋介石，却在美帝国主义飞机大炮的支持下，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命令他的军队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赢得的和平环境，又布满了战争的乌云，到处响起了内战的枪声。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主席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了重庆，与蒋介石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重庆谈判，并于1945年10月10日签定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

即《双十协定》。在这个纪要中，蒋介石同意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并“保证人民享有各项民主权利”。

战火连绵不断的时代就要过去了，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就要到来了。我一字一句地阅读着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是一个从事水利工程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都想着用我的治水之技报效国家，报效人民，使我们的祖国不再落后，使我们的人民不再受穷。过去，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新旧军阀的统治，使我中华民族一直处在苦难的深渊。我虽有报国心，却无报国路。《双十协定》的签订，使我看到了祖国强盛的希望和前途，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帝国主义列强为什么敢于欺侮中国？就是因为中国落后，人民贫穷。我暗暗立下了誓言，一定要为祖国的富强，献出我的一切力量。

1946年3月，东北的行政长官张家鳌给我发来了邀请书，邀我出任长春市的工务局长。祖居东北的一些同事闻讯后，纷纷跑来向我祝贺。他们说：“长春是东北的大城市，建设的很好，也很繁华。工务局长这个职务，也是一个十分舒服的位置，应该去。”并且表示，愿意和我一同前往，协助我做好此项工作。他们哪里知道，我并不是图舒服安逸，而是要到一个有用武之地，为祖国贡献出我的一技之长。对工务局长这个职务，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

时隔不久，湖北省大冶源华煤矿公司又给我发来了邀请书，邀我担任该公司的总经理或者总矿长。我的老家是湖北省新义州，我在外奔波半生，何尝不想举家团聚，享受一下天伦之

乐。再说大冶源华煤矿公司薪水高，对于发家致富来说，也是个比较理想的工作。可是国不强家难富，我吃够了受外人欺侮的苦头，所以，我毅然决然地又放弃了大冶源华煤矿公司的工作。

1946年4月初，河南大学的水利教授，我的老同学、好朋友瞿绂章给我打来了电报。我拆开电报一看，顿时欢喜异常。电报上说，他现在出任了堵复黄河花园口口门工程局的材料处处长，并把我向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堵复黄河花园口口门工程局局长赵守钰作了推荐，经赵守钰同意，让我担任了工程局的总工程师。这真是我理想的去处，我当即向瞿绂章回了电报，同意出任堵复黄河花园口口门工程局的总工程师。

对于我的这个举动，有很多人大为不解。几个挚友劝我说：“堵复花园口口门这个工作，比起去长春要苦得多；比起去大冶源华公司，薪水又低得多，你何苦去那里拚命？再说花园口黄河大堤已决口8年，是个难度相当大的工程，一旦堵复失败，不管哪一级长官，也不会替你承担责任，到时候，罪过可要加在你一个人身上，你还是三思而后行为好。”

我回答说：“对于你们的一片诚心，我是深表感谢。不过，你们要知道，现今，在豫皖苏三省，还有我600万同胞流落异乡，无家可归，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我是个吃水利饭的人，不能为苦难同胞尽心出力，于心难忍啊！我志已决，去向已定，请勿多言。”我的话，使劝说我的人，有的点头称是，有的摇头费解，众说纷纭，各有见地。

1946年4月7日，我收拾好简单的行装，便登上了从重庆飞往开封的飞机。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因为我的一颗报国心总算有了实现的地方。

二、心中疑云

1946年4月7日傍晚，飞机在开封着陆，经过一天的奔波，身上感到十分疲劳。但是，我没顾去旅馆下榻，便直奔瞿绂章家。瞿绂章一见到我，大感惊讶：“我昨天刚接到你要来开封的电报，怎么今天就到了？”我说：“不知怎么的，一见到你的电报，我在重庆就再也呆不住了。”

瞿绂章是我在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同学，我们一块参加过“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又同时被校方开除学籍，后来，又同在河南大学任水利教授。因此，我们相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很深，见面后，也用不着多少客套话。

我开门见山地说：“老同学，你知道，我这次就是为堵复花园口口门而来的。有关堵复工程局的情况，我是一无所知。对于黄河虽是熟地，却无熟人。在当今，要想成就一件事情，若无三五知己相助，难啊！”

瞿绂章说：“据我所知，堵复工程局的现有人员，大部分都是端技术饭碗的人。你知道，想当官的人，是不会到这里来吃苦拚命的。靠堵口子，也堵不出乌纱帽来，尤其是现任局长赵守钰，是一个性情十分豪爽，为人十分正直的人，在当今这个年代，象他这样的人，可为数不多啊！”

对于赵守钰这个传奇式的人物，我是早有所闻，却不知详情。以后，要在此人的领导下工作，我的报国心能否实现，他可是个事关成败的关键人物。因此，很想知道一下他的底细，便问：“绂章，你能不能把赵守钰的详细情况讲给我听听？我

对这个人很感兴趣。”

瞿绂章说：“对于他的情况，我也知道得不多，只不过和他认识而已。赵守钰原是西北军冯玉祥将军部下的一个中将骑兵师长，自幼练就一身武林功夫，枪法能够百步穿杨，他能征善战，带兵有方，冯玉祥将军十分器重他。他年过半百，膝下只有一个儿子，视若掌上明珠，头几年，这老先生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却把他这个独生儿子送给了红军，不幸，死在了长征路上。消息传来，他悲痛欲绝，但是，却说儿子死得其所。”

说到这里，瞿绂章轻轻地叹了口气，又接着说：“他儿子死后不久，蒋介石命令他带领500人的手枪队护送老班禅回西藏，不料，被日军阻止于青海省玉树县，也不知什么原因，老班禅悲愤而卒。回来后，蒋介石便解除了他的兵权，让他出任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不过，他没有计较这些，尤其是对堵复花园口口门工程决心很大。他经常说，为了解除黄泛区600万同胞的苦难，不论困难多大，也要把花园口口门堵复。为此，他到处挖掘有堵口专长的人才。当我把你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以后，他喜出望外，只夸我向他推荐了一个难得的人才。他说，哪怕用三请诸葛亮的办法，也要把你请来。这不，一请也没用请，一封电报，就把你给召来了。”

听了瞿绂章的介绍，我心里暗自庆幸。在一个新的地方，能遇上如此一位领导人，真是难得呀。看来，我心里想的和赵守钰想的是不谋而合了。我高兴地对瞿绂章说：“看来堵复工程局的一班人，还是能够通力协作的。”我知道，事成与否，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瞿绂章摇摇头说：“政府当局对堵复花园口口门的真实意

图是什么，现在你我都不清楚，恐怕连赵守钰也不一定真正清楚，我只觉得象有重大军事背景。按理说，堵复工程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应该由局长赵守钰亲手配备，尤其是总工程师这个职务，更应是局长理想的人选。可是，正当赵守钰为总工程师这一人选犯愁之际，政府当局却派来一个美国水利工程师塔德当顾问。塔德这个人是个中国通，对于水利工程也很有一套，曾在中国参加过汉江和黄河的堵口工程。他在美国就发表了文章，说是象花园口这样的工程，他两个月就能把口门合龙。因此，他说话十分气粗，态度十分傲慢，根本没把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放在眼里。堵复工程局刚一筹建，他便自作主张于3月1日开始施工堵口，并扬言，6月份一定将口门合龙。

经瞿绂章这么一说，我心里顿时犯起了猜疑，我这个总工程师还没有到任，塔德这个外国人，怎么能对中国这样大的事情独作主张呢？我急忙问：“工程局对黄河下游的堤防、河床情况勘察了没有？”

瞿绂章愤愤地说：“根本不了解情况。”

一时间，我心里乱成了一团麻。第一，我这总工程师还没到任；第二，对黄河下游的情况还没有勘察，政府当局就批准塔德开工堵口，难道塔德不懂得在如此情况下开工堵口，可能会给黄河两岸人民带来灾难吗！

瞿绂章一看我的脸色不对，便劝解说：“老同学，你初来乍到，对塔德这个举动的真实意图还一无所知，我劝你还是先不要激动为好。”“明天，赵守钰要带领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到黄河下游勘察，你愿意不愿意也跟着走一趟，了解一下情况呢？”

我果断地回答说：“我当然要去！”

三、我见到赵守钰

1946年4月8日，天刚蒙蒙亮，我在瞿绂章的陪同下，便去堵复黄河花园口口门工程局报到。这时，工程局的4辆吉普车已经发动起来，响着低沉的鸣叫声。工程局的10几个领导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正在整装待发。

在办公室门口，站着一位身穿将军服装的人，他个头高大，膀阔腰圆，显得威风凛凛，十分魁梧。瞿绂章用手指了指那个人，对我说：“述曾，看见了吗？那位将军打扮的人，就是赵守钰局长。”

我俩走到赵守钰跟前，瞿绂章说：“赵局长，你要我给你请的诸葛亮——陶述曾先生，我给你请来了。”我赶忙向前走上一步，自我介绍说：“总工程师陶述曾向你报到，请你多多指示。”

赵守钰一见到我，分外热情。他紧紧握住我的双手，哈哈大笑说：“陶述曾先生，我可把你给盼来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为了工程技术人员问题，我是心急如焚，你来的正是时候，这不，我们正要到黄河下游勘察堤防情况，你也陪着辛苦一趟吧。”

我连忙说：“多谢赵局长关照。”

赵守钰把手一摆说：“不用客气。堵口子，你是我的总工程师，打起仗来，你就是我的参谋长，不论是堵口子，还是打仗，必须要知己知彼，情况明了，心中有数，才能百战百胜。走吧，有话路上说去，快上车出发。”他真象战场上的将军一样，下达了命令。

就在这时，一个黄头发，绿眼睛，肚子凸起很高的外国人，走到我的跟前，说：“你就是总工程师陶述曾先生吧？本人早慕大名，只恨见面太晚。听说你很有治水的本领，可与你们的祖先大禹媲美，我是无限地佩服。”

我知道，此人就是美国工程师塔德。他果然是个中国通，中国话说得相当流利。但我对他的那副傲慢样子，很反感。我说：“你就是美国工程师塔德先生吧？我也曾听人说过，你对我们中国的水利问题早有研究，并且发表过很有见地的论文。不过，叫人费解的是，你为什么对你们美国的水利问题不去研究。”说罢，我不卑不亢地站在了塔德跟前。

我的举动，使得塔德尴尬极了。堵复工程局副局长文福宴走过来打圆场。他一见到我，故作惊讶的姿态。“哎呀！这不是述曾嘛？我知道你要来，可不知道你来得这样快。你看你来时也不提前给我打个招呼，我也没法到机场去接你。多有得罪，请你原谅。”

我笑着说：“几年不见，你老兄已高升到局长的位置上了，我这个小小百姓，哪敢惊动你局座的大驾？”

按说，我和文福宴是老熟人了。1936年5月，江汉钟祥县遥堤决口。那时，我正在河南大学和河南水利专科学校任教。遥堤善后工程委员会的工程处长陈汝，邀我带领学生去堵口。我经过两校的同意，便带领水利专科毕业班的10几名学生，赶往遥堤堵口工地。当时文福宴是工程委员会的总工程师，我们共事1年多。可是，我对此人的印象一直很不好，只感到他办事爱搞小动作，不光明磊落。一位朋友曾对我说：“对文福宴的为人，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心狠口辣’。”所以我对他是敬而远之，有所防范。

赵守钰听到我们这些貌合神离的谈话，赶忙对我摆了摆手，意思是不让我再说下去了。他走到我的跟前，说：“陶述曾先生，你是堵复工程局的总工程师，塔德先生是工程顾问，文福宴先生是副局长，我们走在一块共事，都是为了一个心愿，那就是，尽快将花园口口门堵合，让黄泛区600万难胞早回家园，望大家能够携手并肩，同舟共济。走吧，天不早了，赶快出发。”

塔德耸了耸肩膀，很不友好地瞥了我一眼，钻进了吉普车内。文福宴倒是没有什么表示，但是，脸色难看得象阴了天。

4辆吉普车，插着4面写有黄委会字样的小黄旗，驶出了黄委会的大门，直奔黄河下游而去。

四、初到解放区

吉普车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着，我的心也在七上八下地跳动着。不知为什么，那阵子，我想得很多，也想得很乱。

我问赵守钰：“委员长，黄河下游堤防的情况还没勘察，花园口口门为什么就急着堵复呢？”

赵守钰苦笑了一下，把双手交叉在胸前，身子往后一仰，长叹一声说：“堵复计划是塔德制定的，又得到了政府的同意和支持，我一个吃黄河饭的小小委员长，能有何办法？现在的局势，你还不明白？政府当局不论任何事情，对美国大老板的话，无不言听计从，我们不听之任之，能行吗？”

对赵守钰这样的回答，我有点不满意。便说：“象花园口如此浩大的堵口工程，早就应该去下游勘察。在已堵复月余的今日才进行勘察，实在是太迟了。”

赵守钰说：“总工程师先生，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于黄河下游的堤防情况，我何尝不想早做勘察。谁知，我的几次下游勘察报告，都如石沉大海，无人问津。有的人还威胁我说，黄河下游是共产党管辖的地区，到了那里，会危及我的安全。”

赵守钰的话，正好触及到我的那点心病，便问：“委员长，我们这次勘察的路上，共产党会不会把我们扣押起来做人质呀？我心里还真有点胆怯哩。”

赵守钰一听，仰面长笑起来。说：“我看，你常住重庆，听政府当局的宣传听得太多，有点神经过敏了。你看，前面就是铜瓦厢了，过了铜瓦厢，就到了共产党管辖的解放区了。老弟，请你把心放肚里吧。等到了此地，你就知道此情了。”

他的一番话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我对政府当局的那些宣传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吉普车沿着破烂不堪的黄河大堤继续逶迤前进。过铜瓦厢不远，吉普车停了下来，我抬头一看，我们已来到一个村头。这时，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赵明甫，走到我们的吉普车跟前，说：

“赵守钰先生，半天的黄河勘察，把你们累坏了吧？在这个村子里，住着我们一个师部，请诸位先生们到里面休息待茶。”

我走下吉普车，对着这个村子仔细观察起来，越观察越觉得可疑。这哪里象师部住的地方呀？据我所知，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不要说一个师部住的村子，就是一个团部，甚至一个营部住的村子，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唯恐村民们危及长官的安全。他们砍倒树木扎鹿栅，扒了房子建炮楼。兵士们杀老百姓的鸡鸭，宰老百姓的猪羊，只吓得男人躲，女人藏，连孩子哭都不敢哭出声来。可是，这个村子里却显得是

那样的安定清静。

我们已走进村子半截了，还没看到有多少部队，只是有几个身着灰色军装的战士在扫地、挑水，帮助老百姓干农活。更让我不可理解的是，在不远的一棵大柳树底下，几个青年妇女正在和几个青年战士聊天。他们又是说，又是笑，显得十分亲近。有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竟对着一个青年战士的耳根，说起了悄悄话。不一会，大柳树下就响起一片欢乐的笑声。

面对此情此景，我心里不由得大发感慨。自古以来，兵是兵、民是民，水火不容。我年过半百，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兵民关系，他们不是一家人，又象一家人。共产党领导着如此一支军队，这大概就是中国的希望吧！

这时，一个年纪不过20岁的小战士，很有礼貌地走了过来。他笑嘻嘻地朝我们一一敬礼，嘴里还不住地说着：“先生辛苦了，请到里面用茶。”他那彬彬有礼的姿态，一副十分英俊的模样和那甜脆的声音，至今还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

在一座打扫得十分干净的泥土屋里，我手捧着小战士给我倒上的那碗茶水，心里只觉得热乎乎的。看一看眼前的解放区，想一想国民党的占领区，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相差何止千万。

我压低声音，悄悄地问赵守钰：“委员长，你看这里怎么样？”

赵守钰回答得十分干脆。“没什么可稀奇的，整个解放区，到处都是如此。”

我不由地脱口而出，“要是全中国都是如此那就好了。”

我的这句话，引起了各种腔调的笑声。

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不大一会儿，又继续上路了。那位脸上

挂笑的小战士，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头，招手而别。

五、愤怒的集会

吉普车摇摇摆摆地往前行驶着。我从车窗内探出头来，举目一看，不由人愁上眉梢。黄河，是我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我勤劳人民的象征。可是，蒋介石派他的军队对花园口黄河大堤一阵炮击，现在，已使它到了面貌全非的地步了。过去坚如长城似的大堤，现在沟濠纵横，百孔千疮；险工砖石，不见了踪影；日寇用这些砖石，建立的枪杀中国人民的碉堡残痕，却遍地皆是；两岸的排排绿树无存一棵，使人觉得异常萧条和凄凉；故道已成干河，只见黄烟滚滚，遍布沙丘；河坡被饥饿的难民种上了庄稼，黄弱的麦苗，被风沙摧残得干枯了半截。

眼前的景象，使我不由地产生了一种恐怖的感觉。抗战前，完整的黄河大堤，尚不能抵御洪水的冲击而经常决口泛滥，经过8年风雨侵蚀的大堤，还能起什么作用？一旦6月份将花园口口门堵复成功，黄河下游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我越想越觉得心中恐惧。

突然，一阵愤怒的口号声，把我从恐怖的幻境中惊醒。我抬头一看，吉普车已停在了码头集村头。

这个村子的景象和上一个村子的景象，可大不相同了。大街小巷的墙壁上，村子内外的树木上，到处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标语。有一幅标语写得最为醒目：“坚决反对蒋介石先堵口后复堤，妄图分割解放区，水淹沿黄人民的罪恶阴谋！”我不由得向自己发问，难道说蒋介石真是这样的祸心吗？他真的不顾千百万人民的死活吗？那可要成为千古的罪人呀！

在不远处的一个打谷场上，搭起了一个高大的戏台子，戏台子上站着一位头扎白毛巾，腰束武装带的中年汉子。看样子，这个中年汉子已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他把握紧的拳头，高举在半空，不停地上下挥舞着，把面前的一张小条桌，砸击得咚咚作响。

戏台子下面，端坐着二、三千名老百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黑压压一片。可是，会场却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全都盯在了那个中年汉子身上。

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向我们走来。要说他是干部，其实和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头上戴了一顶灰色的八路军帽子（不象我们这些人，衣帽整齐，讲究穿着），这是我区别共产党干部和老百姓的唯一标志。他走到我们跟前，客气中带着强硬地口气说：“你们是黄委会的人吧？请你们参加我们的大会，听一听老百姓对蒋介石先堵口后复堤的呼声！”这简直是给我们下达了参加会议的命令。

赵守钰毫不犹豫，扭头对我们说：“先生们，走，参加共产党的会议去！”

我们一行人，对赵守钰这个似乎有点“冒险”的行动，大都不甚理解。可是，也正符合我的心意。我正想找解放区的老百姓做一做调查，看一看解放区里老百姓对堵复花园口口门是怎样想的，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便对其他的人说：“别愣着了，快跟委员长参加会议去吧。”

就这样，我们在赵守钰的带领下，跟着那位共产党的干部，走进了会场。我亲眼看到，参加会议的老年人脸上，挂满了愁苦，不断地唉声叹气；青年人脸上，挂满人愤怒，不停地磨拳擦掌；孩子们的脸上，挂满了惊恐，依偎在大人怀里，不

敢吭声，就象有什么天大的灾难，将要降落到他们头上。面对如此的场面，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

戏台上，那个中年汉子的声音更高了，一声声、一句句，震动着我的耳膜。“乡亲们，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鲜血和生命赶走了日本强盗，刚刚过上了几天安生日子，可是，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再把我们推进战争的深渊，却要在大汛之前，把花园口口门堵上，使我们这里的老百姓，也象黄泛区的灾民一样，逃荒要饭，流落异乡，这是何等的心狠手毒啊！我们对蒋介石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叫他晚堵一年花园口口门，让我们把黄河大堤修好，把险工整理好，把滩区的人民迁移出来，再进行堵口。谁料，蒋介石对我们这点最低的要求都不答应，非要在6月份把花园口口门堵复不可。在3月1日，已开始了堵口，大家说，我们答应不答应？”

“不答应！不答应！我们坚决不答应！”这愤怒的呼声，简直如春雷滚滚，惊天动地，震撼着人心。

这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领着一个年不过10岁的孩童，从人群中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满面是泪地哭诉着说：

“俺娘俩是从黄泛区逃出来的。8年前，这孩子的爹娘，还有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弟弟，都叫黄水淹死了，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收留了俺。谁知道，蒋介石又要堵口放水，叫俺再遭二次水灾，这个该死的蒋介石，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啊！”说罢，老妈妈掩面痛哭，泣不成声，会场上的人无不为之流下泪来。

我抽了抽酸溜溜的鼻子，擦了擦湿漉漉的眼睛，在心里也划了一个长长的问号，蒋介石急于堵口的意图到底何在呀？

突然，那位讲话的中年汉子出现在我们面前，问：“你们谁是管黄河的大官？”

赵守钰走上前去，微笑着说：“我就是”。

看样子，那位中年汉子还余怒未息，眼瞪着赵守钰说：“解放区的老百姓都想听你讲几句话，不知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赵守钰双眉紧锁，态度严肃，只说了一个“行”字，便晃动着他那高大的身躯，迈着咚咚有声的步伐，登上了戏台。他对着台下的群众把手一挥，大声说：“我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委员长，名字叫赵守钰，是专管黄河的事情的。乡亲们，我也是中国人，我不能叫黄河为你们造福，也绝不会让黄河给你们带来灾难。今天，我向乡亲们保证，黄河下游的堤防修不好，滩区的人民搬不出，花园口口门决不合龙，不放水过来！”他的话音刚落，一个青年汉子忽地站起来，问：“你说的话算数不算数？”

赵守钰大声地回答说：“我的话如果不算数，你就到黄委会提着赵守钰的名字骂。”

赵守钰在台上讲的那些话，也正好讲出了积郁在我肺腑中的心声。

六、秉 灯 夜 读

当日（1946年4月8日）傍晚，吉普车驶进了古称曹州的菏泽城。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唐朝末年，黄巢曾在这里聚众10万，举旗造反，严重动摇了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清朝末年，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僧格林沁，也是在这里被捻军击毙，大长了民众的志气；现在这里是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冀鲁豫行署驻地。

行署的长官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把我们安排在最好的住处——行署招待所。晚饭后，赵守钰他们被行署长官请走做客去了。其他的人，有的上街玩耍，有的喝酒寻乐，只有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端坐沉思。一路上，我看到的黄河堤防那一幕幕可怕的情景，不时地在我眼前飘来飘去，尤其是在我心中留下的那个长长的问号：“蒋介石急于堵复花园口口门的意图到底何在呀？”更是叫人百思不解，心中积满了忧郁。

这时，招待所的李经理走进了我的房间，说：“你就是堵复工程局的总工程师陶述曾先生吧？”

我向他点了点头。

他接着说：“你知道你身上的担子有多重吧？在这事关黄河下游千百万人民生死存亡的关头，你可得拿出主张，不能袖手旁观呀！”

我回答说：“李经理，请你放心，在堵口问题上，我和你都一样，怀里揣着的是一颗中国人的心。”

李经理微微地笑了。接着，他拿出四本书往我跟前一放，说：“陶总工程师，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特送你这几本书，留作个纪念。”说罢，便走了出去。

我把李经理送到门外，回到屋里一看，只见桌子上闪现出五个苍劲有力的字迹《论联合政府》。哎呀！是毛泽东写的书，我如获至宝，赶忙捧了起来。在重庆的时候，就听说毛泽东写下了这本名著，我是四处寻找，始终未能得到，没想到在这里，却见到了这本渴望已久的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招待所里十分安静。我拨亮了油灯，一字一句地阅读起来。《论联合政府》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开头第一节，就打动了

我的心弦。书中写道：“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毛泽东讲得多么恳切呀！他不但说出了解放区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也说出了蒋管区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现在，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已不存在了，按说，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能实现了，可是，蒋介石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却要无端挑起内战，制造分裂，妄图把即将实现的一个新国家，再次引向苦难的深渊。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我曾听人议论过，蒋介石为了实现独裁专制的美梦，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他调动了三个战区的20多个师的兵力，在美帝国主义飞机大炮的支持下，向豫中、鄂中、鄂东解放区大举进犯，当时，我还半信半疑。现在，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这篇著作中，列举了铁的事实，揭露了蒋介石这个要在中国搞专制的独裁者，使我对其在抗战胜利后又调兵遣将制造内战的阴谋置信无疑了。

读完《论联合政府》这篇著作，已是深夜两点了。但是，我毫无倦意，便掩卷沉思起来。难道说蒋介石急于堵复花园口口门的意图，真的和军事问题有联系吗？真的是为他搞内战又要的一个阴谋吗？我情不自禁地向自己发问起来。要不，黄河下游的堤防已失修8年，可他为什么偏偏要在下游堤防修不好的大汛之前，将花园口口门堵复呢？这个疑团在我的头脑中绕来转去，实在难找答案。

最后，我终于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我是一个中国

水利技术人员，应该站在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不管他什么军事不军事，我要凭我的良心，尽到我应尽的职责，不能在大汛之前，将花园口口门合龙，要为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贡献出我的才能。想到这里，我心里觉得踏实了许多。

夜读《论联合政府》，收效甚大，它使我明确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方向，也使我明确了中国的前途，从心里，实在是感谢那位招待所的李经理。

七、群众的呼声

第二天（1946年4月9日），我们在冀鲁豫行署派驻堵复工程局的代表赵明甫先生的陪同下，沿黄河旧堤，继续东进。这里的黄河堤防破坏得更厉害。有的地段，连大堤的影子也不见了，险工更没有了痕迹。在故道河槽里，群众还修建了村庄，开辟了道路，垦出了良田，种上庄稼，到处是一片安居乐业的新景象。

解放区的人民和蒋管区的人民就是不一样，他们有说有笑，在田间耕耘撒种，放牧牛羊。干着活的小伙子，还亮开嗓门，唱起了山东梆子。我心里想：还是解放区好啊！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你是不会看到这样的场面的。如果全中国都象这里一样，那该多好啊！

赵明甫先生走过来，告诉我说：“在解放区政府的领导下，这里已建立了互助组。今年，旱象十分严重，一冬春没见雪雨，要是在往常，麦苗早干枯了。但是，这里的人民响应解放区政府的号召，挑水浇小麦，抗旱保丰收。你看，这里的小

麦不是照样长得很好吗？还是组织起来力量大呀。”

我连连地点头，不住地称赞着说：“是呀，是呀，组织起来就是力量大。”

正当我兴奋不已之际，突然，传来一个刺耳的声音：“那几个人不是管黄河的大官吗？走，找他们算账去，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要放水淹我们老百姓？”说话间，几十个怒气冲冲的庄稼人，向我们走了过来。看那阵势，简直要和我们拚命。

人们那副欢乐的笑脸不见了，个个都是怒目圆睁，如临大敌。我已经见到过码头集那次大会的场面，再加上对解放区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所以我不那么胆怯了，反而笑嘻嘻地问他们：“你们都忙着了？”

对我的问话，那群庄稼人没有理会，照样是怒挂脸上。刚才在唱戏的一个小伙子，把胸脯一挺凑到我的跟前，说：“你们这些管黄河事的大官们，心眼也太狠毒了！你们说，为啥要把花园口口门堵上，引黄河水过来淹我们？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受黄河的害，受得有多大？俺爹俺娘都是叫黄河水淹死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被黄水冲走，至今没有音讯，全家只剩了我一个人。现在，我刚娶了媳妇，有了家，你们又要放黄水过来，你说，你们安的是什么心？”说着，小伙子双手把脸一捂，竟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为啥要把花园口口门堵上？为啥要放黄水过来？我也说不清楚，那是蒋介石的主意，我没法给小伙子讲。对小伙子的声声控诉，我只能进行一番劝慰：“小伙子，甭害怕，现在我们是不会放黄水过来的。等你们把大堤修好了，我们再把花园口口门堵上，放黄水过来。你们这里不是常遭旱灾吗？我们在黄河上修一个大水闸，你们什么时候需要用水，就什么时候提闸

放水。以后，再遇到旱灾，就不用挑水浇地了，叫黄河替你们浇就行了。你说，这样不好吗？”

小伙子摇了摇头，不相信地说：“你说的怪好听，蒋介石会听你的？”

是啊，蒋介石让不让这样办呢？我对那群庄稼人说：“乡亲们，我是水利工程师，蒋介石如果不让我们那样干，我就捆行李走。乡亲们放心吧，我绝不会用我的手，将花园口口门堵上，放黄水来淹你们。”

这时，一位陪同我们的解放区干部走过来，对他们说：“让黄水回归故道，是党中央、毛主席同意的。大家知道，自从蒋介石用炸药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之后，时至今日，在黄泛区还有600多万同胞过着有家不能归的生活。为了使他们早回家园，安居乐业，党中央、毛主席才同意将花园口口门堵上，让黄水回归故道。但是，我们必须得把黄河大堤修好，才能堵复花园口口门。我们反对的是蒋介石先堵口后复堤的做法。”

“毛主席同意，我们也同意。”

“毛主席叫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对，我们听毛主席的。”

人们纷纷地议论着。

看来，毛主席在解放区人民的心目中，威望非常高。

八、民意难违

一路上，我们所到之处，不论是解放区的干部，还是解放区的老百姓，一提起“先堵口，后复堤”的做法，无不义愤填膺，恨入骨髓。有些大地主、大绅士也反对这种做法，就连国

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在济南也曾发表过讲话，表示对“先堵口，后复堤”的做法，不够理解。

通过几天对黄河下游堤防情况的勘察，也不知是赵守钰劳累过度，还是有什么心事。在回来的路上，他很少说话，不停地长吁短叹，脸上密布着愁云，显得疲惫不堪，大减了他那将军的风采。

我问赵守钰：“委员长，你真的不知政府当局急于要堵复花园口口门的意图吗？”

赵守钰愤愤地回答说：“鬼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我象是自言自语，实际上，是专门把话说给赵守钰听的。

“如果按照塔德的计划，在6月份将花园口口门合龙，正值黄河大汛将至。眼下，黄河堤防又破烂成这个样子，一旦黄水过来，黄河两岸1,200万同胞的生命财产，眨眼之间，就要付之东流，冀鲁豫三省就会变成一片汪洋，成为第二个黄泛区，这是多么可怕的灾难啊！蒋介石要成为千古罪人，我们这些治水的人，也会被万世唾弃。”

赵守钰连着向我摇了摇头说：“陶总工程师，你不要再说下去了，现在我心里正难受得厉害。”他有气无力地叹了口气，又接着说：“我们这些治水人，在当今这个时代里，要想象大禹那样，充分发挥自己的治水才能，造福于子孙万代，的确是难啊！但是，也不能奸民心，违民意，给人家造成祸害，我已考虑再三，你回到花园口以后，要赶快对工程情况详细考察一下，作出一个新的施工方案，叫塔德的施工方案立即下马！”他把大手一挥，又象跃马于战场上的将军。

我一听，异常兴奋地说：“委员长，我们俩想到一块去了。不过我们这样做，政府当局会不会同意？”

赵守钰坚定地说：“谁不同意谁来干！只要他们还让我当这个堵复工程局的局长，我就这样干，并且干到底！陶总工程师，我给你说句掏心的话吧，现在，我这个人也十分满足了。带兵的将军我当过，眼下又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委员长，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将，我都尝到了滋味，虽然没给人民建树功勋，但是，也没做有愧于人民的事情。这一次，大不了，他们把我的黄委会委员长给撤掉，那更好，无官一身轻嘛，我回家当我的老百姓去。想叫我先堵口后复堤，我是坚决不干！”

赵守钰这种推心置腹的表白，使我大为感动。我向他表示说：“委员长，请你放心，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保证跟你干到底！要辞职，咱俩一块辞，要撤职，叫他们把咱俩一块撤！”

赵守钰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陶总工程师，我感谢你对我的相信。”

4月15日，我们勘察黄河后，返回了菏泽城。下午7时，在菏泽交际处，赵守钰、左起彭、孔令榕等与冀鲁豫行署的长官段君毅、贾心斋、王笑一、成润、赵明甫等人，举行了关于黄河回归故道的谈判。在谈判中，冀鲁豫行署的代表提出了“复堤、浚河、裁湾取直、整理险工等工程完竣后，再行合龙放水”的合理要求，并且达成了黄河回归故道问题的《菏泽协议》，双方代表，都在这个协议上签了字。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认为，这个协议是公正的、合理的。它既符合黄泛区人民的利益，又符合沿黄人民的利益。只要双方都能按协议办事，花园口口门的堵复工程，就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九、新 施 工 计 划

1946年4月16日，我回到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二天，中央通讯社却发出了这样一则消息：“黄河堵口复堤决定两个月内同时完成。”我听到后，感到十分气愤。政府当局怎么能这样出尔反尔，不守信用啊？《菏泽协议》的墨迹还未干，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将自己亲手签定的协议，又亲手撕毁，难道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嘛？

我气呼呼地走进赵守钰的办公室，问：“委员长，中央通讯社发的消息，你听到了吗？”

赵守钰也很生气，说：“我听到了，甭管他那一套！你赶快到花园口堵复工地去，把新的施工方案拿出来。我们堵复工程局坚决按《菏泽协议》执行！”

按照赵守钰嘱咐，4月18日一早，我乘车驶向了花园口。来到堵复工地一看，使我大感震惊，花园口口门的堵复工程，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施工。以塔德为首的外籍工程技术人员，态度十分蛮横。他们一不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协商，二不经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同意，便自作主张，把堵口用的桥梁材料、木船、汽船、推土机、开山机、钢轨、斗车、汽油、修理机械等大量器材，运到了工地，投入了施工；河南省政府组成的招工、购料委员会，正在招收民工，购运秸料；从广武车站通往花园口的运石铁路，已做好路基，正在铺轨，整个工地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到处都是忙乱不堪。怪不得下游人民感到如此的惊恐，如此的愤怒。在这里，大有两个月内将花园口口门堵复合龙之势。

在花园口口门工地上，施工更为紧张。塔德亲自督战，外国工头手挥皮鞭，似凶神一般，中国的民工抬石扛木，拚死拚活地卖着命。眼前的情景，使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刚从日本人手里解放出来的中国老百姓，怎么又在美国人的皮鞭下受人欺凌呢？

花园口口门的宽度原是1,460米，河泓靠东坝，西部为浅滩。现在，西坝的捆厢进占已做了1,060米，口门只剩下了400米，河流流向东南，水深处是6.5米，深泓在中间，水流并不急。东部口门准备用栈桥抛石，平堵合龙，已经立好了打栈桥木桩的打桩架，堵口合龙的气氛十分高涨。

我正看得入神，塔德走了过来，用手拍了拍肚皮，神气地说：“陶先生，你们中国人，有的说我在两个月内难以把花园口口门堵复合拢。这回，我非得做出个样子来不可，叫你们中国人看一看我的能耐。”说罢，他张开大嘴，哈哈地笑个不停。

面对这个不可一世的洋人，我回敬他说：“我们中国人不愿办的事情，谁也甭想办成！”我扭头走了。

通过两天的仔细观察和调查了解，我基本上掌握了花园口口门现在的堵复情况。同时，也看出了塔德在6月份将花园口口门堵复合龙的不利因素。因此，我那颗惴惴不安的心，才稍觉平静了一点。

4月20日，我在东坝头附近一个农民家的破土屋里，经过反复推敲，认真琢磨，终于制定了一个堵复花园口口门的新施工计划。方法如下：

第一，复堤工程和河槽的裁湾取直工程本年11月底完成；加培堤工程明年4月完成。

第二，堵口工程，大汛前仅做成西部浅水捆厢进占800米，留下东部深水工程，于本年10月初复工，12月底完成，黄水于12月间回归故道。

第三，利用已回归故道的黄水，运输沿河险工所需要的石料，整理险工工程及修防备料，明年6月底以前办完。

第四，本年大汛期前，加强防泛新堤，开通涡河通泛区水道，分浅洪水，减轻泛区灾情。

新的施工计划制定好了，尽管我身体十分疲劳，但是，浑身却感到有说不出的轻松和愉快。我作为一个治理黄河的总工程师，总算为沿黄人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当即，我带着新的施工计划，找到了赵守钰。赵守钰一看，连声说好，拍手叫绝，“哎呀，真没想到，你办事如此神速！”

十、敢与洋人争高低

1946年4月21日，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堵复花园口口门工程局局长赵守钰的主持下，讨论了我的新施工计划，并确定了我的新施工计划。

早8点，参加会议的人员，一个个走进了赵守钰的办公室。塔德，脸儿拉得很长很长，一声不吭地端坐在会议桌前。赵守钰和往常一样坐在会议主持人的位置上，心平气和地说：

“各位先生们，在今天的这个会议上，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陶述曾总工程师对堵复花园口口门的工程问题，又制定了一个新的施工计划。这个计划事关着沿黄千百万同胞的安危，十分重大，希望各位先生，各抒高见，然后，再报行政

院水利委员会审批。下面，就请陶述曾总工程师将新的施工计划，向各位先生宣读。”

这时，我的心脏跳动得异常厉害，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我强抑制住激动的心情，不慌不忙地翻开了新施工计划。说：“各位先生，我跟随赵守钰委员长，通过对黄河下游8天的勘察，对堵复花园口口门工程的实地调查，我认为，塔德先生的施工计划，必须得马上停下来！”

我刚讲到这里，塔德忽地站起来，大声嚷着说：“我抗议！我抗议！”

赵守钰微笑着向他招了招手说：“塔德先生，急什么？你听陶总工程师把话说完嘛！”

我对塔德的蛮横态度，连眼皮也没翻一下，又继续说：“我认为，停止塔德先生施工计划的理由有四条：第一，下游700多公里长的复堤工程，包括改善、化除险工，恢复护岸工程，不可能在两个月内完成。对于这一情况，凡是参加勘察黄河下游的先生们都亲眼看到了。塔德先生也不会看不到吧？第二，在堵口工地上，虽然施工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但是稍有堵口知识的人都能看得出，堵口的物料差得太多了，尤其是堵口的主要材料——石块，至今还一块没有。石块要从黄河北岸的潞王坟石场开采，可是，通向花园口的运石支线，连铁轨还没有铺好，就是最近能把铁轨铺好，运石的车辆在哪里？机车又在哪里？当前，正值抗战刚刚结束，平汉铁路的运输相当紧张。根据黄河铁桥的通车能力，一天，也只能增加两列运石列车的来往，最多能运500方石块。大家都知道，堵口所需要的石块是6万方啊！就算4月底铁路能正常运石，6月底也运不够所需石块的一半。先生们，堵口进行中，要是出现了停工待料的现象，将意味着

什么，这是大家都会知道的。所以，6月份的合龙计划是不能实现的。第三，就算6月底能够完成花园口口门的堵复工程和黄河下游的复堤工程，现在的施工计划也得停下来。在座的先生们都知道，堵口合龙之时，正是大汛将到之日，凶猛的洪水，一旦注进新的河槽，700多公里长的新修堤防，随时随地都有被冲决的可能，黄河还会出现新的‘花园口’泛滥，这将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什么样的灾难？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再说，我们的国家久经战乱，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还能够花这么多的人力、财力来冒如此大的危险吗？第四，现在，我们的堵口复堤工程局，连一张堵口复堤示意图都没有。堵口到底怎样堵？复堤到底怎样复？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竣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完工？在座的各位先生们，恐怕谁也不知道，起码我这个堵复工程局的总工程师是不知道的。根据上述的四条理由，我建议堵复工程局和赵守钰局长，现在的施工计划必须要马上停下来，打桩机要马上卸下来，对西坝的捆厢进占1,060米，要马上拆除200米，以防口门被洪水刷涤，给今后的复堤堵口带来困难。”

我的四条停工理由，得到在座的人频频点头称是。接着，我便当众宣读了我的新施工计划。大家都说我的新施工计划制定的好，表示坚决按我的新施工计划堵口。

突然，塔德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对我威胁说：“陶述曾先生，你要知道，我的施工计划是联总同意的，你们的蒋介石委员长和宋子文行政院长支持的，如果你们胆敢停止我的施工计划，联总就不参加你们的堵口，也不提供你们堵口用的器材，我看你们怎样使花园口口门合龙！”

对于这个洋人的公开挑衅，我怒发冲冠，拍案而起，针锋

相对地说：“塔德先生，请你对中国人尊重一点！从古到今，上下几千年，我们中国人在黄河上堵口上千次，堵口都是堵得很好的。如果你真要撤走的话，我们绝不强留。要是没有你们插手，会办得更好！”

塔德暴跳如雷，大声吼叫着说：“你们如此对待我们美国人，我要到南京找蒋介石、找宋子文告你们去！我要到联总控诉你们去！”

赵守钰把大手一挥，高声说道：“塔德先生，那就随你的便吧！”

塔德把门咣当一甩，冲出了办公室。

对于塔德的这个举动，大多数人都感到气愤，但是，也有少数人感到惊慌。

赵守钰说：“陶总工程师，你带着新施工计划，赶快去南京，当面向薛笃弼委员长报告，争取早得到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的支持，以防塔德告状，使我们被动。”

我坚定地点了下头说：“是，我明天就到南京去。”

十一、周副主席的关怀

1946年4月22日，我怀揣着新的施工计划，登上了飞往南京的飞机。我心里犹如灌满了铅水，只觉沉甸甸的。在当今这个时代，想办一件对中国人民有益的事情，简直如逆水行舟，实在难得很呀！我心里不住地暗暗思忖着：新的施工计划水利委员会要是批不准怎么办？经过再三考虑，我横下了一条心，批不准我就辞职，那怕是回家当老百姓，也不能执行塔德的那个祸害人民的施工计划。

到南京之后，我很快见到了薛笃弼委员长。薛笃弼对我的施工计划连着看了好几遍，并和塔德的施工计划作了认真的比较，不住地说：“好，你这个施工计划做得好，想得周到，有见地。”

他的话，使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接着，在薛笃弼的亲自主持下，行政院水利委员会专门召开了新施工计划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张含英、沈伯先及其他高级水利工程技术人员须恺、杨乃俊等。通过认真地讨论，反复地研究，新施工方案很顺利地通过了。最后薛笃弼表示说：“陶总工程师，你先回花园口去，不久我也要在那里去，对如何执行新施工计划问题，再作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天，我正准备启程返回花园口，万万没有想到，我北大时期的老同学齐燕铭走进了我的房间，久别重逢，更有一番衷情。他热情地抓住我的手，亲切地摇晃着说：“老同学，多年不见，一向可好？”

我知道，齐燕铭已是加入共产党多年的党员了，现在跟随周恩来副主席作秘书，是个办事既大胆、又谨慎的人物，在北大读书时，我对他都非常佩服，谁能想到，我们却在这个时候，相会在南京。

我说：“老同学，你找我有什么事？甭看我是在国民党里混饭吃的人，如果用着我的地方，本人是甘效犬马之劳的。”

他走到我的跟前，压低声音说：“老同学，我这次来，是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专门来看望你的。并且，还要我代表他，请你在南园饭店吃饭，表示他对你的感谢。”

我连连摇着手说：“哎呀，我的老同学，你甭说玩笑话了，我有何功何德，能担当起周副主席对我的问候？”

齐燕铭一本正经地说：“老同学，我给你说的不是玩笑话，完全是真的。周副主席说，你的堵复花园口口门的新施工计划，是为沿黄千百万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他表示对你十分感谢。”

顿时，我只感心里热乎乎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心想：当今的中国是千孔百疮，伤痕斑斑，他为了实现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没白没黑地操劳费神，没想到他还关心着我的施工计划。我对齐燕铭说：“我是一个中国水利技术人员，凭着我的一颗中国心，也不能执行一个祸国殃民的施工计划。我的施工新计划，只不过是對我苦难同胞应尽的一点义务。老同学，请你转告周恩来副主席，我衷心地感谢他对我的关心。”

齐燕铭说：“周副主席本来要亲自来看望你的，可是，你要知道，现在，美蒋特务对他的一举一动都监视得非常严密。他怕危及到你的安全，才让我代表他来的，並请你谅解这一点，以后的日子长着哩。”说着，他拉起我的手，就要往外走，“老同学，闲话少说，咱们到南园饭店去，边吃边说。”

我急急慌忙地摆着手说：“周副主席的盛情我领了，这吃饭的事，就免了吧。”

齐燕铭三分玩笑，七分认真地说：“这是周副主席的嘱托，我可没权力更改。”他把我拉出门去，推进轿车，便直奔南园。

饭菜虽不丰盛，但是，我吃得非常香甜。尤其是齐燕铭对我的谈话，更觉得倍受教益，使我深深感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希望，有前途。

4月22日，我从南京返回到花园口，对此次之行，向赵守

钰作了全面汇报。堵复工程局当即作出决定，停止塔德的施工计划，按照我的新施工计划执行。在当时，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新闻界纷纷派记者登门采访。赵守钰毫不含糊，当众宣布了改变合龙日期的决定，并很快见了报。尽管如此，我那颗紧张的心，始终没能安定下来，因为塔德还在南京，不知他又耍什么花招，所以，我必须得时时等待着新的斗争。

十二、宋子文的来电

1946年4月30日，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薛笃弼，带领着张含英、须恺、杨乃俊等一批高级水利专家，从南京来到了花园口。当天，在赵守钰和我的陪同下，对花园口口门的堵复工程，进行了全面的视察，对施工情况作了详细的了解。他当场对大家表示说：“按照现在的施工计划进行，花园口口门想在6月份合龙，是根本不可能的。”并且，又一次肯定了我的施工新计划。

5月1日，在郑州堵复工程局材料厂，在薛笃弼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一次有主要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辩论会。在这个辩论会上，把我的新施工计划和塔德的施工计划全都摆了出来，让专家们充分发表意见，反复酝酿论证，究竟执行那一个施工计划好。经过辩论，不论是南京来的专家，还是堵复花园口口门工程局的专家，大多数人都认为，还是我的新施工计划好，今后的堵口工程，应该按照新施工计划执行。尽管有少数人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但是，也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

最后，薛笃弼和在南京的态度一样，又一次发表了讲话，支持我的新施工计划。他说：“陶述曾总工程师，怀有忧国忧

民之心，对于堵复花园口口门的工程问题，大胆地推翻了原来的施工计划，这个施工计划还是美国工程师制定的，经联总同意的，并且，又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新的施工计划。在当今，象他这样的工程师，真是难能可贵。所以，我代表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坚决支持新施工计划的执行。”说罢，他站起身来，面带笑容，走到我的跟前向我握手祝贺，会场内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说实在的，那阵子，我心里也感到热乎乎的。在那种年代，一个正义的举动，能得到如此一级官员的支持和肯定，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薛笃弼向大家笑嘻嘻地摆摆手，又接着说：“从现在起，你们就把原来的施工计划停下来，按新施工计划执行。各位先生们，实在对不起，南京还有许多公务，等待我处理，所以，难以久留，须马上回去，请各位多多包涵。”他走到大家跟前，一一握手告别。我们也都向他招手送行。

薛笃弼拉开屋门，两只脚刚刚迈出门槛，突然，他的秘书双手拿着一份电报，慌里慌张地跑过来，说：“薛委员长，行政院长宋子文给你来的特急电报，是关于堵复花园口口门的指示，请你火速传达。”

宋子文的电报指示？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吉凶如何。我那颗稍觉轻松的心，又一下剧烈地跳动起来。这时候，我才忽然想起来，塔德去南京至今还没回来，难道说，他告状真的告成功了？但，转念又一想，薛笃弼刚刚表示了如此坚决的态度，就是情况有所变化，他也绝不会将自己说的话推翻的。我把目光紧紧地盯在他的身上，仔细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薛笃弼拆开电报一看，只见那副笑眯眯的脸上，霎时布满了乌云。他略一沉思，又转身走进屋内，不笑强笑地向大家说：

“请各位先生坐好，我向大家传达一下宋子文院长，关于对堵复花园口口门的电报指示。”

他的手在颤抖，他说话的声音也在颤抖。接着，薛笃弼就象口吃了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宣读起宋子文的电报。“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前经决定，于本年枯水时期修复。兹闻黄河水利委员会据鲁豫两省河工局报告，以下游工程未能赶筑，已定堵口工程缓至秋后举办，此事关系重要，未宜遽定缓修，且国际视听所系，仍应积极兴修。已电飭交通部，迅速修筑未完工之铁路，准备列车，赶运潞王坟之石方前至工地，希速飭依照原定计划积极提前堵口。如有实际不能完成堵口时，届时可再延缓，此时未宜决定从缓也。”宣读完毕，他又接着说：“请各位注意，刚才我说的话全部推翻，一字不算，坚决执行宋子文院长的指示，按原施工计划堵复花园口口门。”

果然是塔德告的状。我一怒之下，拍案而起，大声呼叫着说：“我真不理解，我们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的首脑，为什么这样惧怕一个外国人！难道说沿黄千百万同胞的生命，国家千百万资财，还没有一个塔德的失败计划重要？他们这样做，该怎样向人民交代啊！”

薛笃弼慢条斯理地说：“陶总工程师，你不要这样说话嘛！一个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对一个问题的决定，总有他的全面考虑的。宋子文院长之所以发来如此重要的指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你们只有坚决地执行！”

我怒气未息，正想再说些什么，赵守钰忽地站了起来，板着面孔说：“这样的指示，我没办法执行！我作为堵复工程局的局长，不能做出尔反尔的事情，让人们耻笑。”

薛笃弼笑吟吟地说：“赵委员长，请你不要发火，对于宋子文院长的指示，传达不传达是我的事，执行不执行是你的事，那你就看着办好了。”说罢，他连招呼也没打，便带着他的一班人马，走出了会场。

在为薛笃弼一行人送行的路上，我对我的老朋友张含英说：“你原来也是水利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因堵口失败，上司把责任推在了你的身上，撤掉了你的职务，虽没遭大灾大难，也窝囊了好一阵子。你知道，塔德的堵口计划是不尊重科学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到时候，他们把失败的责任，会不会也推到我身上？我一直在担心着这个问题。”

张含英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人心可畏，事情难料啊！”

我说：“真没想到，薛笃弼这个人，说话也如此不负责任。”

张含英说：“按说，薛笃弼也是个好人。不过，在当今的现实面前，他变得越来越谨慎，越来越怕担责任了。不过，有一点，请你尽管放心，一旦花园口堵口失败，只要上司不追究，他是绝不会把责任推到你身上的。”

忽然，我想起了一个可疑的问题，急忙问张含英：“你说，政府对堵复花园口口门，真的会有别的意图吗？你是身在南京的人物，有没有听到其他的消息？”

张含英苦笑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也是个谜。很难说清楚。只愿政府只为堵口而堵口，千万别再生出有损于国民的意图。”

就这样，我把他一直送上火车，两颗忧愁的心，才惜惜相别。

十三、将军们到工地

宋子文“依照原定计划积极提前堵口”的电报指示，很快传遍了黄河两岸，引起了沿黄同胞的极大愤慨。他们纷纷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这种不顾下游人民的死活，强行堵口合龙的做法。中共延安《解放日报》连着发表了《国民党固执花园口堵口合龙，冀鲁豫人民群起抗议》，《制止国民党水淹五省》，《政府既有堵口放水自由、人民自有拚死自卫办法》等文章多篇，揭露国民党政府加紧花园口堵口工程，限期合龙放水，配合其以军事行动进攻解放区、毁灭人民的阴谋。这正义的呼声，在国民党内，也引起许多人的同情。

听到这样的消息后，我这个历来不问政治的水利技术人员，真是不敢相信，整天高唱“仁政”、“爱民”、“爱国”调子的国民党政府，竟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从古至今，用自己国土上的洪水，淹自己国土上的人民，恐怕也是前无此事的。这个罪恶的当局啊，真是让人痛恨得发指。我暗暗地横下了一条心，就是钢刀压在脖颈上，也绝不执行那个罪恶的施工计划。

薛笃弼走后不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又给赵守钰来了一份电令，说是白崇禧、胡宗南、范汉杰等将军们，要来花园口工地“视察”、“参观”，要他必须做好迎接的准备。此事就更叫人迷惑不解了。我问赵守钰：“赵委员长，花园口堵口工地，既不是战场，又不是军事重地，这些将军们来‘视察’什么？‘参观’什么呀？”

赵守钰愤愤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看来，他

对这个问题，也是想不通的。

我说：“政府当局和中共签定的堵口协议上，不是明明写着堵口‘不受任何军事政治影响’吗？难道说政府当局真的是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把自己亲手签定的协议，又亲手撕毁吗？”

赵守钰说：“这是他们善玩的伎俩。如此的政府不垮台，那才真叫怪哩！”

1946年5月5日，天空阴沉沉的，还下着蒙蒙细雨。真没想到，在这样的天气里，白崇禧、胡宗南、范汉杰等一帮大将军们，在前呼后拥中，果然来到了花园口堵口工地。真可谓不辞劳苦啊！

赵守钰和我及其他工程局的负责人，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组织起“欢迎”的人群，陪同着他们对花园口堵口工地进行“视察”、“参观”。

这些将军们来到工地后，一不问黄河下游复堤工程情况，二不问堵口进展的怎样，只是大谈历代的将军们，如何以水代兵，战胜敌人的壮举。

胡宗南抖了抖披风，来到赵守钰跟前，说：“赵委员长，我听说你在冯玉祥老将军部下，曾任过骑兵师长，也是将军之列。作为军人，我想你是懂得的，如果在6月份能将花园口口门堵合，从当前的局势看，可胜过十万雄兵啊！”

赵守钰冷冷地回答说：“胡将军，你知道，我现在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委员长和堵复工程局的局长，不是带兵的将军，只知道堵合花园口口门，是为了解除黄泛区600万同胞的灾难，同时，也不让黄河下游1,200万同胞再遭洪水蹂躏，不懂得这十万雄兵，从何说起，请胡将军多多原谅。”这时，白崇禧

走了过来，用命令地口气说：“赵委员长，为了党国的利益，你在6月份，必须要把花园口口门堵合成功，让黄水回归故道。”

赵守钰说：“白将军，你知道，现在，我执行的是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的命令，就是执行你白将军的命令，也必须得经过水利委员会的同意。”

真相终于大白了。他们和赵守钰的谈话，一字一句，我都听得十分清楚。政府当局要堵复花园口口门的目的，是为了分割解放区，水淹黄河下游1,200万同胞！我不由地仰天长叹，政府当局啊！你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十四、又一个难执行的计划

我的新施工计划被否决，的确使人更加感到心灰意冷了。我好象隐隐觉得，中国人民还要遭受一场更大的灾难，更大的浩劫。

赵守钰一天到晚阴沉着骇人的面孔，就象有满腹的牢骚无处发泄一样，说出话来冲的十分厉害。我知道，他心里也不好受啊！

1946年5月15日，水利委员会给赵守钰来了一封电报。他烦得连电报也不愿拆了，便对我说：“他们那些老爷们放不出什么好屁来，你替我拆开看看吧。”

我打开电报一看，顿时，我那颗冰冷的心，多少又增添了一点活力。电报上说，要赵守钰马上去南京开会，重新讨论堵口计划的问题。我心里暗想，看来我的新施工计划，说不定还有实现的希望。接着我便对赵守钰读了电报的全文，并向他谈

了我那个侥幸的想法。

赵守钰向我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说：“陶总工程师，你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这不过是个美好的幻想，根本没什么希望。这次会议，你能替我辛苦一趟吧？说实在的，象这种嚼舌头、磨嘴皮的会议，我是再没有气力参加了。不过，对于花园口堵口的问题，我们执行新施工计划的决心，不能动摇！不能更改！那怕是撤职查办，也得坚持到底！”

我当即表示说：“赵委员长，请你放心，在这次会议上，我一定据理力争。”

5月16日，我到达了南京，住在了旅馆里，真没想到，竟和中共代表团的赵明甫碰在了一块。我们是在勘察黄河下游堤防情况时认识的，当时，由于对花园口堵口问题的看法比较一致，我对他的印象一直是很深很好，所以，这次见面，更感亲热。

赵明甫对我说：“周恩来副主席听说你的新施工计划被国民党当局否决以后，非常气愤，对你也非常同情。5月3日，他在南京，向各界人士发表谈话，召开演讲会，揭露国民党当局否决你新施工计划的错误做法，并向行政院提出建议，重新召开有黄河水利委员会、联总、中共三方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再次讨论花园口堵口问题。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时至今日，象周恩来副主席这样的大人物，还在关心着我的新施工计划，并且还如此地劳心费神，真使我从心底深处感激不尽。是啊，对于新的施工计划，两个政府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究竟哪个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就是傻瓜也会清清楚楚。我激动地对赵明甫说：“在这次会议上，我一定大胆地与他们争斗，争取重新实现新施工计划

的执行。”

5月17日，在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内，开始了三方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各方代表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会议整整进行了一天，以无任何结果而暂时休会。

5月18日，三方会议继续进行。事经一夜，那帮老爷们也不知搞了一些什么名堂，参加会议的人员刚一到场，塔德的助手张季春，对于花园口堵口问题，突然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他说：“各位先生们，考虑到黄泛区同胞和黄河下游同胞的双方利益，本人草拟了一个堵口的折衷方案，望各位代表，多多发表高见。”接着他便向大家宣读起来。

折衷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打桩继续进行；限制石坝的高度，使洪水一半流入故道，一半流入泛区；至于抛石与否，须待6月15日前，视下游工程进行的情况，然后经双方协议决定；如决定抛石，亦以不超过两米为限。

同时，张季春还为这个折衷方案提出了许多数据，讲了许多道理。

他的话音刚落，塔德马上表态，支持这个折衷方案。

参加会议的人都明白，塔德虽是个外国人，可他的话就是代表国民党政府的。所以，对这个折衷方案谁也没有吭声，谁也没表示任何态度。只有中共代表持保留意见。会议至此，又二次暂时休会。

回到旅馆以后，赵明甫对我说：“陶总工程师，你看出来了没有，张季春提出的这个折衷方案，完全是个骗局。你想想，只要我们同意6月份抛石，他们一鼓作气，将石头抛出水面，洪水就会完全流入故道，到时候，你有什么办法控制？还不是对下游人民造成灾难吗？”

我说：“我也知道张季春提出的这个折衷方案是骗局，他们的目的，还是在6月份合龙上。但是不宜反对，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个折衷方案既照顾了黄泛区人民的利益，又兼顾了黄河下游人民的利益，并且，他说得好象还很有道理。如果反对这个方案，一定会有很多人不理解。不过，有一点请你放心，他的这个折衷方案，我敢断定，也是一定要失败的。你想，在那飞沙滚滚的河床上，散抛一座石坝，会能成功吗？看来张季春讲得头头是道，好象也很有科学道理，实际上，他是个不懂科学的人，起码是个缺乏在黄河上堵口知识的人。我看，明天的会议上，你不要反对这个折衷方案。”

5月19日，举行第三次会议，除塔德、张季春等少数几个人，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以外，其他的人依旧一言没发。中共方面也原则上同意了折衷方案。但是，他们又提出，什么时候抛石，必须要由中共、黄河水利委员会、联总三方，各派两名代表，组成6人小组，到工地视察后决定。就这样，张季春提出的折衷方案，被草草地通过了。

我对这个折衷方案，虽然也投了赞成票，但是，心里却象塞了一团乱麻，有说不出的窝囊。一个水利工程技术人員，眼看着成功的堵口计划不能执行，却去执行一个失败的计划，心里能不难受嘛？可是，社会现实就是如此，你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呀？

十五、辞 职

我从南京返回花园口，到工地一看，真叫人火冒三丈，塔德连折衷方案也没执行，执行的还是他那个6月份合龙的原施

工计划。

我闲着没事，便又重新考虑我的新施工计划。我知道，不论6月份合拢的原施工计划也好，还是张季春的折衷方案也好，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不尊重科学的，除耗费国家大量资财外，结局是一定要失败的。归根结底，必须还得走我新施工计划的路子。因之，为了使新施工计划更加臻于完善，我又做了一番研究，进行了修改。

我估计，在执行新施工计划过程中，堵口用的主要材料——石方，单靠一个潞王坟石料场是难以承担的。我想在黄河南岸新郑县境内的和尚桥车站，再开辟一个新石料场。经过赵守钰的同意，5月23日，我和材料处长瞿绂章，乘吉普车赶往现场勘查，不料，在回来的路上，吉普车翻进了沟里，使我的右肩关节受了重伤。

赵守钰听说我负伤的消息后，对我十分关心。他亲自把我送进郑州医院，并让工程局副局长李钟鸣赴洛阳乐平镇，请来了有名的骨科医生郭神仙，为我治疗。就在治疗期间，当我再一次意识到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内战的需要，确要堵合花园口口门，妄图用洪水残害百万受苦人民的时候，我觉得到了实践自己诺言的时候了，我决定：辞职！

在病床上，我用左手，向赵守钰写了辞职信，并对堵复花园口口门的问题，再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第一，对6月份合龙成败的看法。这次合龙如果成功，下游就会造成新的泛区，那损失就太大了。如果堵口失败，只不过损失一些工料，比较起来微不足道。

第二，合龙危机时，必须尽力保护好东坝头。东坝头是阻止口门向东扩大的最后据点，千万大意不得。

第三，抛石抢护桥桩时，应从东坝头起向西抛，这样，对东坝头就起到了保护作用。如果从西坝头抛起，无异于做挑水坝，挑溜冲击东坝头。

第四，请促成整修开封防泛新堤和涡河分流计划的实现，以减轻泛区灾情。

赵守钰看了我的信件之后，大为悲伤。他痛苦地对我说：“陶总工程师，你跟着我没少吃了苦，没少出了力，也没少受了窝囊气，但是，我对你的新施工计划，却爱莫能助，心里实在感到有愧，请你多多原谅。你愿意走，你就走吧，我不强留你。这里实在不是人呆的地方，等你走了以后，我也要……”他的话没有说完，又咽了回去。

我急忙说：“赵委员长，你可不能走我这条路啊！这里不能没有你。”

他忽地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不，你走了以后，我也要辞职。我不忍心眼看着我们的同胞在洪水中受苦受难。”

就这样，我们的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我说：“赵委员长，我们共事一场，志同道合，情如手足，我明天就要启程，请你多保重吧。”说罢，洒泪而别。

1946年5月30日，我眼含着热泪，离开了花园口堵口工地，又重新回到了重庆。

十六、身居山城望黄河

重庆，是座美丽的城市。它上有青山，下有绿水，青山绿水相互辉映，真如一幅缤纷多彩的图画。可是，在这座图画般的山城里，我却食而无味，寐而不甜，天天都要北望黄河一

番，牵挂着花园口的堵口工程。我虽然知道，塔德6月份合龙的堵口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总恐怕一万中出现万一，塔德真的将花园口口门堵合成功，那将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第二个更大的黄泛区。因之，凡是从北边来的人，只要是我认识的，便亲去打听消息。

7月间，河南灾民请愿代表团团长张鸿烈先生来到了山城。闻讯后，我赶忙找到了他，询问花园口的堵口情况。

张鸿烈先生告诉我，自从我离开了花园口堵口工地以后，塔德对工程抓得很紧。因为大多数中国工程技术人员，都支持过我的新施工计划，塔德对他们非常不放心，不论是施工，还是监工，凡是重要的位置，全都换上了美国人和白俄技术员。他夸下海口，一定要让花园口口门在6月份合龙。谁知，正当造桥工程完成，桥面铁路通车，并开始运石抛护之际，黄河水位剧然上涨。

6月26日这天，北风骤起，波浪滔天，大溜顶正冲桥桩，桥身发生了剧烈的摇动。第二天，大溜更加凶猛，连着冲走了四排桥桩，桥身也从中间折断。塔德6月份合龙的计划，终于化为泡影了。

谁能想到，塔德对于堵口失败的责任，不但不承认一点，反而推在了堵复工程局的身上，说堵复工程局领导无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能。赵守钰一怒之下，辞去了局长的职务，也离开了花园口堵口工地，就连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薛笃弼也自请处分，这怎能不叫人义愤填膺啊！

花园口口门6月份合龙的计划彻底破产了，黄河下游人民可以免受黄患之苦了。这是一个令人值得高兴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善于混淆视听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却偏

偏发出了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消息：“关于黄河堵口工程，近日花园口通讯说是‘进行顺利’。”这荒谬的宣传，达到了何种厚颜无耻的地步。

为了澄清事实，让全国同胞明白花园口堵口的真相，我愤笔疾书，写了《谈黄河堵口工程》一文，于1946年8月12日发表在重庆的《大公报》上。我以花园口口门堵复工程局总工程师的身份，说明花园口堵口不是“进行顺利”而是彻底的失败，阐明了其失败的原因和经过，同时阐明了我新施工计划的观点和方法。在文章的最后，我告诫国民党政府说：“象这样顾头不顾脚的堵口失败了，不过糟蹋了价值10几亿元的工料，无关大局，假如侥幸成功，洪水冲入还没有修好堤防的故道……那才是全盘的失败……政府应当为今后黄河工程进行顺利之计，坦白地要求联总，不再让塔德先生乱出主意……。假如联总必须派一名美籍工程师驻工，就应当派一位真正认识黄河的‘工程师’，至少是有‘科学头脑的工程师’。”

我的文章发表以后，在重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的人还给我说：“在当今这种社会里，你敢在报纸上公开批评政府，真是胆量不小啊！”听后，我只是一笑了之。

不久，传来了花园口口门要在9月份重新堵复的消息。并且还传说，这次堵口要按我的新施工计划执行。闻听此信，我是喜不自胜，整日坐待我受聘的消息。

十七、重返花园口

1946年9月中旬，我果然接到了堵复花园口口门工程局的聘请书。我打开聘请书一看，原来是朱光彩来的。对这个人，

我是了解的。他是同济大学的毕业生，后来留学西德，专攻水利。回国后，在农民银行搞了几年农贷。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广州、贵州一带搞农田水利。抗战后期，调到行政院水利委员会任技正。他很有学识，知识相当渊博，但是，没有在黄河上工作的经验，更没有在黄河上堵口的经验。

他在给我的信中说道：赵守钰辞职以后，水利委员会任命他为堵复工程局的局长。他知道，堵口如赌命，难得好下场。但是，为了黄泛区600万同胞，他还是接受了这个职务。他在信中还说道，我是一个很有造诣的水利专家，他对我的新施工计划分析研究了好多遍，认为是一个很有独到见解的施工计划，要我一定不辞劳苦，再回花园口，为给后代子孙造福，共图黄河大业，早日堵复花园口口门。

我看了聘书之后，心里感到十分欣慰，并当即决定，重返花园口堵复工地。

我到堵复工程局了解到，这个堵口班子的技术力量是相当雄厚的。副局长潘镒芬，是20年代工专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在山东河务局工作，从实习生一直干到河务局长的职务，是一个有丰富堵口经验的指挥员，并且为人忠厚诚恳，被人们誉为“河工圣人”。另一个副局长是齐寿安，也是一个从事水利工作多年的工程师，善用透水柳坝堵口。工务处长阎振兴，曾留学美国，攻读水利，并且获得了水力博士的学位。工程局的其他负责人及工地负责人，大都是由河南大学的水利教授和河南大学水利系的毕业生担任。

有这样一个技术实力如此雄厚的班子，按道理说，进行施工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可是，领导班子内部十分不团结，各有各的企图，各有各的打算。尤其是文福宴，虽然身居工程局的

要职，却善于玩弄小动作，挑拨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民工之间的关系。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想，自己是来堵口、造福人民的，不论任何是非，绝不介入。可是，你身处是非的漩涡之中，有时候你不想介入，也难以自我作主。

我到堵口工地第一件事，就是去口门实地勘察，完善我们的施工计划。由于塔德堵口的失败，现在的深泓已移靠东坝，水深达17米，深泓宽度达70米，看来，用栈桥抛石的方法是不行了。经过朱光彩局长的同意，我采取了用木驳船搭浮桥的办法抛石。开始进展得十分顺利，不料，第二天，打桩船便翻进了水里，船和桩架也被泥沙埋没。

浮桥抛石的计划失败了，工程局向水利委员会发电请示。

第三天，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沈伯先带领着高级工程师来到了工地。他们略作勘察，便贸然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案：放弃原堵口线，在口门下游800米处，再做一道1公里多长的大堤，再进行堵口。

我想：此方案等于堵口工程从头做起，原来的施工等于白费，工程量也显然过大。对于执行这个施工方案，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文福宴走过来说：“陶总工程师，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堵口经验的人，就按沈副委员长说的办吧，我来给你做助手，全用透水柳坝。沈副委员长定的这个方案太好了，我敢担保，一作就成。”他向沈伯先献媚地笑了笑，又接着说：

“对潘镒芬这个人呀，我算是把他看透了。你说，除了捆厢进占外，他还会什么？真是叫他白坐了副局长这个位置。”

我对文福宴当着上一级领导的面，公开溜须拍马和诽谤好人，很不满意。说：“沈副委员长的方案，也不一定一作就成，潘镒芬副局长也不是只会捆厢进占。他和黄河打交道多

年，对堵口还是很有经验的。你我都是工程局的负责人，应该和其他人通力协作，搞好团结，争取早日将口门堵合。你这样在沈副委员长面前，公开说潘镒芬的不是，是很不应该，很不好。”

文福宴一听，脸一红，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事过之后，我心里窝了很大一个疙瘩。暗想：要使口门早日合龙，不管采取哪种施工计划，工地上没有一批得心应手的技术骨干队伍是不行的。当时，我有一班河南大学毕业的学生，大都从事水利工作多年，现在，都在铁路上做运石工作。我经过朱光彩和潘镒芬的同意，全部把他们调进了堵口工地，连东西坝头的正副主任，也都由他们担任。潘镒芬也把他的老部下——山东河工队，调进了工地。这样，堵口的主要骨干力量，全都掌握在我和潘镒芬的手里，文福宴的花招再多，也只不过是个光杆司令了。

十八、南京的电报

沈伯先离开花园口之后，我专门找到了文福宴，和他商量说：“我经过反复地考虑，慎重地计算，认为沈副委员长的那个施工方案工程量太大，工期也太长，不可能实现我们冬季合龙的计划。我看，还是回到原来的口门上想办法比较好，文福宴先生你看呢？”

文福宴对我的想法，表示极力赞成。说：“你是总工程师，有权决定堵口方案。我看，就按你说的方案办吧，我保证大力支持。”

1946年11月初，正当我们的施工进度得十分顺利的时候，

堵复工程局接到从南京拍来的水利委员会的电报。电文说：听说你们不遵照沈副委员长的指示，又回到了原口门施工。你们这样做，以后之成败，概由你局负责。堵复工程局又将此电报，以公文的形式转交给我。

我一见此文，大感恼火。心想：这些官老爷们是知道的，堵口之成败，事关着他们的前程。在中国的历史上，因堵口失败，有被革职者，有被斩首者，也有跳河自杀者。所以，他们必须得先在公文上站住脚跟。堵口成功了，他们可以升官晋职；失败了，可以以公文为证，推卸责任，不用担心自己的首级搬家，最多有一纸检讨，便可不了了之了。

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沈伯先，就是这样打算的。因为他不论对老施工计划，还是他提出的新施工计划，均无成功的把握，所以，便打来了如此一封电报，以备事后有据可查。工程局透了他这个不可告人的意图，又以公文的形式把电报转给了我。实际上，他们是想把堵口的责任，全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看来，现在的当官人，比我们的古人，真是“聪明”得多了。可是，我又一想，沈伯先身在南京，远隔千里之遥，我们回到原口门施工，工程局又没向水利委员会报告，他怎么会得到工地上的消息呢？看来，电报上的“听说”二字很有文章。头几天，文福宴曾去过南京一次，大概是他在沈伯先跟前告了我的状。我知道，他是一个很会玩弄两面派手法的人物。

我越想越觉恼恨，拿起电报，便去找朱光彩理论。我对他愤愤地说：“朱局长，工程局把这个不负责任的电报，用公文的形式，从局办公室转到我的办公室，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把堵口的责任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今天，我当着你的面，

把话讲明白，我如果没有把握，是不敢更改沈副委员长的计划，再回到原口门上施工的。因为我要向泛区的600万同胞负责，要向黄河两岸的1,200万同胞负责，而不是向那些不负责任的上级负责！对于这样的公文，我不愿做任何答复，随他们怎样处理都行！朱局长，你知道嘛？这是有人故意从中作梗，制造我们工程局一班人的分裂！”说罢，我气哼哼地走了。

我走到半路上，正好碰见了文福宴，这真是冤家路窄啊。他一见到我，十分诡谲地说：“陶总工程师，你知道吧？王晋聪那个小青年是共产党。往后，你少和他接近吧。”

我冷冷地说：“你咋知道王晋聪是共产党呀？说话可得有凭证啊！”

文福宴说：“我看着他那个样子，就象共产党。年轻轻的，穿得破破烂烂，身上整天挂满泥花，干起活来不要命，说起话来笑嘻嘻，凡是这样的人，都象共产党。”

我说：“要是这样的人是共产党，咱俩都应该去参加。这比那种光会耍嘴皮，不干实在事的人，强多了。”

我的话，使文福宴很下不了台，他气狠狠地说：“你知道，在当今，对沾上红气的人，政府是怎样对待的？请你不要把我的一片好心肠当成驴肝肺！”

我说：“我不怕，你到南京告去吧，我甘愿受处治。”

文福宴无话可答了。他对我拧了拧脖子，悻悻地走开了。

看来，文福宴真地要和我较量一下了。我思想上，不由地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政府对沾上红气的人是怎样对待的，我心里当然十分清楚。文福宴不离开工地，我的处境会越来越困难，堵口工程也难以顺利进行。

在工地上，我见到了王晋聪，他年纪有二十四、五岁，长

的细眉大眼，脸蛋十分好看。正象文福宴说的那样，浑身挂满了泥水，脸上挂满了汗水，周围的人干起活来谁也没有他肯下力气。

我走到王晋聪跟前，双手抚摸着他的两个肩膀，问：“孩子，你这样下力气干活，不觉苦吗？”

他对我笑了笑说：“陶总工程师，你知道，黄泛区的同胞比我们更苦啊！他们天天都在盼望着，把花园口口门堵上。”

小伙子的话说得多好啊。我猜想着，能说出这样话的人，不是共产党，也准是从解放区来的人。我问：“孩子，你对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你要真是共产党，我设法保护你。现在，已有人怀疑你是共产党了。”

王晋聪说：“陶总工程师，我谢谢你的一片好意。不过，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我愿意听共产党的话。”

“愿意听共产党的话”，王晋聪这句发自心底深处的语言，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十九、驱逐文福宴

文福宴对我的成见越来越大了。他不光在工程局一班人中挑拨是非，在民工中，他也挑拨是非。有一天，他当着许多民工的面，阴阳怪气地说：“看来，河工这碗饭好吃得很呀，要不，铁路上干事的人，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

我听到此话后，只气得浑身打颤。我知道他说这话的目的，又是冲着我来。我真想马上找文福宴，与他当面辩理。可是，又一想，为了维护工程局一班人的团结，齐心协力赶快把

花园口口门堵上，我还是把这口恶气强咽进了肚里。不过，我也暗暗地下了决心，在堵口工地上，不是他走，就是我走，我们关系已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说实在的，要不是凭着中国人的这点良心，趁目前是枯水季节，赶快让黄水回归故道，叫黄泛区同胞早回家园，我是绝不会在这个是非之地纠缠的。

一天晚上，我正准备休息，突然，我的学生，现任东坝头主任的史华樟，气呼呼地闯进了我的宿舍，高喉咙大嗓地说：

“陶老师，你说说，你对堵口成功的把握到底有多大？”

我一见史华樟那副火冒三丈的样子，大感吃惊，急忙问：

“华樟，怎么，出了什么事了？”

他说：“陶老师，你如果对堵口有把握，就赶快把它拿下来，你如果对堵口没把握，就赶快捆行李走，到哪里你不能混碗饭吃？非在这里受窝囊气干啥？这口气，你能受得了，我还受不了呢。你知道吧，有的人公开在民工中说，我们是托你的福，来工地混饭吃的，你说说，这叫人起火不起火？象这样的恶气，我们能咽得下去吗？”

我知道，史华樟这肚子火气，是朝文福宴发泄的。我赶忙向他使了个眼色，用手指了指隔壁，意思是不让他再说下去了，怕文福宴下不了台。因为我的宿舍和文福宴的宿舍，只是一席之隔。那时候，我们住的都是大窝棚，宿舍和宿舍之间，只用一席隔开，如一屋有声，全都能听见。

史华樟没理这个茬，继续大声说：“我是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是把话说给他听的。陶老师你不知道，他的心有多狠，口有多辣。他还在民工中说，你和共产党有联系，硬要把这顶红帽子戴到你的头上，你看看，这还得了吗？他是把你往那条路上推哩？”

我按了按心中的火气，说：“华樟啊，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你就甭往下说了。”

忽然，我隔壁的桌子咚咚地连响几下，只听文福宴说：“这是谁在那里挑拨领导之间的关系呀？我对这样的人是不会客气的。”

史华樟毫不示弱地说：“是我，我叫史华樟，东坝头主任，陶老师的学生。可是，挑拨领导之间关系的不是我，挑拨领导和民工关系的也不是我，而是你，文福宴先生。”

“放肆！放肆！”文福宴叭叭地拍着桌子，说：“你敢顶撞领导，明天，我就撤掉你的职务，叫你滚蛋！”

史华樟冷冷地说：“好，那我就等着你，看你文福宴先生叫我怎样滚蛋！”说罢，他铁青着脸，跑出了我的宿舍。

这场风波，使我既感痛快，又感担心。痛快的是，史华樟说出了我不敢说的话；担心的是，不知道事情该如何了结。这一夜，我思前想后，眼皮没合。在我的隔壁，文福宴也是翻来复去了一夜。

第二天，我到工地一看，只吓得我目瞪口呆。史华樟这个不知轻重的年轻人，果然把祸事惹出来了。他竟敢领着东西坝头的民工，举行了罢工示威。并且提出，文福宴不走，他们就不上工，还要求堵复工程局当即表态，马上决定。

我一见如此场面，马上找到了史华樟，以老师的身份，训斥他说：“华樟，你看你惹得这场祸！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其实，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也不知道。

史华樟把胸膛一拍，说：“陶老师，你不用管，有天大的祸事，我一个人担当，没有你的事！”

堵复工程局的领导人都明白，史华樟领导的这次罢工，是

针对文福宴一个人来的。因为文福宴的所作所为，大家心里都有数，所以，谁也不同情他。同时，文福宴心里也明白，这次罢工的意图是什么，再加上堵复工程局没有表示出挽留他的意思，也只好打起行李，灰溜溜地离开了花园口堵口工地。

事后，阎振兴乐呵呵地对我说：“吃黄河饭的文福宴，怎么半路里走了？”

我风趣地说：“那是他吃饱了撑的，不愿再吃了。”

说罢，我们二人同时开怀大笑起来。

二十、堵 口 告 成

文福宴走了，工地上的是非少多了。这样，工程局一班人，就可以集中精力，集中智慧，研究堵口合龙的问题了。

几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平堵的方法是难以让口门合龙的。因之，工程局马上做出决定，放弃平堵，采取中国传统的堵口方法——立堵。但是，这种放弃，不是完全的放弃，而是在平堵基础上的立堵。平堵时期所做的工程，该保留的保留，该废弃的废弃，该改造的改造。这样，就可以使立堵安全可靠，成功的把握较大。

为了加快口门合龙的进程，我和其他工程技术人员研究制定了五项施工措施，并报请工程局批准。这五项措施是：

第一，增挖引河，在原定南北引河之间，再挖三道引河。这样，就能分泄全河流量 $1/2$ 左右。

第二，接长及增修挑水坝，并添修柳石坦坡。在修筑挑水坝时，先打排桩，然后，再用柳石镶成，以防洪水冲刷。

第三，加强大坝。首先用柳石等料层层加高大坝，至计划

高程作为堵口正坝。并在正坝前，抛大柳石枕。其次，用埽头进占，在正坝下首先赶修边坝，在正坝和边坝之间，由东坝头向西，西坝头向东，每隔20米或40米处，添修横格坝一道。各格坝之间，以土浇填，作为土柜，并于边坝下游浇筑土戗，以加强防御洪水的能力。

第四，盘固坝头，以免出事。

第五，抛填合龙。以上四项工程完成后，即由正坝金门两旁东西坝头起，用平堵方法相向分抛大铁丝石笼和柳石枕，先将正坝堵塞合龙。然后，再用立堵的方法，在边坝合龙。

一个完整的施工方案制定好了，37.000余名民工开进了堵口工地。整个工地上车水马龙，机器轰轰，水声、号子声响成一片，工程进展得十分神速。

1947年3月14日开始口门合龙。口门上，三对钢筋笼和柳石枕同时对抛，上游的水位急剧上涨，下游的水位急剧降落。半夜时刻，黄河主溜回归了故道。3月15日拂晓，截断了最后的流水。至此黄河归故结束。

我对黄河归故谈判的片断回忆

王 化 云 口 述

祝 厚 江 赵 从 元 整 理

1937年日寇的铁蹄踏进了我中华大地，从此，亿万中国人民跌进了苦难的深渊。在这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亲手签署批准了国民党军委会关于花园口扒堤放水的呈请电令。霎那间，滔滔洪水一泻千里，使豫皖苏人民遭受了灭顶之祸。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蒋介石“花园口扒堤放水”的罪恶事件。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胜利后，人民迫切要求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仍旧恢复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因此，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地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先后向华东、华北、东北等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并且制定了“以水代兵”淹没冀鲁豫解放区的军事阴谋。即借堵复花园口口门“黄河归故”为名，配合他们的军事进攻。

黄河故道经过八年抗战及风雨侵蚀，已是一条干河，南北大堤壕沟纵横，百孔千疮，一旦黄水回归故道，就要使沿黄人民遭受极大灾难，冀鲁豫解放区的广阔土地将要被洪水淹没。因此，沿黄人民在党中央和冀鲁豫区党委、行署的领导下，与

国民党政府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我在冀鲁豫行署任民教处处长。1945年10月菏泽城解放，我随行署机关迁到了菏泽。1946年1月，鲁西南专员管大同给行署打电话，说是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官员要来菏泽看黄河的堤防情况，请示接待不接待。那时，我们刚刚取得了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的胜利，在东北还和国民党部队不断发生磨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行来菏泽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还不了解，便向行署主任段君毅同志做了请示。段君毅同志指示由我和行署秘书长罗士高等同志负责接待工作。

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官员和美国工程师塔德等一行分乘几辆小汽车，来到了菏泽。他们说，国共停战协议已经签字，他们是来看黄河下游堤防及河床情况的。

沿黄人民群众知道了国民党代表看黄河的消息，纷纷请愿、抗议，要求国民党政府必须先修好黄河堤防，搬迁故道内居民，再进行堵口放水。人民群众的正当呼声，把国民党的大员弄得十分狼狈。他们只看了两三天，就回了开封。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当局不通知我冀鲁豫解放区，便自行开始了花园口口门的堵复。针对这一情况，行署和群众团体纷纷发表声明，揭露他们的罪恶阴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派晁哲甫、贾心斋、赵明甫三同志去开封与国民党举行“黄河回归故道”的谈判。冀鲁豫区党委决定建立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并调我任黄委会主任。行署交给我们三项任务是：第一，组织解放区人民修复好堤防；第二，为我们的谈判代表团提供修复黄河堤防所需要的粮款、物料、工程数量、民工人数等资料；第三，参加有关的谈判。

国民党当局为了达到“以水代兵”，分割淹没我解放区的

罪恶目的，加紧了对花园口口门的堵复工程。为了及早修复好黄河堤防，以防国民党汛期放水，我黄河水利委员会在行署的领导下，展开了全面的黄河复堤工作。在1946年麦收前，我们召开了一次有各专署专员和各县县长参加的黄河堤防修复会议。这次会议由段君毅同志主持，我部署工作。我对参加会议的同志讲：黄河堤防的修复工作，是关系到解放区1,500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大事，各专署各县要作为一项头等重要的事情去办。堤防的修复标准，要达到抗战前的水平，以打破国民党在大汛前堵上花园口口门，淹没我冀鲁豫解放区的阴谋。我讲话以后，同志们的决心都很大，纷纷表示：为了保证解放区人民的安全，一定及早修好黄河堤防。

修复黄河堤防所需要的钱款、物料、粮食等数目很大，行署觉得负担过重，派我去中央局汇报。那时，中央局设在河北省武安县冶陶村，由薄一波、滕代远、杨立三等同志主持工作。

薄一波同志听了我的汇报以后，也认为需要钱款、物资、粮食的数量太大，为了确保解放区人民的安全，及早修好黄河堤防，他还是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在召开的四个行署主任的会议上，薄一波同志讲：修复黄河堤防，不仅是一个行署的事，也不仅是沿黄人民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大事。现在，我们还没有全国政府，钱款、粮食由边区政府统筹解决。参加会议的各行署负责同志一致表示赞成。同时，中央局还认为冀鲁豫行署修复堤防的工作量太大，负担过重，要求冀南行署给予大力支持，并派刘季兴同志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协助我共同把黄河堤防修好。我们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沿黄军民，对黄河堤防加紧了修复工作。

1946年4月，国民党当局“尽先争取堵口”的阴谋全部暴露了。他们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强花园口堵复工程，妄图在大汛之前，将花园口口门堵复成功，让滔滔洪水分割我解放区。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这一罪恶阴谋，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发表谈话，坚决反对他们不执行协议而“尽先争取堵口”的作法。

同年5月，我受冀鲁豫行署的派遣，以首席代表的身份来到了开封，与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赵守钰、美国工程师塔德以及联总、行总的人员举行谈判。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手中有真理，所以，我们理直气壮地和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他们背弃协议“尽先争取堵口”的事实。我说：“国民党中央社广播说，花园口口门已堵复一半，两个月即可合龙，解放区人民感到十分气愤，强烈抗议你们这种作法。由于你们不执行关于修复黄河堤防的《开封协议》和《菏泽协议》，不按期拨发修复黄河堤防的钱款、物料、粮食等，大堤修复工程是不能按期完成的，一旦将花园口口门堵合，将给解放区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我们强烈反对你们这种‘尽先争取堵口’的作法！”同时我们对联总的代表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最后，我表示：如果你们坚持这种违背协议的作法，我们就要采取措施，一切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就这样，我们和国民党代表团从早上8点一直谈判到下午1点，由于他们态度蛮横，不执行协议，也没谈判出任何结果。

不久，我们接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区党委书记张玺、行署主任段君毅和我去开封，参加周恩来同志即将在开封与国民党方面举行的黄河归故谈判。在开封的管大同同志（我方谈

判代表)乘吉普车,把我们接到开封。

周恩来同志的专机到达开封上空,便沿着黄河察看了花园口堵口工程以及引河的开挖情况。然后,在开封机场降落,国民党方面做了迎接,住在红洋楼(教堂)。

当天上午,我们都到了周恩来同志的住处,接着就召开了我方在开封人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玺、段君毅、赵明甫和我等同志。周副主席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针对当时的形势,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

这天下午,周恩来同志不辞劳苦,和国民党进行了谈判,参加谈判的还有联总、行总的人员。周恩来同志就花园口口门的堵复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的讲话有理有力,深得对方与会人士的同情,并达成了口头协议,即:停止引河开挖;堵口合龙应视复堤完成情况;放水须取得我方同意等。但是,国民党反动当局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他们为了达到“以水代兵”,淹没我解放区的目的,违背协议规定,不向修复黄河堤防的民工运送粮食、器材,使黄河堤防的修复工程不能按期完成。他们这种不执行协议的作法,引起了沿黄人民的无比愤慨。

1946年洪水较大,再加上我们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国民党当局在花园口口门合龙没能成功。他们在大汛前将花园口口门堵复的阴谋破产了,我们赢得了一年修复黄河堤防的时间。

当时,花园口堵口工程被国民党国防部视为战略军事工程。在他们的直接指挥督促下,于1946年11月已基本上完成,到1947年3月15日合龙。自此,黄河重新回归了故道。

黄河归故后,在冀鲁豫的黄河南岸地区,大部分由国民党控制着。黄河堤防修复的很不完整,如到大汛,将会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因此,我们再次建议国民党方面,组织混编委员

会，研究黄河堤防的修复问题。时隔两个月，联总才通知我们在菏泽举行会议。这次会议由于有国民党国防部的人员出席，我们不承认他们为代表，拒绝与他们谈判，最后以无结果草草收场。

1947年7月上旬，我们再次接到联总通知，要在东明县举行谈判。经行署研究，确定由我和杨公素同志参加。临行前，我到二野司令部见了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他们对我们作了关于谈判的重要指示。

我和杨公素同志到了东明，与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在教堂内举行会谈。参加这次会谈的有国民党国防部的代表叶南，行总代表丁致中，水利部代表阎振兴，还有联总的代表，共20多人。

在这次谈判中，我们以国民党用飞机扫射修堤民工的大量事实，揭露他们多次破坏达成协议的阴谋。这次会议又以无结果告终。在谈判时，他们还组织了几十个身穿长袍短褂的逃亡地主之类的人物，打着小旗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向我们示威。我马上向他们提出强烈的抗议。他们向我们解释说“这全是一些无知愚民的无知行动”。通过这次会谈，充分证明，国民党方面绝无诚意解决任何问题。

自此，我们制定了治理黄河的方针，组织了我们的治河队伍。当时，行署提出的治河方针是：“确保临黄，固守金堤，不准决口”。接着召开了各专署专员、各县县长参加的治河会议，传达贯彻了行署的治河方针，并要求参加会议的专员、县长，回去以后广泛发动群众，献砖献石，加紧修复黄河堤防。我们还吸收了老河工参加我们的治河队伍，发挥他们的作用。在解放战争中，我们不断召开安澜会，总结经验，表彰

先进。就这样，我冀鲁豫军民冒着国民党飞机轰炸和扫射的危险，与国民党的破坏和捣乱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终于把一条破烂不堪的黄河大堤，修筑得坚如磐石，使滔滔洪水安然入海。

通过一年多的黄河归故斗争，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国民党方面是毫无诚意解决任何问题的。他们一手和我们签订协议，又一手将协议撕毁。但是由于我们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与国民党方面展开了一场又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使我们赢得了自治黄河的能力。同时，大力进行了复堤整险，迁移了滩区人民，胜利完成了任务，使冀鲁豫人民免受黄患之苦，黄河归故这场斗争，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华东大学始末

余 修

1948年夏，华东大学首建于山东省潍坊市。这是一所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培养青年干部的革命大学。同年底进入济南，1950年末迁往青岛，1951年3月与山东大学合校，建制撤销。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共培训了有社会主义觉悟、勇于献身革命事业的干部4,000多人，对支援当时的解放战争和加速今天的四化建设，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时间已经过去38年，作为华东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它重视思想教育的光荣传统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长期萦回在我心中，令我久久不忘。现在将它的始末回忆记述，既作为历史的记录，也寄托我的深切怀念。

一、潍 坊 筹 建

1948年4月，我军解放鲁中重镇潍县，敌人在山东境内只剩下济南、青岛和津浦线上几个孤立的据点，全省广袤千里的解放区连成一片。潍县解放后和坊子矿区合并，设立潍坊市。当时中共华东局已由华中迁来山东，住在益都附近。为了迎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适应开辟华东新解放区工作的需要，华东局决定在临沂山东大学（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时期已停办）和华东建设大学的基础上，重新组建华东大学，招收新解放区具有中等学校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为革命的发展培养干部。在确定学校名称时，华东局认为，招生

对象主要是新解放区青年学生，这些学生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革命尚无正确认识，如果名为“革命大学”或“干部大学”，将会增加他们的疑虑。考虑到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新中国建立后，也需培养专业建设人才，新建学校将来可以向新型正规化大学发展，加上学校是在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下，故定名为华东大学。5月中旬开始筹备，任命韦慇为校长，张勃川为副校长，刘雪苇为教务长，俞仲吾为秘书长，并陆续派中层干部叶锦田、梁云清、李庚、张一夫、赵凌、马雨亭、董一博、丁山、沈一力、蒋捷夫、胡克诚、朱波、蒋梯云等20多位同志参加筹备工作。另外，还通知在渤海地区无棣县新华书店的临沂山大留守人员，速到潍坊市报到；电召已去大连的临沂山大和华东建大教师李仲融、何封、车载、王淑明、赵平生、刘力行、陶官云、朱维基、胡考、袁似鹑等同志迅即渡海回鲁，到华东大学任教。由于华东局的重视和做了全面安排，学校初建时干部力量较强，师资水平较高。校址选在潍县城东乐道院中。院内树木葱茏，房舍齐整，附近有菜园花圃、小河流水，环境颇为清新宜人。

筹备工作初步就绪，立即开始招生。6月初在山东省《大众日报》上登出招生广告。学校决定先设大学预科部和临时研究班：预科部招收初中毕业和高中肄业的青年学生，学习期限暂定一年；研究班招收高中毕业和大学肄业的青年学生，学习期限暂定二年至三年。待遇一律实行供给制。除在潍坊市招生外，还派人到莱阳、高密、益都等地设立招生办事处。当时，新解放区青年学生在革命胜利形势鼓舞下，纷纷报考，到7月下旬经过语文、政治常识、史地等笔试，第一批录取500余人，以后又零星录取近100人。学生的来源大体分三个方面：多数是昌

潍一带新解放区初中以上的青年学生，部分是从国民党统治区跑过来的进步青年学生，少数是本省老解放区的一般干部和小学教师。学员入校后进行编班，建立教学组织。根据文化程度，对高中毕业和大学肄业的40多人，编为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三个临时研究班，均住乐道院；对初中毕业和高中肄业的500多人，编为预科第一部和第二部，部以下再分若干班。一部住乐道院，二部住坊子。

华东大学在华东局的领导下，以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方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只用三个多月时间，就筹备就绪，初具规模，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是少见的。

二、健全组织

华东大学的行政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由校长、副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研究班和部的主任及学校党总支书记，组成行政会议，校长为召集人，定期研究学校重大工作问题，党的组织在华东局领导下设总支委员会，叶锦田同志任总支书记，李仲融、赵平生、李庚、张一夫四同志为委员。党总支属于机关党委性质，主要组织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证行政工作的完成。教学工作经过行政会议的认真讨论，制订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内容，以转变学员思想为目标的教学计划。根据师资条件，先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由刘雪苇同志组织教师何封、车载、陶官云、袁似鹑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当时正值炎夏，溽暑逼人，大家虽挥汗如雨，却克服人力不足和资料缺乏的困难，夜以继日地编出了《中国近代史讲授大纲》上下册。

上册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部分，下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铅印出版，供学员学习使用；校外亦广为流传。

教学组织方面，三个临时研究班的主任是：政治经济班何封同志，文学艺术班李仲融同志，教育班王淑明同志。三个班组成班委会，蒋捷夫同志任秘书，负责教学行政和日常思想工作。预科一部主任张一夫同志，部以下设三个班，韩绍群、刘曼思、冯韧同志分任班主任。预科二部主任李庚同志，部以下也是三个班，董亮、糜白辰、黄治平同志分任班主任。每班学员约八九十人，班内分学习小组8—9个。行政机构，在秘书长领导下，设秘书、总务两科。秘书科梁云清同志任科长，负责拟订计划、文书处理、会议组织、上下联系等工作。总务科胡克诚、颜光华同志任正副科长，负责物资供应、医疗卫生、交通运输、招待警卫等工作。在教务长领导下设教务、注册两科。教务科赵凌、马雨亭同志任正副科长，负责招生、教学检查、教务行政等工作。注册科叶锦田、沈一力同志任正副科长，负责人事调配和学员学籍的管理等工作。另设图书馆，刘伟同志任主任。由于一律实行供给制，学校每月按教师、干部、学员实有人数，报送供应计划，上级主管部门根据标准批发粮食、被服和办公费用，手续简化、帐目不繁。全校机构精干，人员很少，但大家责任心强，积极主动，工作效率甚高。

9月初举行开学典礼，张勃川同志在会上报告华东大学办学的方针任务和培养目标，刘雪苇同志报告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之后，正式上课。教学形式是以部为单位集体上大课。教学环节是学员阅读文件，进行思考，教师讲授，开展讨论，然后解答问题和小结，本单元即告结束，转入下一单元学习。主讲教师由李仲融、车载、赵平生、陶官云担任。此外，还由学

校领导和华东局各部门负责人，定期作时事政策报告。由于教学中紧密结合形势，注意联系学生思想实际，材料充实，分析中肯，因而学员思想上如拨云雾，顿觉耳目一新，提高了学习自觉性，树立起改造世界观的思想基础。

组织健全后，立即建立上课、讨论、自学、小结、起床、早操、点名、值日、请假、息灯等学习和生活制度；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校和各部的学生会组织，管理学员的学习和生活。第一届校学生会主席是现任山东省旅游局副局长的蒋奎生同志。通过上述工作，学校开始出现思想稳定、努力学习、遵守纪律、团结互助的良好风气。

三、进 入 济 南

1948年9月24日我军全歼守敌，解放山东省会济南。学校行政会议经讨论决定，立即向华东局请示去济招生和将来学校迁济问题。9月28日张勃川同志率领梁云清、马雨亭、朱波等10多位同志到达华东局，经过请示汇报后，华东局批准迁济。当时胶济铁路尚未全线通车，华东局专调卡车一辆，于9月31日将张勃川等同志送入济南。济南军管会冯平等同志亲自接待，对华东大学在济招生和迁校，表示欢迎和支持，指示文教部门积极协助，并先拨给经四纬六路原国民党第四兵站房舍作为校舍，在此设立学校办事处。于是，到济人员立即拟出招生广告，并贴满全城。广告内容是：华大招收高中以上青年学生，学习期限暂定2年，全部实行供给制，毕业后统一分配。另外，还在商埠和城内设立报名处。为了满足学校迁来济南后对房舍的需要，军管会又陆续拨给济南临时中学（金牛山）、

济南中正中学（经七纬八路）、济南建国中学（经三纬三路）、济南成城中学（今八一礼堂附近）等校舍，还商妥借用齐鲁大学一部分房舍。至此，学校在济招生和迁校问题，均得圆满解决。这时，学校又从潍坊调来一批干部，分别负责招生和校舍接收及整修工作。

济南解放后，我军在各个战场上实行全面反攻，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即将揭开序幕，敌人已陷于重重包围之中。蒋管区内又不断爆发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蒋家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在革命胜利已成定局的形势下，广大青年学生逐步认清中国的前途，确定了自己的道路，纷纷投向革命阵营。学校在济招生工作从10月上旬开始，至11月中旬结束，报名投考者达1,600余人，经过笔试和口试录取1,520人。其中除济南各专科学校和各中学的学生外，尚有一批冲过封锁线从江南过来的青年学生。为了尽快开学上课，统一进行教学工作，潍坊师生于11月下旬全部来到济南，两地学员在济南火车站举行了热烈的会师大会。

在那紧张的战争年代，华东局和山东党的组织，以巨大的人力物力，兴办学校，发展教育，说明我们党向来重视文化科学教育工作，是有远见卓识的。

四、发 展 壮 大

华东大学进入济南后，学员激增，学校发展壮大，因而教学组织也随之调整和增加。除原来在潍坊设立的一、二两个预科部外，新设预科第三和第四部。三、四部学员都是从济南入学的，人数较多，部以下各分五个班，每班为150人左右。丁

山、蒋梯云同志分别任三部和四部主任，朱作云、张开林、钱水、陈芴、邵平、许福康、魏史定、王树林、陆军、宫克等同志分任班主任。上述四个部住第四兵站、中正中学、成城中学和齐鲁大学。原来三个临时研究班，增加一批新学员后，改为社会科学、文学、教育三个研究院。社会科学院院长由张勃川同志兼任，文学学院院长由韦慇同志兼任（南下后由黄源教授代），教育学院院长是田佩之同志。三个院的学生已达400人，朱波、蒋捷夫、王秋岩三同志分任院秘书，住中正中学和齐鲁大学内。此外，还为学历较高从事文教工作多年的108人（如擅长书画的黑伯龙等等），单独设立研究部，由王哲同志任主任，后因王调省教育厅任厅长，改由李仲融同志任主任，住齐鲁大学教员宿舍。同时还招收社会上闲散知识分子300余人，在建国中学内设立学习班，由车载、方建平同志任正副主任，下分三个班，范玲、陈绂庭、陈兆林同志分任班主任。另受军管会文教部委托，在济南临时中学设中学师资训练班，对中专教师270人进行短期培训，糜白辰、周清和同志分任班主任。这时全校学员（包括代训和培训）已达3,000余人。还在原济南正谊中学设立华东大学附属中学，王大彤、宁汉戈同志任正副校长。经过积极的筹划，全校教学组织和生活安排均得到落实。

教师队伍除潍坊的教师已全部到济外，新聘和由有关单位并入的正副教授有：刘国芳、张心田、廉立之、许衍梁、万九河、王峻岭、赵毅生、严微青、汪伯岩；讲师有：金诗伯、翟麟阁、韩连琪、王锡昌、侯春岭等等。吴富恒同志原为济南军管会接收山东教育学院的代表，后该院并入华东大学，随之来校任教。当时校内具有较高水平、胜任开课的教师增加到30多

人，基本上可以满足政治理论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工作。

学校到济后由中共山东分局直接领导，学校中党的组织增设党组，原来的总支委员会不变。张勃川同志任党组书记，刘雪苇、俞仲吾、李仲融、赵平生四同志为党组成员，以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总支委员仍是潍坊时的五人，叶锦田同志养病期间由张一夫同志代理书记。校部机关由第四兵站迁入齐鲁大学考文楼办公。行政领导仍实行民主集中制，设立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总支书记、各院院长、各部主任和教师代表组成的校务委员会，校长任主席，每月举行会议一次，讨论学校大政方针和重大兴革问题。原来的行政会议，改为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总支书记等参加的办公会议，每周举行一次，讨论日常重大工作问题和商定几个单位协办的工作。行政机构除原来四科一馆外，增设生产科，胡克诚同志任科长；增设青年科，陈捷同志任科长；加强注册科，巴一熔同志任副科长。由于机构增加，任务繁重，从潍坊入学的学员中调出40人充实各部和班干部力量。在此期间还制订《华东大学组织条例》、《华东大学校务委员会规程》、《华东大学教学工作有关规定》以及各部门办事细则等等，加强了规章制度建设，建立起良好的工作秩序。

教学组织和行政机构调整后，从1948年12月开始，各院、部按照新的教学计划进行教学工作。新的教学计划目的要求和原来基本相同，但在教学内容上较前丰富充实。计划中以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时事政策为共同必修课；以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联共党史、中国文学史、教育概论、文艺政策等为各学院的专业课，由过去教学中的单科独进改为多科并进。教学形式、方法和环节，

仍然沿用潍坊时的办法。共同必修课主讲由何封、车毅、刘力行、陶官云、袁似鹑等教师担任，业务课教师由各学院从本单位教师中选定。韦恣、张勃川、刘雪苇、俞仲吾、赵平生等同志（有时商请校外党政领导）为时事政策讲座主讲人。学校到济后，工作状况趋于稳定，领导同志较能集中精力狠抓教学，并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改进。因之学员学的深，学的广，能够积极思考，热烈争论，学习空气甚为活跃，学习效果日益显著。

师生生活待遇一律实行供给制。每年服装两单一棉、鞋袜两双，被褥三年一套。除校领导和教师外，大家同吃一锅饭，同睡稻草铺，关系亲密，感情融洽。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干群之间，师生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尊重，目标一致，步伐齐整。昂扬的斗志，艰苦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传统，今日还是值得从中借鉴的。

五、分 批 南 下

1949年，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是具有伟大意义的一年，也是华东大学奉献培育成果的一年。年初，我军取得了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的辉煌胜利，正将乘胜渡江，直捣蒋家王朝心脏。此时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解放区工作。经过华东局和山东分局研究，决定由华东大学抽出一批干部，并动员一部分学员，组成南下工作队，随军过江开辟江南地区工作。学校接到指示后，立即在全体学员中进行周密细致的思想工作。首先请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长夏征农同志，作了题为《一年之内打垮蒋介石》的形势报告，以坚定大家革命胜利的信心。接

着，韦憲、张勃川、刘雪苇等同志，密切联系学员思想实际，分别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号召新时代的青年，发扬“五四”爱国精神，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提出“听从祖国召唤，接受革命考验，坚持自觉自愿，为人民做贡献”的行动口号。各学院和部、班，组织学员座谈讨论，结合思想上存在的问题，进行启发疏导。全校墙报、黑板报积极配合，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鼓动工作。学员在讨论中纷纷表示：革命先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今天已胜利在望，我们一定踏着先烈的足迹，痛打“落水狗”，埋葬蒋家王朝！全校3,000多名学员，意气风发，斗志昂扬，95%以上报名南下。有的学员咬破手指，写出血书，表明决心。家住济南学员，领着家长来校代为恳求。学员们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令人感叹！

经过全面研究并报山东分局批准，从要求南下的教师和干部中，抽调赵平生、朱维基、袁似鹑、张一夫、丁山、方建平、沈一力、魏史定等50多位同志，作为南下工作队的骨干。对要求南下的学员，既表扬其高度的革命觉悟，又注意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共批准1,800人南下。对因身体、家庭或其他情况未被批准的学员，说明留校继续学习同样光荣。1949年2月22日，华东大学2,000人的南下工作队，由华东局派人率领，在喧天的锣鼓和鞭炮声中通过夹道欢送的人群，从济南乘火车出发，奔赴前方迎接新的战斗。之后不久，又从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中抽调干部和学员106人，组成南下文艺工作队，由刘雪苇同志率领接受新的任务。4月初，俞仲吾同志和黄源教授及干部、学员共80人，奉调随军渡江开辟新区工作。此外，因山东省新建部门急需有文化的干部，经山东分局

决定，又从留校的学员中调出300人，分配到文化教育单位工作。至此，预科四个部的学员全部南下（少数参加本省工作），社会科学、文学、教育三个学院的学员，也基本调出，但院的名义仍保留，只剩研究部、讲习班、师训班学员700余人，继续进行学习。

华东大学的学员，从潍坊入校的在校学习时间不到半年，从济南入校的在校学习时间仅仅两个多月，在革命急需的关键时刻，他们能够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除了是受到胜利形势的鼓舞以外，应当承认政治思想工作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特别是南下学员，长途跋涉，栉风沐雨，随军渡江，奋勇前进，经历艰苦锻炼，接受战火考验，虽然有人献出了生命，但始终没有一人掉队，也应当承认这是政治思想教育的丰硕成果。学校创建不足半年，就为革命输送有政治觉悟、有文化的干部2,000多人，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是有贡献的。

六、巩固提高

华东大学在组织南下工作队的同时，又派董一博、陆军等20多位同志，到刚刚解放的徐州招收新生。招生条件与以前基本相同，但严格要求文化程度，必须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才能被吸收入学。结果在徐州录取新生近600人，1949年3月中旬进校。这批学员除少数分配入文学院、教育学院外，在社会科学院设立第一部和第二部（简称社一、二部），两个部的部主任是董一博和马雨亭同志。部以下各分三个班，班主任由原来预科部的干部充任，这两个部都住中正中学校内。4月间从上海、浙江等地过来一批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入校学习。经

过考试录取270余人，设立社会科学院第三部，由蒋梯云同志任部主任，部以下也分三个班，住南新街齐鲁医院部分房舍。5月间又接收迁去江南的河南大学、安徽大学等校返鲁学生200余人，设立社会科学院第四部，由蒋捷夫同志任部主任，部以下分三个班，住齐鲁大学的学生宿舍。至此，除原有的研究部、文学院、教育学院、讲习班、师训班学员共700多人外，新设社会科学院一、二、三、四部，学员共1,200余人，在校学员又达到2,000人。从4月份开始，各院、部仍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按原订教学计划，陆续上课，开展教学工作。

华东大学在组织南下工作队后，领导力量有所削弱。除教务长刘雪苇、秘书长俞仲吾同志已离校外，5月间韦慝校长奉调去上海任副市长。山东分局为了加强学校的领导力量，6月间决定由分局宣传部长彭康同志兼任校长，任命李宇超同志为副校长，派我为教务长，以后又介绍武杰、崔戎、贺治明、赵子安、于健等同志来校工作。学校党组仍由张勃川同志任书记，党组成员已有三人离校，由李宗超、武杰和我任党组成员。党总支改为党委，由李宇超同志任书记，增加武杰、崔戎同志为委员。校部行政机构此时也进行了适当调整。在教务长领导下设教务处，崔戎同志任处长；原有的教务科、注册科、图书馆，机构和人选不变；增设教学辅导科，由朱波同志任科长；取消原有的青年科。在秘书长领导下增设人事科，由武杰同志任科长；增设财务科，由赵子安同志任科长；总务科改由贺治明、于健同志任正副科长。秘书科长梁云清同志调省后，由钱水接任科长。全校人员仍然实行供给制。教师、干部和工警增加300多人，其中党员127人。全校共青团员700余人，并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建立了以陈捷为书记的团委。

1949年夏季，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在教师和干部中，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自由主义为重点的整风运动。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工作几个步骤，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整风后教职工精神面貌发生变化，党群关系、上下级关系进一步密切，各项工作有新的起色。

为了经常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时报道学校任务要求，交流经验，反映动态，整风后在教务处下设立校刊编辑室，出版名为《学习》的校刊，每周一期，每期四版。校刊出版后很受欢迎，推动了教学和学习深入发展。

年底，山东分局派刘宿贤同志来校任秘书长（并任党委副书记），因俞仲吾同志南下而久悬的秘书长人选得到落实。在这一时期中，学校党的领导有所加强，党的组织较前完善，行政机构大为健全，工作方法不断改进，工作效率得到提高。

全校2,000多名学员，来自全国19个省份，包括蒋管区14所大学的学生。这批学员文化水平较高，知识面广，绝大多数是向往革命、要求进步的，但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旧社会的影响，世界观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为此，学校决定仍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使学员不断提高政治觉悟，站稳革命立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措施是：切实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新民主主义论几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使学员系统地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明确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前途，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学校建立起由何封、车载、陶官云、刘力行四同志分任组长的教员指导组。对各门课程，指导小组共同商定教学目的要求，讲授重点、时间和节数等等。授课前教师再结合学员思想实际，确定讲授方法、应当解决的问题、应当树立的观点等等，并认真

进行学习辅导工作，要求学员钻研文件，独立思考，大胆争论，写好小结，巩固收获。这样在教学中做到了兢兢业业，知己知彼，因而效果显著。当时图书馆已添置和接收一批图书，对外开放，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大多数学员做到刻苦学习，联系思想，并把学习的成果落实到改造世界观上。

同时学校把举办时事政策讲座作为教学工作的主要内容，使之与其他课程的教学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经过办公会议研究，指定我担任时事政策讲座组长，规定每两周举行一次，无特殊情况不得间断，还定出轮廓计划。当时彭康、张勃川、李宇超、李仲融、车载、刘力行等同志和我，都曾在这个讲座中讲党的方针政策，讲目前形势和任务，讲中国革命和前途，讲青年修养和道路等等。我们讲课，既以实际问题为主，又提升到理论高度来认识；既有的放矢，又以理服人。学员称这个讲座“扣人心弦，百听不厌”，从而促进了他们世界观的改造。

学校团委还通过“五四”青年节，公开团的组织，举行公开吸收团员的建团活动。通过这个活动，群众进行自我教育，明确前进方向，主动靠拢团组织，积极要求入团。团委根据标准和表现，发展了一批新团员，壮大了团的组织。

这一时期学校的基本状况是：教学工作准备充分，目的明确；思想工作扎实细致，针对性强；广大学员刻苦学习，努力提高思想水平，精神振奋，要求上进。学校在巩固提高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七、社 会 活 动

华东大学是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从创建的第一天

起，即把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当成自己的宗旨；把参加社会活动和社会工作实践，当成转变思想的有效途径。在解放战争胜利捷报频传的情况下，学校随时组织学员开展街头宣传活动。有的学员翻箱倒柜献出西装、皮鞋、旗袍、裙子等物，进行化装宣传。由于广大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八年的血腥统治，又忍受国民党反动派三年的“劫收”，长期处于敢怒而不敢言、思想情绪被压抑的情况，一旦见到华大学生采用歌咏、秧歌、活报剧等形式进行的街头宣传，不但感到形式新鲜，且认为其内容也正好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因此，宣传队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受到热烈欢迎，起到了鼓舞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在慰问解放军伤病员时，全体学员争先恐后，自觉参加。他们为伤员喂饭、洗衣服、输血；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和伤病员心连心，受到了普遍赞扬。同时学员们也从伤病员身上，受到了忠于革命的高尚情操的熏陶，吸取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力量。

华东大学最有意义、最有收获的一次社会活动是黄河抢险，这是对学校教育质量和学员觉悟最有说服力的检验。1949年9月上旬，黄河出现60年罕见的洪水高峰。济南地势低洼，洪水威胁着数十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学校接到参加黄河抢险的命令以后，立即成立黄河抢险指挥部，由我任总指挥，胡克诚同志任副总指挥，武杰同志任政委。作过动员报告后，全校干部和学员1,600人（除老弱病残）编为四个大队、12个中队，以迎战姿态开赴洛口大堤，指挥部也在大堤上安营扎寨。大家吃在堤上，睡在堤上，上顶青天一片，下踏泥泞堤防，面对滔滔洪水，身受风雨侵袭，运土打桩，增固大堤，汗水和泥水交流。经过10天10夜的战斗，降服了洪水，初战告捷，在凯歌声中，

全体师生步伐整齐胜利返校。

孰料10月上旬，黄河又出现第二次特大洪峰，比上次更凶险。上级决定把险情最大的堤防——段庄至杨庄一段，交给最有战斗力的解放军、济南铁路局、华东大学三家负责，明确要求保住大堤，保证济南60万人民安全。四个大队1,600人重上大堤，决心更大，斗志更坚，口号是：“人在堤在，锁住黄龙”。从堤下运土上堤，工具不够就脱下裤子扎上裤腿，驮土上堤，真是一锹土一锹金。为了和洪峰抢时间，和洪水比高低，每天都连续战斗近20个小时，有时三顿饭并作一次吃。有的同志一面铲土一面疲劳地打盹了；有的同志运土上堤滑倒了，就伏在地上睡着了。经过半个多月的日夜奋战，终于保住大堤，保住济南安全。但是全体同志身体瘦了，嗓子哑了，皮肤黑了，两眼肿了，有的同志刚进校门，就倒在传达室的连椅上酣睡了。在治黄小结中，大家共同提出有三大提高，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了，革命意志提高了，组织观念提高了。经过上级评定，华东大学荣立治黄二等功，在1,200多位学员中，约400人荣立治黄一、二、三等功。由此可见，革命的大学和人民的利益相互之间的血肉关系。在这次短短20多天的治黄战斗中，不但学员精神面貌大变，思想得到升华，而且学校的影响也得到扩大，赢得了社会声誉。

八、再作调整，探索提高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这时中

共山东分局指示学校考虑向新型正规化大学过渡的问题。遵照分局指示，学校经过展望将来的全面研究，根据现有条件和师资力量，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以利于重点突出，形成优势，适应向新型正规化大学发展。经报请分局批准后，11月间将教育学院划归山东省教育厅领导（后建成山东师范学院，即今天的山东大学），将附属中学交由济南市教育局领导（即今天的实验中学）。年底，研究部、文学院、讲习班、师训班的学员全部作结业处理，由山东省和济南市安排任中学教师或其他方面工作。上述四个单位的名义随之取消，教师并入社会科学院，干部回到校部机关。至此学校只保留社会科学院的四个部，学员约1.000人左右，准备以此为基础，设立有关系、科，转入长期学习，以利于学校逐步向新型正规化大学过渡。

华东大学在1949年这一年中，不断为各部门输送干部，因之“干部仓库”、“干部储备所”等雅称不胫而走。当时新建的军事院校，对有科学文化的青年干部，求之若渴，由此而发现华东大学，找到华东大学。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分局批准，从社会科学院四个部的学员中，选拔政治、思想、业务较好的约200人，分别分配到空军和海军的校院工作。不久又选调学员180人，除留校30人准备充实师资队伍外，其余150人分配到省直各部门工作。在此期间，干部李庚、蒋梯云等20多位同志，奉命调到山东省和济南市有关部门工作；胡考教授调去北京美术协会工作。经过上述调整，在校学员不足600人，但教师力量和干部力量却较为集中，形成优势，大大有利于转入长期教学工作。

1950年初，根据建国后形势发展和任务要求，学校经过全面研究，决定结束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的短期培训方式，逐步

转入以专业课为主的长期教学。从社会需要和自身条件出发，设立政治、俄文两个长期学习班，学习期限定为二年，培养宣教干部和俄文翻译人才。由于是试办性质，故在留校的学生中选拔业务好、有培养前途的120人编入上述两个长期班。又由于实行以业务课为主的教学，需要细致深入，故改变过去上大课的方式，每班定为40人，在教室内上课。选出的俄文班学员40人，政治班学员80人，再分为甲、乙、丙班。经过较大的调整并试行长期教学，学校在向新型正规化大学过渡中开始起步。

九、试行走向正规

1950年6月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在北京举行，华东大学根据会议精神（会前曾多次酝酿），决定以培养中等学校政治、语文、史地师资、文艺宣传干部、俄文翻译人才为目标，向新型正规化大学发展。于是取消社会科学院四个部，设立政治、文学、史地、艺术、俄文五个系，学习期限定为二年。原有学员除极少数文化水平低的人另行安排外，其余分别转入上述五个系学习。在此期间，山东省各地区文工团进行整编，分局决定：山东省人民文工团、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工团、渤海区党委文工团、鲁中南区党委文工团、渤海清河地委文工团、鲁中南泰西地委文工团六个单位，并入华东大学艺术系。当时政治系学生约200人，语文、史地两系学生各150人，艺术系（下分音乐、美术、戏剧三个组）学生近400人，俄文系学生40人。全校学生900人，教师120人，其中正副教授和讲师约90人。艺术系教师约50人，其他各系各10多人。干部工警约300人。

五个系的系主任是：政治系李仲融，文学系吴富恒，史地系车载，艺术系臧云远，俄文系何封。新聘和文工团并入又增加一批教师，其中正副教授有：高兰、曾一鲁、张君川、俞成辉、姜希、程午加、李子铭、高登洲、瞿安华、何之培、申茂之、刘亚藩、臧仲文、施世珍、曼捷克夫妇（德国籍犹太人）等。各系根据培养目标和师资条件，拟订教学计划和课程纲要。学校规定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论、时事研究、教育概论、自然科学概论、国文、俄文、体育八门为各系共同必修课（与业务课重复者不修）。政治系开设的业务课为：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政策法规研究、政治学概论、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问题、马列主义名著选、世界革命史、近代世界政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联共党史、中学政治教材研究，共14门。文学系开设的业务课为：文艺学、中国语文、写作实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选读、中国文学史、中国历代文学名著选读、苏联文学选读及研究、世界文学名著选读、世界文学史、中学国文教材教法及实习，共11门。史地系开设的业务课为：社会发展史、科学历史观、中国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国际问题、地图学、马列主义史学名著选、自然地理、中学史地教材教法及实习，共11门。艺术系除开设文艺理论、文艺政策、作品选读及研究、实际训练等业务课外，音乐、美术、戏剧三组另订具体课程纲要。俄文系开设的业务课为：讲读及文法、会话、苏联现代戏剧选读、作文、读报、苏联名著选读、应用文、翻译、俄文速记及打字、俄文教学法，共10门。暑假后各系按照既定教学计划正式开课。学校采取有效措施，贯彻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全体学生情绪高涨，树立以学为主、学好

为荣的思想，投入紧张的学习。

暑假后李宇超同志调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由刘宿贤、武杰同志任党委正副书记。行政机构也适当调整，设立校长办公室，下分秘书和人事两科，直属校长领导。教务处下分教务、注册、研究三科和校刊编辑室及图书馆，由教务长领导。设立行政事务处，下分总务、财务、生产三科和医务室及托儿所，由秘书长领导。原来使用的各处校舍，因中学陆续恢复和济南市另作他用，均次第让出，只保留经七纬八路原中正中学和齐鲁大学（一部分）校舍。且齐鲁大学已复学上课，两校学生同在一个校园内，思想、作风、集体生活等等又差异极大，一时难以和睦相处。这时华东大学已经开始向新型正规化道路前进，各方面的困难和各种矛盾也随之突出了。

十、青 岛 合 校

华东大学原是进行短期教育、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向新型正规化发展，固然有其有利条件，但学科单一，师资不足，缺乏设备，没有校舍等等，这都不是能够轻易解决的困难。暑假后学校领导对此曾不断商讨，也曾提出设想向上级汇报。1950年10月间，上级领导原拟将学校迁制南京，继续兴办。后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权衡利弊，进一步研究，提出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校、集中力量把山东大学办好的初步方案。这一方案经华东局批准，立即报中央教育部批准。11月初中央教育部下达华大与山大合校的指示，学校经过动员准备后即行搬迁，至12月底全部到达青岛，暂住黄台路，一面继续进行教学工作，一面积极磋商合校事宜。

1950年10月美帝国主义出兵侵略朝鲜，战火蔓延到鸭绿江边，唇亡齿寒，中国人民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组成志愿军赴朝作战。1951年2月，上级指示学校动员青年学生参战出征。经过传达和动员后，全校轰动，近1.000名学生报名参加，因受名额限制，共批准120人。3月2日这120位同学披红戴花，在腰鼓队、秧歌队伴同下，雄赳赳气昂昂从青岛乘车出发，奔赴朝鲜战场。这是华东大学最后送出的它所培育的一批革命青年。

华东大学和山东大学合校，无疑是一个卓具远见的决定。华东大学党的领导力量较强，有一批经受革命锻炼的干部，有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优良传统。山东大学师资阵容齐整，有较好的物质设备，有较高的学术地位。两校合并，取长补短，发挥优势，有利于办好具备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但是由于两校历史渊源不同，基础制度不同，所处环境不同，因之合校中思想问题极为复杂，给合校工作带来许多的困难。为此，上级决定由彭康、陆侃如、张勃川、童第周、余修、罗竹风、刘椽、刘宿贤八人，组成合校迁并委员会，彭康任主任委员，陆侃如、张勃川任副主任委员，全面领导合校迁并工作。合校委员会根据任务要求和两校实际情况，确定“舍异求同，事理兼顾”的指导方针，采取“态度积极，步骤稳妥”的工作方法。对于人事安排、系科合并、机构增减、学生待遇等重大问题，进行充分酝酿，细致研究，既坚持原则，又照顾实际情况，提出两校都较满意的方案。两校机构人员合并，具体规定是：华东大学文学、史地、俄文三个系的学生，分别进入山东大学文学院的中文、历史、俄文相同年级继续学习；政治和艺术两系由于山东大学没有同类系科，作为直属系留在黄台路继续上课；华东大

学的教师进入山东大学相同系科，职称不变；行政机构并入山东大学相同单位，人员和职务不变。华东大学人员的待遇，仍按供给制不变。3月8日中央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到达青岛，就合校中有关问题作了最后商榷和决定。3月15日华东大学和山东大学正式合校，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合校庆祝大会，这一天并作为山东大学校庆日而载入校史史册。至此，华东大学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合校后，张勃川同志调任中央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李仲融、何封、车载同志分别调去北京和上海工作。合校前两校领导都重视思想教育，两校人员又有广泛接触，故合校后能够做到相互支持，相互尊重，同心同德，团结前进。

※ ※ ※

华东大学在革命走向全国胜利，急需大批干部的关键时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坚持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光荣传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较短的时间把一批青年塑造为献身革命的干部。这批干部随着新中国成长而成长，随着新中国前进而前进，多数已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如曾经受到毛主席称赞的《人民日报》副主编李希凡和兰翎同志，《中国社会科学》主编丁伟志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研究》总编庞朴同志，受到群众喜爱的电影《喜盈门》和《咱们的牛百岁》的导演赵焕章同志，著名电影配音演员李梓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沈树圻同志，等等，都是从华东大学输送到各战斗工作岗位的。凡是在华东大学学习过的同志，都把它当成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都把它的教诲永铭于心，至今提起“华大”二字，大家无不激情满怀，由衷崇

敬。今天在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战斗中，我们不是仍然感到它的精神在熠熠闪光吗？不是仍然能够从它的身上吸取教益吗？这就是我要写《华东大学始末》的心愿。

（1984年5月）

回忆抗日根据地的胶东公学

李 芸 生

我过去写过一篇回忆录，题为“在抗日战争中的胶东公学”。后来，我又在那篇回忆录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新搜集的材料，成写《胶东公学简介》征求意见稿，分发给过去曾在胶公工作过或学习过的同志四五十人，收回修改意见30多份。我参照这些意见，又加以修改补充，题目也换了一个，这就是大家现在见到的这篇文章。因系回忆，总不免丢三落四，欢迎了解情况的同志补充修正。

一、沿 革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兴起，在胶东半岛上，到处点燃起抗日烽火。1938年春，在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首先在蓬莱、黄县、掖县宣告成立。8月下旬，以培养抗战干部为宗旨的胶东公学即在黄县县城原黄县中学校址正式诞生。校长曹漫之（黄县县长兼），副校长赵野民，教导主任阮志刚，总务主任常溪萍。全校设社会、师范、普通三科，第一期招生250人，第二期招生120人。教师当时有王卓青、罗竹风、苏振民、李同聚、孙步唐、李希琪、张秀珩、于大申等。

1939年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掖县城，黄县告急，胶东公学在退驻山区的途中，奉命与胶东抗日军政学校合并，大部分

学生转到军政学校学习，一部分年龄较小的学生疏散回家。

1940年5月，随着战争形式的变化，根据北海参议会决议和中共山东第三区委指示，撤销蓬黄联中与招掖联中，恢复胶东公学。当时确定以蓬黄联中为基础，调集教职人员辛紫上、迟剑敏、石平、李飞、杨敏、姜明、叙文、于文等十几位同志，由苏振民同志负责，筹备招生等事宜。但就在这个期间，又遇到日寇疯狂“扫荡”，许多集镇和交通要道都安设据点，以致原来计划无法实现。8月间又决定学校暂不恢复，学校教职工除苏振民、杨敏等三、四人外，其余都暂时分配到掖县短期师范工作。掖县师范1940年3月成立，由王纯任校长。12月在掖县师范的基础上恢复了胶东公学。1941年2月，上级派赵野民任胶东公学校长兼教导主任，王纯任指导科长，迟剑敏任教务科长，辛紫上任总务主任。教员又增加了王慕韩、邓絨三等。当时校部常驻掖县西由一带，另由王纯率领教职员十余人到栖霞、黄县交界处的山区开办胶东公学北海分班。两处分别招生。校部在掖县招生五、六十人。在城北沿海方圆不到40里的地区，有时集中上课，有时分散自学。北海分班在黄县、栖霞交界处的林家村开学，学生六、七十人。两处分别出了油印的校刊——《胶公生活》和《胶公生活》北海分班版。4月份的一天清晨，北海分班在林家村遭受日伪包围袭击。学生牺牲5人，受伤3、4人；教职员受重伤的有王慕韩老师和鲁之同志。这次事件，虽然给胶公这支刚萌发的幼芽造成惨重的损失，但是，师生们也受到了战争的严峻考验。1941年8、9月间，胶东公学奉命从掖县出发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转移到栖霞县西北部的蒲柅村与北海分班汇合，然后一起东迁到牟平县的风凰崖、涝口等村一带，并继续招生。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

大，胶东公学在斗争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当时学校设立了师范科二班，普通科二班，职业科一班，学生近300人，教师队伍也得到进一步充实。陆续增加的教师有孙百川、迟宾、王桂番、王食三、李健吾、迟欣圃、吕雅君、邢克东、于寿卿、王毅、王锐、王艺叟等。

这时胶东的东海地区，虽然环境比较稳定，但仍处在敌人的频繁“扫荡”之中。1942年1月，学校为了反“扫荡”，又从牟平西部向文登转移。清明节前，胶东公学全体师生，在昆嵛山前祭扫了理琪烈士墓，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节后又会同胶东女子中学、东海中学、滨海中学、文登师范、荣城师范等校在文登铺集村接受了胶东行政主任公署的检查，并举行了学生运动会和文艺汇演等活动。后来胶东公学又向西转移到牟平青山村一带。7月7日的上午，胶公师生和当地群众联合举行抗战五周年庆祝大会。在文艺节目演出将要结束时，接到上级通知，敌人要袭击这个地区，必须立即转移。当时学校除了留下十几个有病的同学准备第二天一早转移外，其余师生当夜急行军向东进发。由于行动迅速，未到拂晓，即进入铎山以西的山区地带。不幸的是十几个生病的同学在翌晨动身离开青山十余里时，在转山头村附近，突然与敌人遭遇，当时牺牲12人，伤3人，仅逃出2人。这是胶东公学历史上又一次受到的惨重损失。

1942年9月，胶公与女中合并，由李芸生任校长兼指导主任，赵野民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辛紫上任总务主任，丁一任副指导主任。胶东女子中学正式成立于1941年秋天，由胶东妇女联合会主任王大兼任校长，丁一任副校长、徐彬任教导主任，臧家伦任总务主任，先后招生四个班，约200人。学生

大都是志愿抗战、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女青少年。教师有王纯、冷棘、王静波、丁宁等。1942年冬，胶公向东转移，疏散在文登、荣成地区的老百姓家里，依靠群众，粉碎敌人的“拉网大扫荡”。在这次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中，一位教师惨遭敌人杀害，一位伙食管理员被敌人活活烧死。有两位教师被敌人抓住，大义凛然地同汉奸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还有若干同学被敌人抓走，随后又机智勇敢地冲出敌人的魔掌逃回学校。

1943年春，胶公师生集合于乳山县珠港、桐岭、徐家、宫家、南口村一带，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稳定的教学工作。学校增设高中班，全校师生达5,600人。教员又增加了王方名、于达、孙哲等。

1944年春，根据上级指示，胶公师生在珠港驻地进行大规模的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们边学习边劳动。他们抡起大镢头开荒，如生龙活虎，汗水滴在沼泽地里。他们还相互展开竞赛。这是胶东公学在发展过程中接受的另一方面的考验，1944年秋。为了迎接抗战胜利，胶公的高年级学生陆续分配工作，大都分配到行政、公安、报社、群众团体和部队等部门。另外，有部分师生合并到胶东建国学校，分科培养建国人才。与此同时，根据上级指示，胶公向西转移到海阳县高家村一带，与海阳中学合并。李芸生任校长（未到职），孙川四任组织科长，主持学校工作；肖道军任总支书记兼指导科长，于达任教务科长，吴坤图任总务科长。合并进来的教师有王慎之、辛华山、矫振三、王子予、孙孝逊等。两校合并后达18个班，学生约900人。

1945年上半年，为了迎接抗战胜利，急需各种人才，根据胶东行署指示，胶东各中学都实行了教育改革。胶公动员全校

学生参军参战，参加新解放区的各种工作，学校停办。1945年秋，日寇投降后，为了争取新解放区的青年学生，行署决定在莱阳中学的基础上恢复胶东公学。11月26日，胶东公学在莱阳县南务村莱阳中学举行复学典礼。由姜守迁任校长，王本贤任副校长兼指导主任，曲力任副指导主任。在校教师有王食三、郭进、王伦、王昆崙、于泽孚、刘翼飞、李素田、史立纯、张民生、刘漫姍、王琴生等。

1946年3月，胶东公学一部分迁入烟台市，与东山中学、烟台师范合并，校名为“山东省立胶东公学总校”，姜守迁任校长，王本贤任副校长，曲力任教导主任，陈健、孙百川任副主任，王慕韩任总务主任，朱泽甫任师范部主任。后王本贤、曲力调离，王方名任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学生21个班，共计1,109人。另一部分留在莱阳，成为胶东公学莱阳分校，由刘维之任校长。1946年暑假，以胶公师范部为基础，成立了胶东师范学校。

1947年夏，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胶东解放区，胶东各中学都疏散备战。胶公总校从烟台市撤出转移到农村。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当时动员了一批教职员和学生参军参战。接着，同撤出烟台的一中、二中合并，建立了烟台联合中学。当年底，烟台联合中学与胶东公学莱阳分校停办。这就是胶东公学发展的简要历程。

二、指导思想和办学方针

胶东公学，是中国共产党胶东党组织和胶东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一所造就抗战建国干部的学校。它依据党的《战时国

民教育实施方案》，扬弃抗战前的旧教育，创办新民主主义新教育。它根据抗战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教育、抗战救国形势政策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学习过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力求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胶东公学的办学方针是培养造就适应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需要的干部，培养热心抗战并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

胶东公学，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因陋就简，艰苦奋斗，从革命的需要出发，讲求教育效果，不追求形式，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当时学校既无固定校址和校舍，又无课桌、课凳，夏天在树荫下上课，冬天在草铺上听讲，以背包当坐凳，用膝盖做课桌，平日集中教学，战时分散隐蔽。

学生绝大部分是来自胶东农村的青少年。凡志愿参加抗日战争、具有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少年，经过抗日团体或区以上政府的介绍即可入学。1943年以后，增加入学考试。学生中除大部分是根据地追求革命的知识青年外，还有来自机关、部队的“小鬼”和各地儿童团干部以及敌占区的青少年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但学习的自觉性都很高。

学习内容，除政治课（包括抗战教育、民运工作）外，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生理卫生、抗战歌曲、抗战美术、军事体育等。师范科不设英语，增加教育学。学校十分重视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增长知识能力，尤其注意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教材完全由教师自己编选或编写，由学校的出版队油印出版，基本上可以及时供应。

学生修业年限，为适应战争和根据地建设需要，实行长短结合，四个月、半年、一年不等。后来虽然定为三年，但大多数学生都由于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未及毕业即参军参政，投入到大反攻的行列。目前胶东公学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多数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的骨干。

三、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胶东公学，初期是短训班性质，学习期限是四个月到半年。教育内容以政治教育为中心，同时不放松文化教育。后来，随着根据地的逐渐扩大，学习环境逐渐稳定，学习年限也就延长到一年到三年，开设了初级中学与高级中学的文化课程，师范班增设了教育课，但政治教育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在教育方法上，强调教育联系实际，强调从抗战实践中受教育，从实际生活中受教育。

现在分述如下：

抗战教育：《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统一战线》、《论游击战争》等都是教学的重要内容。许多课程都是领导干部亲自讲授。因为处于敌后战争环境，随时都可能遇到敌人袭击，因此，学生一入学，就按军队建制组织起来，学习站岗放哨，学习行军宿营，学习投弹射击，学习爬越障碍，做种种军事演习；还进行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教育。

对学生进行抗战教育，更重要是从战争学习战争。每次反

扫荡，学校都要自上而下反复地、认真地进行动员，因为反扫荡的胜利与否，涉及到学校和师生的生死存亡。反扫荡正是对学生进行实际的抗战教育，让学生在实际斗争中经受锻炼的极好机会。反扫荡的胜利，使学生的革命世界观更加坚定，同时使学生获得了不少实际的斗争经验。

1942年冬，日寇妄图一举消灭我胶东八路军主力和领导机关，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拉网大扫荡。胶东公学根据上级指示，及时东迁文、荣、分散隐蔽，依靠群众粉碎敌人扫荡。经过层层动员，胶公组成三个大队，分驻文登、荣成南部三片村庄，由赵野民、辛紫上、丁一三位同志分头指挥联络。师生到村后，即分到各家各户，和群众一起吃住，一同准备反扫荡。文登、荣成一带的群众，有很高的觉悟，他们把胶公师生当作自己家里人，当作自己的儿女，帮助化装，想各种办法给予掩护。日寇这次扫荡几乎集中了它们能动用的全部兵力，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把我抗日军民一网打尽。但是敌人越残暴，根据地人民越加同仇敌忾。敌人一踏进根据地，就象聋子瞎子一样，到处扑空挨打，我军则依靠群众，就象长了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能够及时甩开敌人，并时刻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日寇对胶东半岛的这次拉网大扫荡，从南海边到北海边，布下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网，由西向东推进。夜晚烧起一条火网，防止我军民突围，妄图把我军民驱赶到东海边，一网打尽。我胶公师生和群众、民兵、地方武装一起，人自为战，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突破敌人的封锁，并相机进行决死的搏斗。有些师生和老百姓一起被敌人堵截了去，又随时找机会跑了出来。史地教师李飞和群众一起被敌人抓了去，汉奸翻译用绳索棍棒威胁审问他。李飞同志大义凛然地向汉奸作宣传：“我

是中国人，我就要抗战，抗战就不怕死，我看日本灭亡不了中国，我绝不作亡国奴！”最后，汉奸翻译偷偷地把他们放走了。国文教师王纯同志，带领30多位同学，在异常紧张的形势下，和荣成独立营取得联系，跟着独立营，冒着鹅毛大雪和刺骨的寒风，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转向安全地带。国文教师石平同志被敌人堵截去，汉奸把刺刀按在他脖子上进行威胁，石平同志不动声色，坚不吐露身份，最后他随着群众一起跑了出来。女学生阎云带着手榴弹藏在炕洞里，敌人正在搜查时，阎云同学勇敢地拉开手榴弹，把敌人打跑，自己的手指也被炸掉了。一个伙食管理员，敌人发现他身上带着胶东公学印制的饭票，竟把他活活地烧死。教育学教师迟剑敏同志，被敌人抓去，也惨遭杀害。迟剑敏同志从小腿瘸，奋发学习，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曾在青州四师任教，“七·七”事变后，他不顾自己身体残疾，毅然参加抗战教育事业。这位忠于祖国、热爱教育事业的好同志的壮烈牺牲，使胶公师生无限悲痛，同时也激起他们对敌人的极大愤怒。战争教育着每一个人，反扫荡的战场变成了胶公师生的大课堂。日寇“扫荡”结束后，校部部署进行了一次大总结、大评比活动。经过总结评比，除小队、分队、中队表扬的外，由学校大会表扬的有阎云、孙庆荣等七人。他们的斗争事迹，集中地反映了学校的教学成果与广大师生迅速成长的过程。

民运工作教育：民运工作是发动全民抗战的一项重要工作。民运工作教育的主要课题是：“唤起民众”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对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迫切性；觉醒而又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具有强大无比的力量；我们必须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并虚心向群众学习，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军队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作风；深入群众做群众工作应注意的若干问题等。常溪萍老师和其他领导人亲自教授这门课。常溪萍同志建国后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在“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民运工作教育不仅注意在课堂上讲解，更强调革命实践。胶东公学是在群众抗战烽火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与人民群众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自建校之日起，全体师生员工都以八路军为榜样，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不断巩固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

胶公没有固定的校址，每到一地，全体师生员工，大都分散到群众家里去住。上课时集中听讲，下课后分散自学。学生和群众的关系，首先是和房东的关系，是学校考查学生的一项重要内容，象学生学习成绩一样受到重视。每个学生都十分自觉地利用一切可能帮助群众劳动。农忙时的抢收抢种，学校有统一的安排；平时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烧火、做饭，已经成为大家的习惯；对烈军属困难较多者，往往是专人负责，当作自己的亲属一样去帮助照顾。学生们热心帮助群众，是建立在尊重群众、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这种作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胶东公学每到一地，群众往往主动邀学员住到自己家里，并把他们当作家中的一员，以兄弟姐妹相称，确实是亲如家人。

胶东公学还明确规定一项制度，即每个学员每天都要做半小时民运工作，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和解释党的各项政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增强群众信心，消除群众的各种疑虑，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等。学员在这方面做得十分认真。每

到晚饭后的休息时间，驻村中碾盘旁、屋檐下，一个个学生和三三两两的老乡簇拥在一起亲切交谈。在做宣传解释工作的同时，也进行社会调查，了解驻村情况，协助开展驻村工作。从开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到教唱革命歌曲，组织文艺演出；从协助群众建立和健全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到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空舍清野、粉碎日伪扫荡；各项工作，同学们都积极参加去做。通过这些活动，胶东公学师生，每每成为驻地群众的贴心人和好参谋。群众遇到什么困难和纠纷诸如有病求医、兄弟不和、婆媳争吵等也都来找胶公师生商量。师生把帮助群众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1943年胶公驻在珠港时，地主家的童养媳丰玉珍，因不堪家庭折磨，在胶公师生帮助下，毅然脱离地主家庭，参加了革命，以后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

学校师生们在和群众长期的共同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工农群众是革命的主力；认识到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革命事业才能向前发展，学校才能生存并发展壮大，而脱离了工农群众，就一事无成。是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实践，锻炼了广大师生，增强了师生的群众观点，学习了群众路线，初步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方面的教育，对学生素质的提高，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劳动教育：胶东公学建校初期，没有专设劳动课，只是通过政治教育课或民运工作课进行劳动教育。通过劳动教育，批判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思想，教育学生树立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光荣的新思想。在日常生活中，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学校提倡学生尽可能参加助农劳动，并把这种劳动看成是青年学生锻炼成长的重要途径。

1942年，党中央对敌后军民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军队、机关、学校纷纷掀起生产热潮。1944年初，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发布了关于开展学校生产运动的指示，指出：“目前胶东中等学校、职业学校以及各地小学的重要缺点，是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毛病”，要求认真地领导学校与学生参加生产，在开展学校生产运动中，初步做到“生产与教育相结合”。接着，胶公即专门增加了大生产运动的一课。经商得群众的同意，在学校驻地珠港村西的一片芦苇沼泽地上，师生们安营扎寨，进行开荒种地。当时全校师生员工划为六个劳动大队，每天有一个大队参加劳动。全校实行五天教学，一天劳动的制度。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共开垦土地百余亩，全部种上了水稻。同年夏天，学校奉命西迁到海阳县城阳一带，在城阳村南河边又开垦了十几亩荒地，种上了萝卜。学生认真积肥，形成热潮。秋天，水稻、萝卜均获丰收。学校曾组织收割大队远征珠港进行收割。在生产劳动中，学校发起劳动竞赛，比劳动的数量、质量，比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经过生产劳动的锻炼，广大师生高兴地说：“我们不仅在物质生产方面获得丰收，而且在思想方面也获得丰收”。这就初步克服了教育与生产对立的观点，树立了学校教育 with 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学风。

政治时事教育：胶公设有《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和《时事教育》等课程。通过政治时事教育，帮助学生认识旧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新旧军阀以及帝国主义的罪行；让学生了解，革命的目标首先是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男女平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达到物质生产极大的丰富和精神文明的极大提高，再实现各尽

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政治时事教育课上，还联系当时、当地的实际斗争，讲苏联十月革命，讲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讲苏区，讲延安。这一切对青年学生启发很大，对帮助学生确立革命人生观有难以估量的作用。政治教师王方名同志曾主讲过政治时事教育课。他讲课善于联系实际，常常有独到的见解，引人入胜。建国后他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长期从事逻辑学的研究，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

文化知识教育：胶公文化知识课的安排，大体参考高初中和师范学校的作法，设有国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理化或自然、生理卫生、音乐、美术、军事体育等课程。师范班增设教育学，不学外语。教材由教师联系抗战实际自己编写或编选。这些文化基础课，是青少年学生普遍喜爱和迫切需要的课程。事实证明，学好文化基础知识，对青少年学生开扩眼界、增长知识、增长能力，对培养和造就抗战、建国人才，有着重要的意义。学生们学习自觉性很高，简直是如饥似渴。当时胶东公学教文化课的老师也都是有相当水平的，教师们教学态度认真严肃，诲人不倦，使人难忘。王纯老师是一位热爱祖国，献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抗战初期，他只身从家乡招远奔赴延安。他在执教中对学生严格要求，有时严厉批评，但学生很了解他的心情。有些学生说：“王先生是恨铁不成钢”。学生都很尊敬他。建国后，他曾参加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国文教师石平先生，是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生，长期从事国文教学，有丰富的经验。他平日沉默寡言，老成持重，讲起课来生动实际，很受学生欢迎。特别当他宣讲鲁迅先生名著时，学生更是听得入神。有些学生尊称他为“鲁迅先生”。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领导让他休养，他也不肯休息，终因病情日重，医

治无效，于1945年5月逝世。数学教师王桂番先生，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主讲高中数学课。他讲课简练，学生说：

“王先生讲课没有一句废话，一句不多，也一句不能少，真是恰到好处。”建国后他任青岛化工学院数学教授。自然教师辛紫上先生，讲课非常形象生动。他讲太阳、地球、月亮三者关系时，将草帽放地上当太阳，自己当地球，手拿怀表牵着链子的一头绕着自己转当月亮。迄今已40多年，同学们仍记忆犹新。生物教师于寿卿先生，是清华大学毕业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讲课重视实验，自己备有显微镜，行军时同学帮他背着。还有音乐教师王毅先生，美术、体育教师迟宾、迟欣圃先生等，他们教的抗战歌曲、抗战美术、军事体育很受学生欢迎。王毅先生导演的大型歌剧《军民进行曲》，至今还为广大师生所称颂。他们组织、领导的歌咏队、演出队、篮球队对宣传群众、鼓舞斗志和活跃学校文体生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胶东公学还设有一个富有战斗力的出版队。队员有王雁、曲范、冷棘、徐克等。他们工作极为艰苦，完全靠手工刻版油印。行军时，设备器材则全靠人背马驮。为了保证及时印出教材，往往白天行军，夜晚还要在煤油灯下刻印；为了应付敌人扫荡，有时千方百计在山沟里坚持刻印。工作条件如此艰苦，但战斗情绪却非常高昂。例如徐克同志，当时只有十五、六岁，对工作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出版队全体同志对在战争环境保证学校教学工作正常进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敌后战争环境，我们这支教工队伍，不领工资，也不要奖金，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但工作却如此认真努力，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革命。他们每人都有一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共同的心，每人都燃烧着火热的革命

感情，其中有相当部分且是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

四、政治思想工作

胶东公学的学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其年龄较大的十八、九岁，小的只有十四、五岁。在当时艰苦战争年代里，他们能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来到学校学习，是很不容易的。其共同特点是，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要求和抗战爱国热情。但是，他们的革命人生观尚不牢固，思想情绪常受外界影响而波动。而在敌后战争环境，任何和平麻痹思想或惊慌失措情绪都是极端有害的。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在于能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帮助学生解除思想顾虑，使学生经常保持旺盛的斗志，奋发学习，逐步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抗战必胜的胜利信心。

胶公与女中合并后，学校设指导处，主管政治思想工作。指导处配有指导员若干人，各中队、分队（班）也都配有指导员。较长时间担任指导员的有杨文玉、展堂、王少林、徐彬、臧家伦、阚敬一等人。中队长、分队长、小队长是在学生中产生的。这就有了一个管理政治思想工作的队伍（也负责学生的学习辅导和生活管理）。当时的指导员、中队长都是与学生一起听课、一起讨论、吃住在一起、行动在一起。由于一切行动都与学生一起，学生有什么思想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及时解决。解决问题的方法，个人问题一般是采取个别谈心的方法解决。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如属全校性的，则由学校负责人作形势政策报告，或由学校部署结合教学解决。学校有早操、晚点和每周一次生活检讨会的制度。早操，除按时起床、跑步锻炼身

体外，还简单布置一天的生活学习；晚点，主要表扬好人好事，指出应注意的问题；每周一次生活检讨会，主要是小组座谈一周来的成绩、缺点，互相帮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使学生生活有条不紊，生动活泼，经常保持高昂的战斗情绪。由于指导员经常深入学生，又经常与学生促膝谈心，因而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学生中每遇到难解难分的问题，都很自然地去找指导员解决。中队长既是学生又是领导，既要学习又要工作，除协助指导员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外，还要担负行政领导和生活管理的责任。诸如设岗查哨、学习、宣传、生产劳动、行军宿营、吃饭穿衣、甚至深更半夜为学生盖被子等，中队长都要管，完全学习八路军的传统作风。当时担任过中队长的有林克、孙庆荣、唐桂荣等人。

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做好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关键所在，也是搞好教学工作，完成教学任务的根本保证。胶公与女中合并后，随着学生的增多与学校的扩大，学校党总支下设了若干个支部。支部的任务是，围绕教学任务进行政治思想工作，通过政治思想工作，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当时，党员的数量约占学生总数的15%到20%。每个分队（班）可有一个党员小组，2、3个分队设一个支部。校总支十分注意发展新党员，加强党员教育，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的战斗作用；严格执行党的小组会、支部会和教育党员的制度。党总支经常组织党员认真学习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党员有哪些权利和义务等问题，并要求党员身体力行。党支部的分工，有组织、宣传、学习、保卫、生活、民运等委员。校总支对每个党员的要求是，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自己的模范行

动，团结与带动广大学生一道前进。由于支部组织生活正常，各小队每周一次生活检讨会能经常坚持，且支部和小队相互通气，因此有问题能及时解决。不仅学校领导与广大师生打成一片，而且干部之间、学生之间、学生与干部之间都能打成一片。尽管当时在战争环境中，生活极不安定，又比较艰苦，但大家的革命情绪是高涨的。

学生救国会（简称学救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自治组织。成立学救会，对调动学生自身力量，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促进学习，锻炼抗战救国意志，培养为人民服务思想极为有益。学救会的主任和委员是由学生民主推选出来的。委员会分工有组织、宣传、学习、民运、文化娱乐、军事体育等。学校各分队（班）也成立学救会分会，分会分工也大体相同。这样，在学救会的倡导下，学生自学小组组织起来了。有时事小组、哲学小组、文学小组等。当时，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青年学生普遍喜爱的读物。在学习小组的活动蓬勃开展的基础上，学救会还经常组织各种大小讨论会和辩论会。各分会定期出版墙报，并成立歌咏队、演出队、篮球队，活跃文娱体育生活。各分会成立民运小组，安排做好驻村工作，或协助办好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胶东公学演出队和篮球队也曾活跃一时，时而到机关、部队慰问、比赛；时而与军民联欢。当时学救会是很有号召力的，它曾组织“青抗先”大队（半军事性组织，王星三任大队长）和学校驻地民兵结合，清查汉奸土匪，维持治安；也曾组织工作队参加群众运动中去；还组织过“学兵团”到八路军中学军。寒假时，学救会组织文娱宣传队同军队结合，深入敌占区进行演出宣传工作。胶东公学学救会负责人先后有官

策、王星三、舒文（即苏文）等。胶东青联委托胶东公学学救会筹备成立了胶东学生联合会，学联主任高铭凯，副主任宫策、王星三，领导开展胶东的学生运动。当时胶东党政负责人非常重视胶东学联的成立，还专门到会讲话，鼓励学生努力学习，迎接抗战胜利。

五、后 勤 工 作

胶东公学设总务处，掌管学校后勤工作，主要是财务工作和供给工作。

胶公实行供给制，从入学之日起，学生、教师吃饭、穿衣统由学校供给。冬天发棉衣一套，夏天发单衣两套。学生和前方战士一样，每人每月发给一元钱的津贴费。教师从优照顾，全部吃细粮，专办教师伙食，每月发给高一些的津贴费。日寇投降后，1946年，胶公曾分别不同情况实行公费、自费和半工半读等办法。敌后抗战，经费物资都是相当困难的，虽有低标准的供给制度，但到实际发放时，往往还要动员节约，如节约一套单衣或一双鞋子等，尽可能减少开支。为了减轻群众负担，学校提倡自磨自食，经常组织学生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担柴背粮。总务供给工作，既是后勤，又是先行，每次行军、宿营，需要先找好房子、抬锅灶、背干粮袋等。一时难以带走的東西，需要找群众存放，用时再去人搬运。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到处为家，这就更增加了供给工作的困难。总之，在敌后战争环境，要完成全体师生的供应工作，任务是相当艰巨的。除动员师生勤俭节约，不怕艰苦，克服困难外，必须牢固树立依靠群众的思想。但依靠群众不是向群众索取，而是依靠“亲如

家人”的群众关系和“秋毫无犯”的群众纪律。当时，胶公从前方到后方，奔波在供给战线上的有孙光、李志远、江萍、杨翠英等同志。

六、领导与作风

胶东公学由校长、副校长负责主持校务，校长、副校长通过校务会议（各处主任参加）吸收学救会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参加领导。学校设教务、指导、总务三处。教务处负责制定教育计划、课程安排、编选出版教材；指导处负责政治思想和党的工作；总务处负责财务工作和供给工作。学校党的工作，主要是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以保证学校各项工作的胜利完成。胶公实行民主领导，大家分工负责。学校特别强调：

生活军事化，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行动迅速、果断，雷厉风行。天一亮就起床，哨令一响，齐集操场，进行20分钟早操跑步。政治讲话之后是早自习。吃饭以小队为单位各围成一个圈子，啦啦队相互激励，抗战歌声此起彼伏。待饭分完后，哨音一响，歌声马上停止，除吃饭之外，鸦雀无声。白天按时上课，晚上有晚点名，夜间轮流站岗放哨。艰苦的环境培养了学员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胶公的一项制度。学生一入学，就组织他们过民主生活，受民主教育。学校的教育计划、生产劳动计划或驻地工作计划都要有学生和老师参加讨论。学生每周一次生活检讨会，除讨论工作、学习外，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周末文娱晚会由各班俱乐部主持，除由老师报告一周时事外，还演出抗战歌曲、乐器演奏、京

剧、小调、笑话、故事等节目，师生一起参加。学术讨论或辩论相当活跃。如“什么是真抗战，什么是假抗战”等问题的争论，青年们都踊跃参加，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是胶公师生共同的信念。根据地的物质条件困难，学校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夏天大树底下是课堂，冬天在草铺上听讲，背包当板凳，书本放在膝盖上，一年到头粗茶淡饭充饥肠。但学生并不以为苦，反而觉得学知识干革命其乐无穷，表现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团结友爱、同心同德，是胶公师生战斗力量的源泉。学校重视团结知识分子，想各种办法网罗人才，教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学校的尊师重教气氛非常浓厚，师生关系十分融洽。老师为解除学生连续行军的疲劳，有时自愿替学生站岗、放哨，或彻夜不眠照顾学生病号；学生也非常关心老师，行军替老师背行李，老师病了，用担架抬着老师百里行军。这不仅因为老师、学生有一个共同抗战救国的奋斗目标，而且因为他们在战争环境里患难与共，建立了深厚的阶级友情。可以说，胶公的师生关系，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师生关系，而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的关系。在这里不禁想起了长期在胶东公学负责领导工作的赵野民同志。他从1938年到1945年，一直在胶公担任校长或副校长职务。他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生物系，长期在中等学校任教。“七·七”事变后，他毅然和爱人一起参加抗战。他热爱教育，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建国后，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因疲劳过度，突发心脏病逝世，提起来大家都怀念他。

从八路军山东干部学校 到抗大一分校的回忆片断

孔 福 亭

震撼中外的芦沟桥事变，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潮。中共山东省委发出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拿起武器，组织抗日游击队，动员一切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各地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纷纷组成了人民抗日武装，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于是，为抗日工作训练与提高干部，就成为当时革命的迫切需要。

（一）

1938年7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建立了“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干校），宣传部长孙陶林兼任校长。学校分设政治处、教育处、总务处，管理学校的工作。学校的干部有的是从部队抽调来的，有的是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来的。学员多数是由各部队抽调来的排、连、营级干部，还有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也有刚离家的学生，每期学习三个月。学员分编成军事队、政治队、民运队、地方武装队、青年队、妇女队等，每队100多人，全校共700多人。1936年反扫荡时干校停办，共办了五期。

1936年11月，干校与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以下简称

随校)合并，由纵队直接领导。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兼任校长，袁也烈为副校长，徐元泉为政治处主任，汪德为教育处长。校部设有供给股、卫生所等。政治处设有组织、宣传、民运、保卫、青年等干事。教育处设有军教干事、政教干事、政员、文化等教员。中队按数字顺序排列，按政治、军事、地方工作等编队，共6个中队，700多人。中队的队长、指导员，加上3个分队长为专职干部。学习时间为半年。驻地流动于沂南县鲁山前后。

在武汉会战后，日寇回师巩固其占领区，进行强化治安；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敌、顽、我斗争尖锐复杂，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为了更多更好地培训山东党政军民干部，坚持斗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于1939年冬由晋东南挺进到山东沂蒙山区。1940年3月随校的全体学员及大部分干部又并入抗大一分校。

1940年6月，山东分局决定，抗大一分校改为山东抗日军政大学，由周纯全任校长，李培南任政治委员。校部设有行政、队列、供给、卫生等科，还有被服厂、制药厂等。政治部主任李培南兼，副主任刘浩天。政治部设有组织、宣传、民运、锄奸等科，出版油印校报《战旗报》、校刊《共产党员》，还设有文艺工作团和民运工作团。训练部部长袁也烈，副部长阎捷三。训练部设有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等科。

山东抗日军政大学下设三个分校，我们第一分校在沂蒙山区的沂南、莒南、日照、费县、蒙阴等地活动。第一分校所属各大队在教学上各有重点，有的偏重培养军事工作干部，有的偏重培养政治工作干部，有的偏重培养地方工作干部。例如第

五大队是侧重军事的，故也叫军事大队，学员多是从山东各部队调来的班、排、连、营干部，也有地方工作干部。

每个大队有6、7个中队，学员约800人左右。大队（也称为团）有正副大队长、政委，大队部有文书、队列干事，有供给股、卫生所和侦察、通信、炊事、饲养等班。大队政治处有主任，设组织、宣传、民运、锄奸等干事，有时设股，每股2人。大队教育有处长，设若干军教、政教等干事和军事、政治、文化等教员。中队（也称为连）有正副队长、指导员，3个区队长，2个教员，这样即使在分散的情况下，也可教学。在反扫荡及其他战时情况下，临时增加营的建制，便于指挥作战。机构是精干的。一个大队全部专职干部共70人左右，但解决问题是很及时的。为了保密，校、大队、中队的名称，都用地名为代号，校及大队的负责同志，都用数字代号称呼。

从干校到山东抗日军政大学，对学员只负责教育训练，不管分配；每期学员毕业后，都由省委分局分配工作。

（二）

山东党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很重视对军政干部学校的领导，不断地解决建校后的一些困难。分局进驻沂南县岸堤镇后，和干校在一起住了4个多月。后来，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向北移60里住在王庄一带，分局书记郭洪涛同志专程来干校检查工作或作报告。有一次讲辩证唯物主义，他讲的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兼校长孙陶林、分局组织部长程照轩、秘书长赵玉、党校负责人潘维周，都来干校检查过工作或作过报告。1939年在日寇扫荡前，山东分局及校长均来信指示：要从各方面做好反

扫荡准备；要离开从两期开始已住了一年的岸堤镇；要轻装，分散活动；要加强政治工作，依靠群众，搞好侦察通信；要警惕奸细破坏等。

徐向前司令员对随校是很关心的，经常过问随校各方面活动，检查教育计划执行情况。1939年9月底接收学员完毕后，校政治处派我去向徐司令员汇报，并请示开学事宜。我行军70多里到达徐司令员驻地，晚饭后徐司令员和朱瑞政委要我去汇报，他们询问、指示均甚详。在10月举行开学典礼时，全校人员由东蒙山下佛驻村行军30里，住在艾山角下李林一带。大会于黄昏后在新搭的一个高台前举行，全校人员列队坐在旷野地上，徐司令员、朱政委亲临会场。徐司令员向全体学员介绍了中队以上的干部，并致词祝贺开学，勉励学员努力学习，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及各方面的工作能力；要求随校全体干部，在各种情况下搞好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朱政委作了长篇报告，深刻地讲解了毛主席关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时战略战术”的抗大教育方针。虽然晚上灯光暗淡，很多同志还是认真地记笔记。朱政委的报告，成为随校干部、教职员、学员进行工作、学习、教学和从事日常一切活动的指针。

徐司令员很重视提高随校干部、学员的工作质量和教学质量，常到校作报告。1939年中秋节，他来随校检查工作，下午在东蒙山角下的东梭庄向全体同志讲了作战、驻防、行军、教学，以及其他方面的政治工作。正在这时从临沂来的日寇，直向我们的驻地攻来，徐司令员带来的一个营，担任警卫和阻止日军前进的任务。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徐司令员仍沉着地作报告，大家也仍在认真地听记，到六时多才讲完。这时敌人距我

们已很近了，晚饭也来不及吃，把做好的饭菜装进桶，就马上转移。这夜我们露宿在山坡上。

山东党和部队的领导同志，很重视对山东抗日军政大学的领导，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时常到学校检查工作并作形势报告。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时，朱瑞同志对直属机关及我们学校作了报告。朱瑞同志还专门来校作过哲学报告，特别是对对立统一的规律，作了详细的阐述。还来校讲过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问题，结合实际，以生动的语言进行了讲述。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同志也专来学校作过报告，讲了如何发动、组织群众，扩大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及反蚕食斗争等问题。115师政治部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都来校了解过工作或作过报告。

（三）

当时学校的教育方针是以军事教育为主，要求生活军事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以战斗保卫学习。在教学方法上，强调讲好课、认真记笔记、搞好小组讨论，并且重视实践，要求学了即做，多演习、多观摩、多总结，互教互学，共同提高。在教学内容方面，军事教育，主要讲授战略战术、游击战、运动战、反扫荡、反蚕食、反顽斗争等问题。政治教育包括形势教育、政治工作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等。群众运动教育有发动组织群众，建立巩固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组织领导自卫队和民兵等内容。

教学时，有专职的军事、政治、文化教员讲课，校级各处科负责同志及大队、中队领导干部报告、小结、讲评。每次讲课后要以班为单位联系实际进行讨论，分段进行小结。每学期开始，先订好教学计划，有要求，有措施，每期结束时有详细总结。政治工作及党员的活动要保证教学计划及行政、军事任务的完成，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每个中队干部必须经常掌握学员的思想动态。那时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生活十分艰苦，经常流动分散，并要随时准备战斗，因此必须及时了解学员的思想情况，及时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使每个学员都敢于面对现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学习。

经常进行军事演习，这是理论联系实际，检验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好方法。如在干校时有一次演习，由驻地岸堤镇出发，一路上有时进行快速行军，有时实习伏击、进攻、退却、侦察、联络以及结合进行政治工作等，行程30里，到达垛庄镇宿营。晚上又做紧急集合、夜间活动等演习，第二天返回原驻地，进行总结。又如在抗大一分校时，第五大队为坚持边沿地区斗争，曾住在日照县的山口一带，距汉奸据点只有五里。一天夜里大家正在酣睡时，突然枪声大作，大家一跃而起，迅速整好行装立即出发。当时大队部陈管理员来不及牵马，扛起晚饭前整理好的装文件的马驮架子就跑出村外。经过一阵急行军，来到树林里集合。黎有璋大队长宣布这是演习，进行了总结后又回村睡觉。有一次，第五大队驻在莒南县甲子山区，靠近国民党57军的防地。一天后半夜突然紧急集合，宣布敌人开始扫荡，我们立即转移，行军既肃静，又快速。当进入甲子山西部时，恰巧遇上57军的巡逻队，向我们开枪射击。

这个意外的插曲，丰富了演习的内容。把敌巡逻队击退后天已亮，集合队伍，通知这是演习，总结了经验又返回原驻地。这是一些大的演习，平日在讲军事课后，班、区队、中队的随时演习，是不胜枚举的。至于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经常和敌伪顽进行战斗，也都是军事实习的好机会。每次战斗后都要深入地进行讨论、检查、总结，及时表扬指挥有方和战斗勇敢的指战员，并严肃批评教育恐慌、畏缩不前和指挥不利的同志。例如在一次战斗中，有个指导员表现不够好，大队党总支召开了区队长以上的党员干部会议，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耐心地帮助他改正错误，最后他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那时对犯错误的同志，批评教育是及时的，但很少做组织上的处理。以这种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来教育训练干部、学员，是卓有成效的。

（四）

只有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才能保证提高教学质量，圆满地完成教学任务及军事、行政任务。在干校，随校党的组织均为总支委员会，中队为党支部。总支经常研究如何完成教学计划及军事工作的问题。在干校时，党员不公开，支部、小组的活动是秘密的，不开支部大会。到随校时党的活动公开了，可公开召开支部大会，并以支部为核心来领导中队的一切活动。小组会、支委会、支部大会，广泛地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铁的纪律，提高党员的自觉性，要求党员自觉地起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广大群众，保证完成教学任务。干校学员中党员较少，入学时党员只占全体学员的20—30%，

因之要求更多地发展党员。经过考察后，一般都在学习后期发展。从3期开始，在发展党员前，先由政治处主任向全体学员讲党的性质、纲领、任务、入党条件、入党手续等。凡是要求入党的可找指导员提出申请。在校学习努力，政治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肯干，团结友爱，战斗中勇敢，生活上吃苦耐劳，并坚决拥护党的纲领，积极要求入党的学员，经过组织审查，只要政治历史清楚，就可以秘密地个别吸收入党。手续是：先在党小组会通过，支委研究同意后，填写入党志愿书，须找两个介绍人介绍，报校党总支批准，最后举行入党仪式。在结业时，每队的党员可达70—80%。干校在建党方面是有一定贡献的。在当时，这些党员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38年到1939年大量发展党员，党中央提出巩固党、审查党后，随校发展党员很少。山东抗日军政大学时，校为党委会，各大队为总支委员会，中队为支委会，对发展党员要求高，实行积极地培养、慎重地发展的方针。为了更好地发扬民主，保证圆满地完成教学任务，1940年夏和1942年夏开了两次全校党代表大会，总结部署教育工作和军事行政工作，选举校党委会委员。在会上，代表们充分发扬民主、认真讨论，畅所欲言。大会开得生动活泼，朝气蓬勃，对代表们教育鼓舞很大。在校党代会前，各总支都召开了代表大会，除了总结布置工作，选举总支委员外，还选举出席校党代会的代表。校党代会后，又将会议精神逐级传达贯彻到每个党员。这次党代会，对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增强党员党性，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保证提高教学质量及各项军事行政任务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

学校党组织还通过上党课，向党员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及党规党法的教育。那时没有看到过六大党章，在进行党的教

育时，着重讲解下列问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要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努力完成党分配的工作，勇敢战斗不怕牺牲；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保守党的秘密，遵守铁的纪律等。1940年夏，在巩固党、审查党中，对过去入党手续不完备的，又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补办了手续：入党时没有举行入党宣誓仪式的，补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应有候补期而没有的，扣除了候补期；入党介绍人不符规定的，补充了介绍人。这为以后更加完善入党手续奠定了基础。

要搞好教育工作，就必须首先提高在校工作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为此狠抓了干部的学习，组织干部及时学习党中央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文章，以及重要的军事、政治、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书籍。1938年到1939年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徐懋庸的《社会科学概论》等。每天早晨下操后，干部都自学一小时左右。对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有组织地学习了一段时间；对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1940年学了半年多。学习中，对照自己的思想认真进行讨论，对干部改造世界观，锻炼思想意识，克服非无产阶级的观点、思想、作风，增强党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41年起学了一年多的《联共党史》，先自学，再由教育处长胡呈方根据校训练部写的提纲作辅导报告，然后进行讨论，联系我国情况来加深理解。还认真学习了《增强党性的决定》、《改造我们的学习》等重要文件。1942年学习了《精兵简政》、《论党内斗争》等，边学边改，立即见诸行动。深入学习讨论了整顿三风的报告以后，每人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等问题，都做了检查。

学校还严格要求党员干部学习中央党刊《共产党人》，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及其他刊物和报纸。大队开干部会议时，政治处主任常抽考几位干部，要求立即回答党刊上某篇文章的主要精神，这更推动了学习。大家把精力都集中在努力提高自己，搞好教学工作，提高教育质量上。不少干部在5年、6年、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只享受连级待遇，这与部队及地方干部提拔快，形成鲜明的对照，但同志们很少有人不安心或闹情绪的。这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成果。

对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样是强有力的，很重视艰苦奋斗、团结友爱的教育。那时处在对敌斗争的恶劣环境里，实行战时供给制，每人每天只有几分钱的菜金，得一温饱就算幸事。洗脸刷牙多在河边、沟溪边，冬天破冰用水。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的革命热情很高，大家的心情是愉快的，相互之间是友爱团结的。有的同志病了，大家争相照顾，进行安慰，炊事员尽量设法做点面饭或小米饭给病号吃。党员更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有时饭不够吃，自己少吃让别人吃饱。有了艰苦的任务，大家争着去做。真是一个革命团结的大家庭。在早操前后、饭前、课后、会前、晚会演出前，我们经常高唱抗大校歌：“黄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嘹亮的歌声飘荡在广阔的原野，回响在起伏的山峦中。

在进行战斗及反扫荡时，更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战前做好备战及动员，战斗中搞好鼓动工作，发挥干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战后作总结。例如在1940年秋准备反扫荡时，第五大队党总支提出了评选模范党员的号召。这次反扫荡结束后，从班组到区队、中队、大队，逐级进行了总结评比选举，有1/3的党员获得了模范党员的光荣称号。

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与其他同志及学员之间，关系都很融洽；生活上是一样待遇，个别同志身体残废或有疾病，每月只多发2—3元的保健费。干部的住房大家可以随便出入，随时可以找干部谈心或反映情况，干部也常到学员的住处交谈。党的小组会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态度是认真严肃的，并且是实事求是耐心说服的。在日常相处中，同志间无产阶级的感情是深厚而诚挚的。

（五）

要提高教学质量，首先必须有好的领导班子。抗大的科长及大队以上干部都是红军干部，都有丰富的战争经验。政治工作干部有红军干部、地下工作者及知识分子，不仅有经验，大多能讲能写。做教育工作的多数是大学生，也有红军及地下党工作者，也有个别是干过旧军队的进步分子。他们在文化上有基础，各方面的知识比较丰富。

提高教学质量，还须有好的教材。三个学校对于备课、写教材都很重视，虽然条件差，还是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军事、政治、文化等科里面又分有专业，如政治教育有专讲社会科学的，有专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专讲统一战线的，如此等等。政治教员杜平斋参加革命很早，已当了多年的教员，他讲民主革命课，准备很充分，讲的纲目事例极为清晰，密切联系实际，学员易懂易记，各队都由他讲，很受欢迎。在备课中，为了联系实际，教员们经常向农民群众、学员、参加战斗的同志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材料，充实授课内容；讲课后，与学员一起讨论、考察接受程度，听取反映，不断改进教学。军事课从

制式教练基本动作学起，重视刺杀锻炼，学游击战、夜战、埋伏战、遭遇战、攻击战、退却战等战术，还学习在各种战斗中如何指挥班、排、连、营等作战。在军事课中很重视演习及实战经验的总结。1940年，第五大队对沂南县向庄伪军据点包围了一段时间以后，用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击相结合的办法一举攻克了该据点。同年夏天日寇利用青纱帐，在中午奔袭我一个中队的驻地丁家庄，被我迂回击退。这些，都详细进行了总结，吸取经验教训，提高学员的战术战斗水平。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1941年开展了红五月运动。事先制定了计划，对干部、党员群众都进行了动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要求，号召创建模范连队，争当模范学员、模范工作干部、模范学习干部等等。这时我们驻在莒南县的沭河东岸昔林泉一带的平原地区，干部、学员真是干劲大、热气高。天刚放亮，值日干部哨子一响，学员们迅即起床，村村都响起了嘹亮的歌声，大家边唱边穿好衣服整理好行装，在15分钟的时间内，就排列着整齐的队伍出操了。干部也照样跑步出操。洗脸、刷牙、吃饭都是快速的。政治课、军事课、文化课有机地配合进行。班组讨论时，发言普遍，能抓住中心，联系实际；有不同意见能够展开争论，组长最后有简要小结。领导干部常去听教员讲课，参加学员的小组讨论，也组织教员互相观摩讲课，对教学效果好的，及时介绍推广其教学经验；对教学效果差的，及时帮助改进。政治处、教育处的干部，经常有组织地下队去检查工作，广泛接触学员，了解情况，征求意见，然后集中汇报综合，进一步提出对搞好教学的要求。每天晚饭后教唱革命歌曲，搞体育活动或排练文娱节目。周末开晚会时，节目丰富多彩，有唱的，有讲的，有演的。中队与机关干部的工作、学

习是紧张而有秩序，除了抓好教学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外，也很注意在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尽量搞好生活，调剂好饭菜，使品种多样化。在红五月运动中，一切活动都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在进行，并且及时检查与小结，真正地发挥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在最后总结时，都认为成绩很大。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各级干部很重视调查研究，注意收集校内外政治、军事、政府工作、群众工作及学员的各方面的情况，充实到教材中去，更密切地联系不同条件、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实际情况，丰富教学内容。中队干部要了解每个学员的出身、成份、入伍前后的表现等情况，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工作。另外还必须掌握本队各班的武器、弹药和战斗力的情况，以便更好地使用力量进行战斗。在开大队干部会时，大队领导干部常抽试中队干部对学员各方面情况的了解，并要当场做出回答。

（六）

学校要独立自主，以战斗保卫教学，用实战来提高学员的军事水平，所以学校也是战斗队。在战火弥漫的环境里，任何机关、团体、学校都必须学习战争，学会打击、消灭敌人，保存、发展、壮大自己。

我在学校工作期间，经过了1939年6月上旬开始的40多天的对日寇反扫荡战，1940年9月开始的一个多月的第二次反扫荡战，1941年10月下旬开始的50多天的第三次大反扫荡战。

为了机动灵活地和敌人作战，学校基本上是以中队为单位

分散活动，机关的军政干部多数分到中队去帮助工作。1939年反扫荡时，我是一个加强队(四十分队)的指导员。我们和日寇在马牧池、岸堤、岱庄、万粮庄、合子沟一带进行了捉迷藏式的斗争，有几次小的战斗接触，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保护了群众。我们派出了学员分别到垛庄、崖子、塘子，高湖、岱庄等乡任乡长、助理员、乡分队长等，建立了乡公所，拉起了乡分队。群众有依靠了，我们有根了，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反扫荡尾期，从7月底到8月中旬，我们这个队先去围攻汉奸据点仕朗宅；又去歼灭了占据鹤头泉的30多人的汉奸土匪武装，解救了回民南蓉芙清真寺的阿訇及知名人士杨某等；应蒙阴县委李成士的要求，我们奔赴蒙阴县南，智取了经堂子汉奸碉堡，人枪全获，支援了蒙阴县委开展工作。

1940年反扫荡时，我跟四中队行动。队长谢坚是红军干部，英勇善战。一天下午，我们住在东蒙山簸箕峪一带，侦察员报告蒙阴及临沂的日寇分头向我们驻地合击，我们准备向南转移；又报南边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及其控制下的黄沙会迷信武装，从南向我们袭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当机立断，立即快速行军，趁蒙阴、临沂两路敌人尚未汇合时，从其中间奔向北山孟良崮。到达孟良崮时，天已昏暗，在山上分散露宿。翌日太阳刚出，日寇侦察机就来低空盘旋，下午鬼子分数路向北山接近，把我们包围了。入夜，鬼子到处点上篝火，如同白昼。我们决定立即突围。从陡峭的山崖间下山，翻过一山又一山，足足走了一夜，到达了中蒙山南边、费县北部的十八村。10月中旬，山东纵队组织反击。在八路军部队一连拔除了16个据点后，又攻打仕朗宅。我们五大队去进行瓦解争取黄沙会的工作，也收到很好效果。

1941年日寇的扫荡更加残酷，兵力特多，鬼子还爬上高山搜捕。我们转到外线，绕行了很大的圈子，周旋了一个多月，于11月28日夜进入东蒙山隐蔽休息。29日夜，临沂、沂水、费县的日寇集中了很大的兵力向我们进犯，30日拂晓打响，我们第五大队掩护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二中队指导员程克带一个区队阻击北面的日寇，弹药耗光后，又与敌人进行肉搏战，程克抱住了一个鬼子一口咬下了他的耳朵，然后壮烈牺牲。这个区队大部分同志牺牲了，但是延缓了敌人的推进计划，争取了突围的时间。五中队队长邱敏带一个区队阻击敌人，一挺轻机枪打死了不少日寇。机枪射手牺牲了，邱队长抱起机枪扫射；子弹打光了，他大呼：“同志们，快拿子弹来！”打得勇猛顽强。最后邱队长与这个区队大部分同志也英勇牺牲。五大队完成掩护任务后，下午三时许胜利突围到中蒙山。这就是有名的大青山战斗。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及德国友人汉斯·希伯壮烈牺牲了。此后第五大队一直在蒙山坚持斗争。

12月下旬，第五大队奉命带着校文工团、供给部门、卫生部门及病号等，迁移到莒南县去。行军中必须在一夜内通过汶河、沂河、沭河及青沂公路、台潍公路两条封锁线，行程约百里。21日天黑时，经过了动员，从佛驻一带开始了行军。这夜无月亮，天色昏暗，朔风凛烈，几次调换向导，还是走了些弯路，恰巧在相距50里的沂河、沭河中间这个危险地带天亮了，只好停在一条沟渠中隐蔽，动员大家做好战斗准备，荷枪实弹以待敌人。9时许，夏庄日寇的武装侦察来了，打了一会，我们向西转移，鬼子也返回夏庄。下午3时多，我们正在圣母塚村做饭，鬼子的轻重机枪、大炮一齐向我们倾泻，炮弹在附近爆炸，我们用两个中队分头阻击，大部队继续向西

转移。到了八角汪一带天已黑，我们马上整队东进，虽一天未餐，但大家精神抖擞。过了有封锁沟的台潍公路，渡了沭河，就到了莒南县。这时学员及勤务人员均穿棉衣裤，但学校干部还是穿着单军装，依靠羊皮大衣御寒，1942年元旦才穿上滨海专署赶制好的棉衣，又过了几天才穿上棉裤和盖上二斤棉花的被子。在这次反扫荡中，第五大队的干部，牺牲及负伤的各10人左右，可见斗争的激烈残酷。每个同志都在战争中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更好地学习了战争，锻炼了自己。到了莒南以后，通过了从下到上，从上到下的认真总结，提高了每一个同志的战术水平及思想政治水平。

(七)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解放全人类而战斗的，所以抗大抓紧一切时机做好驻地及周围村庄的群众工作。校民运工作团常到十数里外进行宣传教育，发动和组织群众，帮助村、乡、区民主政权开展工作。各大队政治处从事民运工作的同志，一到驻地就找村乡政权联系，了解情况，帮助工作。这已成为我们的习惯了。每个同志都首先做好房东的工作，再作周围住户的工作；在村子里住的时间较长时，就要求和群众交朋友，建立友谊。1939年，我们在沂南县下佛驻村住的时间较长。房东刘大娘为人敦厚，有两个儿子及儿媳孙子等。我们经常和他们谈抗战道理，帮助他们担水扫院子。她儿媳帮我们补衣袜，抢着给我们洗衣服，关系融洽，亲如一家。此后凡行军经过这个村时，我们必定去看望老大娘。1941年春，我们驻莒南县良店的时间较久，广泛地开展了交朋友的工作，利用晚饭

后找群众谈心，因而当地有的知识青年入一分校学习，有的参加了革命工作。

学校重视拥政爱民工作，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各中队、各单位都有执行情况检查组，每当离开驻地时，就到各房东家中进行检查，看地铺整理好没有，地扫干净没有，门板上好没有，借物损物偿还了没有，有无其他违犯纪律现象，等等。若查出不当之处，马上进行解决。就是在战斗情况下仓促离开，事后也派检查组去检查。如1940年5月左右，我们住在尖家庄、瓦子坪一带，蒙阴县的日寇突然窜来袭击，战斗立即打响了。我们分别向北庄、田家庄一带转移，日寇见奔袭不成，很快撤退了。我们在鲁山南集结，另选住地，次日就派人到原驻地对群众进行慰抚，并检查了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1942年春开展生产运动时，我们大力帮助驻地群众生产，特别注意对抗、烈属的帮助，为他们耕地、运肥、锄草、担水等。夏、秋则帮助农民收割、打场、运粮等。在帮助群众耕地时，我们5、6人共拉一只犁，累得汗流浹背，大家还是争着干。运肥时我们学会了推小车，直累得气喘吁吁。

沂南县南蓉芙村是回民村，我们多次住过这个村，我们很尊重他们的民族习俗，不违犯他们的规定。我们移住别村时，他们常来看望我们，向我们反映情况，在敌情变化时给我们送情报。还有沂南县的东棱庄，也是我们常住的村子，与群众的关系很好。通过各种爱民活动，巩固了军民之间深厚的鱼水感情。

我们还经常帮助地方党委及政府举办训练班。第五大队政治处做民运工作的郑学礼，也数次到地方举办的训练班去讲课。1941年6月间，我应莒南县委宣传部的邀约，到他们在水磨村办的干部、党员训练班去讲党的基础知识。

1940年秋，党号召要爱护根据地，减轻人民负担。为了让沂蒙山区根据地的人民很好地休养生息，机关、部队、学校都要移到边沿地区驻防，开展工作，加强对敌斗争。第五大队奉命进驻蒙阴城南西蒙山北麓的狭长地区，一面教学，一面宣传教育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当时环境恶劣，生活艰苦，经过了3个月左右，和伪军战斗过几次，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开展了群众工作。在这些实际斗争中，教学质量也得到提高。

（八）

要办好学校必须依靠群众，而学校又具备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好条件。这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主要任务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反日反汉奸。因之我们向群众宣传的内容，主要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暴掳掠、灭绝人寰、企图叫我亡国灭种的罪行，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团结战斗，搞好生产，抗日救国。另外，我们还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是坚持抗日，解放全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党和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应当支援战争，帮助八路军等……我们在各村刷写抗日救国的标语口号，在驻地教儿童、青年、妇女学唱抗战革命歌曲。黄昏后，是工、农、青、妇、自卫队、儿童团进行活动的时候，驻地村子里歌声此起彼伏，那种欢跃活泼快乐的情景，十分动人。

我们经常派出宣传组、队到各村进行宣传教育，教唱歌曲，有时也演出街头剧，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各中队都有俱乐部，排练短小精练的、以宣传抗战为内容的剧目，夜间到附近村镇演出。1940年夏，第五大队驻沂南县垛庄一带，政治处

组织了宣传演出队，到汶河北岸双堍镇演出。河对面就是汉奸据点仕朗宅，环境是恶劣的，随时有战斗的可能，但周围各村群众来看演出的很多。区中队荷枪实弹参加，既负责警戒，又看演出。通过宣传工作，启发了群众对敌斗争的觉悟和勇气，双堍镇的群众就始终站在我们一边。

我们在驻地召开纪念会、庆祝会或文娱晚会，也约附近群众参加。1939年随校住在李林一带，11月7日晚饭后，行军12里到纵队司令部驻地马牧池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到会的军民很多，徐司令员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详细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我们应如何学习十月革命的精神和完成当前的任务等，大家很受教育。会后我们还组织讨论了徐司令员的报告。1941年元旦，抗大一分校，在沂南县崖子开庆祝大会，校长和政委等讲话，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工作，提出了1941年的任务，也演出了节目。1941年夏，我们住在莒南县昔林泉、道口一带，山东的党政军及115师的领导机关住在东边，我们进行了会演。115师的战士剧团演出了《雷雨》，抗大一分校剧团演出了《阿Q正传》、《李秀成之死》等，表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只因驻地分散，集合时间较久，再加布景化装等，有两次演完戏已是黎明了，但参加观看的军民情绪都很高，认为这是接受教育、密切军民关系的好机会。

在国际国内发生一些大的事件时，我们也开大会广泛宣传教育。1939年春，发生的太河惨案：八路军山东第三支队送一批干部来山东干部学校学习，途经太河镇时，突遭山东顽军头子秦启荣部的埋伏，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及一些干部牺牲。干校闻讯后在岸堤村外开了追悼大会，政治处主任徐元泉讲得激昂悲愤，声泪俱下，参加会的军民皆泣不成声，都决心化悲痛为

力量，一定好好学习，向敌、伪、顽讨还血债。1941年皖南事变的消息传来时，第五大队住在莒南良店一带，向学员进行了传达，大家义愤填膺，向群众进行了广泛宣传，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恶行径。我们还写刷标语要求严惩皖南事变的肇事凶手何应钦、汤恩伯，重申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政策。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侵略苏联战争后，在昔林泉东边召开大会，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报告了苏德战场斗争形势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并且指出，我党政军民的义务是努力加强、提高自己，做好工作，更有效地打击日寇，为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而努力战斗，争取最后胜利。

（九）

不断地训练提高干部，是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不造就大量的能战斗能建设的优秀干部，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要巩固发展胜利成果，更是不可能的。三个学校在培训干部工作上，成绩是巨大的。干校训练干部2,000多人。随校的学员700多人，编入抗大一分校后才结业。抗大一分校到我离开时已培训干部10,000多人。我是1938年在八路军山东第二支队任指导员时派去干校学习的，由于干校干部少，到干校后不几天就要我工作了，以后历任三、四、五期的中队指导员，并为校党总支委员。干校并入随校后，我仍任校党总支委员，并任政治处组织干事。随校并入抗大一分校后，我任第五大队政治处组织干事二年多，又任过第二大队指导员，均为大队党总支委员。1942年底，我到莒县做地方工作。此后抗

抗大一分校一直活动在沂蒙地区。1945年4月，在这黎明前黑暗的时候，日寇要巩固沿海地区，企图打击我革命力量，防止英美登陆，要进行大扫荡。这时我在莒县县委工作，在紧张的备战中，抗大一分校来莒县隐蔽了几天。

刘少奇同志在1941年下半年，由华中到山东检查工作以后，为了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巩固壮大抗战力量，山东党政军领导决定，把在抗大一分校工作的干部与部队及地方工作干部进行交流。1942年春精兵简政时，抗大一分校调出了数量比较多的干部到山东分局组织的减租减息工作队，调进袁仲贤为副校长。以后陆续调出调入一些干部，不久周纯全、李培南也相继调出学校。

军政干部学校培养训练的干部和学员，在战争年代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战争时期，战斗和工作在不同岗位上的同志，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忘我地工作，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如在于校当过政治教员的徐仲林，后任县委书记，在艰苦的情况下积极开辟工作，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在随校当政治教员的宋文礼，后任记者，在解放莒县城的战斗中，他到前线采访，光荣殉职。干校学员王博民留校作党的工作，又经随校到抗大一分校，后到一个地委工作，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米新华从干校、随校到抗大一分校都任队长，工作积极负责，对不良倾向敢于批评，在休养中被混进来的坏人暗害，田一亩在抗大学习后留校做党的工作，工作肯干，不怕艰苦困难，后转到胶东的部队工作，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安征夫是红军干部，任过抗大一分校宣传科长，工作认真能干，富有创造性，后到滨海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为了抓好部队、地方武装及民兵的政治工作，夜以继日地干，后

因病去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崔兰亭从干校一建立就在干校学习、工作，任过大队长，为搞好行政内务及抓好生活而努力不懈，作战勇敢，因负重伤而成为二等残废，只好离休。类似的事例还很多，不再多叙。

全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工作上做出了出色的成就而致身残或献出生命的也很多。如在第五大队任过政委的李振邦，任过副大队长的严似海，都是红军干部，是军级干部，工作勤恳积极，作战勇敢，一直在部队做政治工作和军事教育工作，因长期的艰苦奋斗而使身体衰弱，不得不离休。齐仲华是干校学员，后在天津港务局任党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历经坎坷，又因连夜写证明材料劳累，心肌梗塞病亡。安鼎铭、曹国珍分别在抗大一分校做过宣传工作及卫生工作，以后在济南市及上海市工作，都工作得很有成绩，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相继去世。段克杰是干校四期学员，后在地方工作，南下到浙江，工作得很出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在随校任副校长、在抗大一分校任训练部长的袁也烈，在红军时期就是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一直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也遭林彪、“四人帮”长期摧残，含冤而逝。

现在的幸存者，大都担任党、政、军的较高职务，据我所知任省委书记、副书记的有之，任部队军级以上职务的有陈得先、杨大易、邓乃觉、吴坤、彦红、郑惕、王道全、耿学文、张守伦等，至于任中央政府的司局长，省的部、委、厅、局长，大专院校负责人的更是举不胜举了，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有。他们都在为新的长征，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而不懈的努力，决心做出更大的贡献。

（写于1980年4月）

抗战初期的山东省第六区

游击司令部聊城政治干部学校

许 法

邓 愧 余

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聊城政治干部学校，是抗战初期我党鲁西北特委协助范筑先将军创办的一所干部学校。这所学校培养了大批军队政工干部，对开创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寇猖狂侵占我国领土。国民党政府节节后退，人民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紧急关头，中共鲁西北特委积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同时，为培养军队政工干部，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还协助范筑先将军仿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法，创办了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聊城政治干部学校（简称政治干部学校）。校址就设在聊城城内状元街原山东省第二中学（现为聊城实验小校）。

政治干部学校第一期于1938年7月开学，学习时间三个月。校长由范筑先兼任，副校长张郁光，教务长齐燕铭，训育长周子明（周自睿），校部设教务、训育、总务三个处。校党支部（支部书记巩固，又名巩子展、巩俊杰）在鲁西北特委领导下，在学校发展了党组织，并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政治干部学校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为校训、校风；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全校实行军事管理。校部下设一个大队，大队长是周子明（兼）、于汇川。大队下设中队。第一期三个中队，中队设中队长、指导员。高境、陈自銓、高衡书（高衡）、李肇安、郝冠英（郝鲁佛，女）、王玄等分别担任各队指导员。每一中队下设三个小队，中、小队长多由第六区游击司令部（原保安司令部）委派的连、排级军官担任。政治干部学校的教育宗旨是适应战时需要，实施政治训练，培养抗日救亡干部，增强抗战力量。政治干部学校设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课程，以政治课程为主。政治课程有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教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队中政治工作、民众动员、中日问题、国际时事等；军事课程有游击战术、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防空防毒常识、战地救护等。学员还可根据自愿，选学日语，以便在战争中进行敌军工作。

学校在聊城、临清、菏泽、寿张等地同时招生，男女兼收。聊城的入学考试是在聊城城内司马街原山东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现新华广场）举行的。学员大部分是青年学生，还有为数很少的教员、旧官吏（如做过堂邑县公安局局长的徐某）、商人（如临清的金增光）农民子弟、地主官僚子弟（如原籍馆陶县的旧军阀王占元的外甥焦某等）。由于学员文化程度高低悬殊，所以入学考试主要是考作文和口试；口试时多是了解考生个人和家庭情况、报考目的，以及对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等。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争取一切抗日力量的原则，一般的报名者均可录取。

学校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亲自讲课，另有专职教员和兼职教员，教员通称“教官”。“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教官是任夷（任仲夷）、巩固；“军队中政治工作”教官是刘

子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官是张霖之；“民众动员论”教官由管大同、成润、许法兼任；“时事政治”由莫循（张昭训兼课，有时请学校领导讲国际国内形势；“游击战术”由红军老干部袁仲贤、胡超仑主讲；周子明、何克讲“中日问题”。教材由本科教官编写，由学校免费发给学员。每天上午两堂“学科”，每堂两小时；“术科”除早操、课间操外，每天下午军事训练两小时，学习步兵操典，进行制式教练——立正、稍息、开步走、拔慢步和刺枪等。课堂教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和启发诱导，教师不仅传授知识，还要指导实践。因为学员毕业后即投身抗日战场，所以一切教材、教法都是为此目的服务。每种课程进行一段还要考试，不论口试、笔试，均着重于让学员回答“怎么去做”的问题。为了使学员不仅有较高的思想理论认识水平，还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有时组织学员参加战地服务，到前线进行宣传、救护工作；有时组织学生深入农村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有时组织野营和夜间紧急集合等战斗演习。教学方式多种多样，灵活生动。

由于师生有着共同的理想，大家都懂得，今天是课堂上的师生，明天是战壕里的战友，因此能紧密地打成一片。教官们满怀热情，为培养抗战新生力量尽职尽责，紧密结合形势，深入浅出地讲解，教得生动活泼；学员学了就用，学得深刻实际。学校还经常请抗日军政干部作报告。范筑先将军多次来校讲话；鲁西北党政军领导干部张霖之、红军老干部王幼平、袁仲贤、胡超仑除授课外，还经常作形势报告；朱穆之和莘县县政府的县长、共产党员吕世隆等都到校讲过话。陪同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到敌后参观考察的刘白羽、欧阳山及汪洋等到达聊城时都曾来校参观，并对500余名师生讲话和解答学员提出的

问题；在热烈掌声中，欧阳山等还给大家唱了《游击队员歌》。学校领导抓紧时机向学员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给全校师生以很大鼓舞，深受师生的欢迎。

学校的课外活动也是丰富多采的。每个中队设救亡室，它是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中队每月出刊壁报一期，有漫画和诗歌、速写、散文、评论、报道文学等短小精悍的文章。每次出刊都围满了观众。开始用二或三张白粉连纸写后张贴在墙上，以后改用薄磅纸钉在墙上，在外出宣传时还带着用作宣传材料。每天紧张的学习之后，校园里就立刻沸腾起来了。上课、出操完毕，即使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响亮的歌声也会充满了校园。学校还安排每周一两个下午时间举行集会，由师生表演文娱节目或做集体游戏。这时，校长、教务长、训育长、教官与学员之间没有师生之分，大家一起在操场围起个半圆形席地而坐，表演的节目有合唱、清唱、吹奏、独幕剧等等。齐燕铭教务长的昆曲，临清学员田德孝（田园）和陈书浩的京剧捉放曹，很受欢迎。还有一个姓万的同学擅长吹箫，能以嘴和鼻孔一齐吹，发出二重音，大家也很赞赏。《救中国》这个歌集合队伍时必唱，齐唱、男女二重唱和四部轮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大刀进行曲》唱起来热烈激昂，唱时大家满怀对日寇的深仇大恨，表达了每个人愤怒的心声。“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救亡进行曲》经常是在队伍行进中和着步伐的节拍齐唱的。男女学员最爱唱的一支歌要数《流亡三部曲》了，唱时如泣如诉，慷慨悲壮，置身于敌寇入侵的现实，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唱歌。大家为国土沦丧而悲愤，决心学好本领上战场。即使是就餐，也有歌唱，叫《吃饭歌》，是在吃饭前唱的，大意是：这些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应当为民出

力，努力学习，奋勇杀敌，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在“杀”的口号声中解散队伍，再到饭厅就餐。在全校集合时，每个队都是歌唱队，又是啦啦队，你拉我唱，我拉你唱，好不热闹。

在学校里，领导和被领导、教师和学生，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他们情同骨肉，亲如手足，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充满了抗战到底、战胜日寇的豪情壮志。他们有严密的组织生活，每周开一次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交流思想认识，学习生活紧张而热烈。在学校里约有十分之一是女学员，男女学员在一起学习、交谈、唱歌和游戏。学习结束要毕业了，学员们多么不愿离开热情教育他们的学校和师长啊！毕业典礼大会上学校发表的《告同学书》，热情洋溢，扣人心弦，学员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师生们情不自禁高唱《毕业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来担承”已成为全校师生的共同誓言。他们就要放下书本，拿起刀枪，奔赴抗日的战场！

学校第四期招生130人，于1938年11月5日开学，但是11月15日日寇便侵占了聊城，全体师生遵照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的命令安全撤出，转移到冠县、馆陶一带，后又随军转移到黄河南活动。

从复旦到山东师大

章 益

我在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期间，从上海分配到位于济南市的山东师范学院（现改为山东师范大学）任教。记得当时有一位上海市的秘书长问我有何意见，我表示绝对服从组织上的分配，并且乐意来山东。那年2月到济南，虽在冰天雪地的季节，但一到师院报到，立即受到院领导的热情接待，顿时感到温暖如春。这样定居下来一直到今天，转瞬已30余年了。回顾我大半生中，在安徽滁县我的故乡前后只住过十来年，在上海求学到担任教职，前后也不过20多年（这两地住的时间较长，还在别处短期住过不必细算），独有在济南连续住了30年以上。在我的感情上，济南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能作为山东省的一个公民，是感到非常忻快的。

抗日战争以前，我曾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十余年，1943年到1949年解放前夕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职务。那个时期，大学行政工作有许多棘手之处，是今天青年人难以想象的。我任职的前半期，抗战尚在进行，学校当然也经历了千辛万苦，但最困难的还是抗战胜利复旦从四川重庆迁回上海后到解放前夕这一段时间。那时蒋政权撕毁旧政协的协议，发动了内战，对高等学校实行严厉的统治，对进步师生进行迫害。复旦大学因有革命的传统，更受到反动派的疾视。抗战以前，复旦师生要求武装抗日，触怒了蒋政权，蒋政权曾一度阴谋封闭复旦。当时主

持正义、提倡爱国的老校长李登辉博士被迫离职退休。只因有几位老校友——于右任、邵力子、叶楚傖从中斡旋，才把学校维持下来。我以学校为重，只好委曲求全，和复旦的几位骨干分子加入了国民党，想借以缓和气氛。

我担任校长职务期间，致力于延聘名流学者来校任教，一时名教授云集于复旦，校内学术风气浓厚。

抗战刚一胜利，我就赶回上海，费了不少气力才将占据上海江湾复旦原校址的国民党军队撵走，将学校从四川迁回原址。1947年以后，反动政权的压力日益加剧，我那时的紧急任务就是一面维持学校的存在，一面维护进步师生的安全。应该说，我那时对于马列主义是一无所知的，也丝毫没有阶级斗争的观念。我所奉行的就是复旦校歌歌词中的八个字：“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若把那时的我归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一类，我想是恰当的。

上面说的两项任务之间是有矛盾的：为了维持学校就不得不对国民党政权作有限度的妥协，为了保护师生则不得不进行斗争。我那时常用一句话对付国民党当局：“学校秩序由我负责，请你们不要干涉！”

那时上海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及三青团对学校都实行严密的监视，市政府规定各大专院校定期到市府汇报校内情况。学生中也有不少三青团分子，时常同进步同学发生冲突。为了不給国民党当局以粗暴干涉的借口，在同学们为了反对美国扶持日本、抗议沈崇受侮、抗议浙大于子三同学惨遭杀害，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而准备举行游行示威时，我曾劝导同学们不要到校外去。这似乎一反我当学生和当教师时的大胆作风，今天回想起来，不免内愧。但反

动当局要求解聘民主教授，逮捕进步同学，从学术独立的立场出发，我是不能忍受的。1947年国民党教育部密令解聘民主教授，我以辞去校长职务相抵制，国民党教育部未能得逞。同年，上海国民党当局在全市高等学校进行了一次大逮捕，复旦被捕同学特多，教授愤而罢教，我表示支持。校内立即有人向南京密报，国民党教育部以长途电话通知我去南京，说是总裁（即蒋介石）召见，意将给我处分。我到南京先到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改口说传话传错了，是他请我去谈谈，不是总裁召见。这中间想必有人献策，要当局不要操之过急，这才未追究下去。除国民党当局从上面施加压力以外，复旦校内学生中三青团分子气焰也甚嚣张。1948年，有一次我从上海市国民党当局手中保出三名同学，一同回校时，受到群集在校园内的众多同学的热烈欢迎。这时三青团分子20多人拥进我的办公室，向我大哭大闹，说是下了他们的面子。这天晚间同学们召开大会，请被捕释出的同学报告被捕及释放经过，散会时遭到埋伏在校门外边暗处的反动分子的袭击，多人受伤。我得到报告，立即会同训导长何德鹤教授赶往现场（这时期，学校的主要干部教务长已由三青团头头担任，总务长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勾搭紧密，只何一人和我同心，以学校为重）。此时闹事之徒已作鸟兽散，只留下受伤同学。何教授将重伤者送往医院，轻伤者送回宿舍。我亲自查看附近行凶的迹象，查到校门对面一家小店内，一个三青团骨干分子尚藏身其中。我向他盘问，他言语支吾；我看他有打人嫌疑，就交给警察带往派出所侦询（殴人事件发生时已有警察到场，但袖手旁观，不加制止）。岂知派出所予以纵容，让他通宵打电话到我宿舍寻闹，次日清晨就把他放了。

这年国民党教育部又派参事但××到上海，声言要改组复旦，后见我得到校内外的支持，未能下手。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又进行一次大逮捕，复旦周谷城教授被捕。我登上拘他的卡车，同他寸步不离。被带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后，我向军官们交涉，从上午直到下午4时才将周保出。

南京教育部派总务司长贺××来沪，口传密令要我迁校，我拒不执行。此时我已受到校内几位进步教师的启发，下决心保全学校，迎接解放。不久朱家骅下台，换上杭立武当教育部长。杭是我的小同乡，自幼相识。他力劝我离沪，并向南京行政院推荐我当教育部次长，行政院已通过，我婉言辞谢。我这时已同交大校长王之卓、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上海医学院院长朱恒璧、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有了默契。我们五人密商，决定各自尽力保护学校，以便归还人民。我们设法将杭立武敷衍过去，杭去广州后，又来电催促我们离沪，我们仍设法推托拖延。

汤恩伯这时坐镇上海，有一次召集各大专院校负责人汇报各校情况，我只说复旦同学热心养猪种菜，改善伙食，以此搪塞。邻座某校代表拆我壁脚，说他的学校本来平静，但有外校（暗指复旦）学生到他的学校煽动。市党部主委方某说我有难言之隐，我佯作不闻，顾而言他，混了过去。幸上海迅速解放，我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纠缠。

解放后，我分配到山东，顿觉换了一个天地，空气澄清，生活安定。在党的领导下，教育有了明确的方针，国家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持文教事业的发展。教育事业发展甚快，和昔时情况不可同日而语。我久已厌倦行政工作（就我旧时的经历而言），

只想安心教学和读书，今天果真如愿以偿了。

我来山师，原分配任外文系教授，当时田佩之院长发现我略知心理学，就让我转到教育系担任心理学课程。任教以来得到学校领导、系内同志和同学们的支持，并常和系内青年教师互相观摩切磋，其乐无穷。眼见当年的青年同志蔚然成长，今天已成为骨干师资，更促使我倍加奋勉。

1954年我受中国心理学会的委托在济南筹设分会，首先成立了心理研究小组，这是今天人才济济的山东心理学会的前身或萌芽。那年我还参加了山东科联组织的巴甫洛夫学说报告会，分给我的讲题是阐述巴氏学说对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影响。在参加此项学术活动时，我得有机会认识了山东医学院的张汇泉、张子圣、高学勤、李缵文、赵常林诸位教授，这是我生平一件乐事。那时山医还有一位沈霁春教授，他是我在上海复旦附中教英文时班上的一位杰出的同学。他早年就只身进入解放区参加革命，这次在济南久别重逢，真是喜出望外。我也应山东科普之邀作过几次通俗讲话，这促成我编写了一本心理学通俗读物——《什么是人的心理》，还写了一篇《做好准备，向科学进军》的文章。

我素来爱好外文，外文书籍常不释手，曾利用寒暑假假期译出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上、中、下三集）、司各特的《艾凡赫》（与刘尊棋合译）及《中洛辛郡的心脏》等文学作品，又曾辑译《新行为主义学习论》一本心理学论著。

1962年教育系暂停招生，让原有的三年级一班同学改习英文。因外文系同学众多、教学任务甚重，不能承受此班教学任务，教育系领导决定将教授此班英文的任务交给我，并要求于两年期间培养出中等学校合格的英语教师。此班同学大都从英

文₁字母学起。我开始工作即获得同学们的积极配合，学习进展取得前所未有的顺利。1964年，该班同学毕业后分发到省内各中等学校教英语，大多数成为骨干教师，有的被选为教研组长，有的成为教导主任，还有的被分配到省外₂外事处工作。其中有几位同学分到了本校外语系和师范专科学校，教了若干年英语以后又转教心理学。这是我从事教学工作以来最给我以鼓舞的一次大丰收。此后我也曾应本校外文系之邀，协助该系青年教师进修，承担该系主办的翻译人员短训班的教学工作。

1958年，我曾被下放到农村担任农业中学教师，包教文、史、数、理各课。我一向生长在城市之中，从未接触农村生活。这是第一次和农村青年朝夕相处，深深感受到农村青年的淳朴气质。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我受到了“反馈”，也激发了我的积极性。在农村时间虽仅半年，但留下深刻印象，至今回忆，犹有余味。

我于1954年第一次被特邀参加山东省政协，嗣后连任省政协第一、二、三、四、五届常委。那时我耳朵未聋，很爱发言。又感于中国共产党对我不咎既往，一视同仁，我也愿意就我所见所闻，对当前种种问题，赤忱地发表内心的意见，以供领导的采择。我新提供的刍荛之见，都出于报答党对我的知遇之恩。

和澄之同志共事的岁月

陶 钝

我于1939年4月，脱离在家乡诸城县拉起来的游击队，到沂蒙根据地联系山东各方面抗日领导部门。东里店这个镇居然象一座小城市，商店林立，生意兴隆。住在小店一夜，第二天早饭后，我到挂着鲁南总动员委员会的牌子的大门里去找李澄之。一进屋门，就迎着了他。他紧握着我的手说：“说着曹操，曹操就到，怎么这么巧？”一群人围起我来寒暄，一齐大笑。其中有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发苍苍的范明枢先生。我特意到他面前握手问道：“范先生还认得我吗？”范老颤巍巍地说：“咱们在一间牢房里受过罪，怎么会忘了！”（指1932年在济南教书被捕）。

我向澄之同志询问了这里的情况，他说：“不用谈了，一时也谈不清楚。”他说他被压上第四联合中学校长的职务已经半年了。高中的国文教员，至今没有请到。“这不是教务长彭畏三兄将我的军，来要高中教员了吗？正在议论你，你就一步闯进来了，所以大家高兴。”我和彭畏三在济南教书时就认识了。他特意又上来打招呼。我说要去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听候分派。他们说：办事处主任赵笃生不在（他原是济南育英中学的教员），我们早就和他谈了，要他设法约你（八路军独立营发展到诸城，我沿着他们的交通线来的），我们告知他你已经来了就是了。

四联中住在离东里店20里的蒙阴县坡里镇，我到校以后，包教了文科的所有功课。上班和20多位男女同学一起读书，下班和他们一起游玩。这生活过了不到两月，日寇的飞机就轰炸东里店，把东里店炸成一片废墟。澄之同志于3小时以后来到了四联中，他的样子不象是从火海里逃出来的，并不显得狼狈，只是没带出一点生活用品来。他的到来，使大家放心了，还以为他不是从东里店来的呢。当时，幸而范老坐上独轮车，挂着抗日画，到集市上做宣传，早已离开了东里店，住在了四联中。

四联中的教职员，一致的意见是把总动员委员会的牌子挂着，另组织鲁南国民抗敌协会。李澄之、梁竹航和我，这三个1925年参加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的人，把当年国共合作的旧事重提。澄之同志提出，今天的合作不同于第一次合作，他的意见的要点是：那时的合作，国民党北伐步步胜利，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给国民党注入了新鲜血液。今天不同了，共产党不仅有坚强的党中央，有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锻炼出来的军队，还有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我们在山东就要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只要同意这主张的，我们就可以走在一起。澄之同志的话，也就是我们想说还没说出来的话。

四联中因目标不小而做疏散。我们被几位当地学生邀请，住在岱固前面的后阴子村避敌。这里是山深人少的地方。澄之同志拄着一条木棍到处探望分散的教员，也到我们这里来，传达他筹建鲁南国民抗敌协会的情况。并说山东的党很赞成成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团体，团结那些对共产党还有一定疑虑、共产党也考虑他们的阶级成份的上层人士，还有知识分子。菜

茌、新泰、沂水、蒙阴的爱国人士、失业青年都要求参加。东至日照，西至泰安也有人来投。他们说，他们的家长知道鲁南国民抗敌协会是一批以李澄之为首在都市里办过教育的人士组织的。家长对他们的子女说：“去吧，跟着他们，家里放心。早晚汉奸来了，免不了全家离散。”

澄之同志生活非常简朴。他在中学时就是篮球选手。在师大曾代表中国篮球队，出席过远东运动会。当时正当四十岁，身体强壮，从不择食，有什么吃什么，吃得很香甜；给他要点细粮，他就送给本会的病号吃。办公室向八路军后勤部给他要了一匹马，他只驮上办公用具和衣被，自己不骑，给病号、女同志以及身体不舒适的人骑，自己步行。他穿着一双铲鞋（沂蒙山区的爬山鞋），是千针底（一双鞋底纳一千针）和密针纳的鞋帮。这种鞋纳好之后，盛上水滴水不漏。他爱吸旱烟，不吸纸烟；大烟斗，布烟包，一人喷吐，满屋烟云。

他与人谈话时，和颜悦色，慢声慢气，这态度不是勉强的，是自然的，很少看见他发火，也很少有人看见他着急。找他商量事情，无论呆多久，他依然耐心听，面不辞人。

照顾他的有一个警卫员和一个“小鬼”；开会出外警卫员跟着，“小鬼”留家看守。他们都是自愿自觉的为他服务。有几个晚上，澄之出去开会，都是十一点回来，为他服务的“小鬼”煮了两个鸡蛋，包在毛巾里。澄之回来发现了，责备他不应当向伙房要夜餐。“小鬼”解释说不是向伙房要的。“那么哪里来的？”小鬼说：“我自己买的，开会回来晚了，吃点东西好。”澄之感动了，不吃不好，吃也不安，他拿起鸡蛋来说：“来，咱一人吃一个。”小鬼接受了。他又嘱咐“小鬼”不要再弄这个。以后换成了“小鬼”自己在烤火盆上烤白薯，

还是毛巾包着，热热乎乎地很可口。

他这种待人厚道的作风，是长期养成的。抗协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有纠纷，只要他说几句话就可以解决，谁也不愿使他为难。

老根据地里减租减息之后，可团结的上层人士少了，知识分子又多数被政府的文教部门吸收了去，连抗协会员也在内。1942年以后，抗协只留下个名字，人员都各有工作，不能设立机关了，事实上已完成它当时的任务。澄之本人被邀进政权机关做负责人，我也安排作文艺工作，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伞兵

钟 汉 勋

第一部分 国民党伞兵的编制和装备

一、国民党第一个伞兵团

1944年4月8日，国民党第五集团军司令杜聿明在其集团军所属部队内，选调了一批比较年轻精干的军官和战斗力强的连队，在昆明北郊岗头村组成了第一个伞兵团。以该集团军少将参谋主任李汉萍（黄埔六期，湖南人）为伞兵团团长。简立上校（中央军校八期）为副团长。下属三个营，一个特务连。第一营中校营长井庆爽（中央军校十期，山东人），第二营中校营长姜键（中央军校十一期，吉林人），第三营中校营长李海平（中央军校十期，广东人）。每营下属4个连（3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每连4个排（3个步兵排，1个重机枪排），每排4个班，每班12人。当时都是美式步兵装备，没有伞兵器材。因此，这个伞兵团虽成立一年，实际进行的是一般步兵训练。

1945年春，由于太平洋战局的发展及中国抗战的反攻形势，美军顾问团应杜聿明的要求，派出以考克斯中校为首的美军伞兵顾问团进驻岗头村，全面负责国民党伞兵的装备和训练。由美军驻昆明的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少将）将伞兵使用的武器、弹药、被服、给养、装具及降落伞等器材，从美国（一部分从印度美军兵站）赶运昆明，分批装备伞兵。

二、陆军突击总队

为适应伞兵以队为空降单位能独立作战的需要，于是将原有的伞兵团改编为陆军突击总队（对外番号为鸿翔部队）隶属陆军总司令部，归五集团军领导。任命原伞兵团少将团长李汉萍为陆军突击总队司令。不久，李汉萍调任五军邱清泉的参谋长，由马师恭少将（黄埔一期，陕西人）接任司令，由张绪滋少将（黄埔七期，湖北人）为副司令，乔九龄上校（黄埔四期，陕西人）为参谋长。乔九龄调走后，由徐炎武少将（黄埔六期，江苏人）接任，李宜年上校（黄埔六期，朝鲜人）任参谋处主任。以后李宜年调任伞训处主任，由刘农峻上校（中央军校十一期，湖南人）接任参谋处主任，原伞兵团一、二、三营营长，改任伞兵第一、二、三队队长。

陆军突击总队下辖20个伞兵队和一个特务队。以后又增编补充第一、二大队。其中除伞兵十九、二十队为搜索队（担负侦察、情报任务，每队下辖3个分队，每分队3个组，每组官兵12人，全队官兵136人左右）外，其余各伞兵队下设6个分队（包括3个步兵分队及迫击炮、重机枪、工兵各1个分队）。每个步兵、工兵分队下设3个组，迫击炮、重机枪分队两个组，全伞兵队人数198人左右（不包括炊事班9人）。

第一批装备起来首先训练的为伞兵一、二、三、四队，第二批为伞兵六、七、八、九、十队，以后装备和训练的为伞兵五队及伞兵十一——二十队。第一、二批装备起来的伞兵队，于1945年5月底训练完毕，其余各伞兵队除部分官兵空中跳伞未完成外，其余训练科目于7月全部完成，待命出发作战。

在陆军突击总队司令部，除有以美军考克斯中校为首的顾问小组外，每个伞兵队中校队长为中国军官，队附由美军一名少校（个别上尉）担任。上尉分队长为中国军官，分队附由美军一名上尉担任。各组中尉组长为中国军官，副组长由美军一名、少尉担任。有些伞兵队还配有美军的技术上士、情报上士和通讯上士。在每个伞兵队，都配有翻译官1、2名。个别分队也配有翻译官一人。这些翻译官是由国防部外事局译员训练班派来的，在抗战胜利后，美军顾问团全部撤走，还留有少数翻译官，培养成为伞兵部队的跳伞教官或摺伞军官。

陆军突击总队下属伞兵20个队队长名单：

一队中校队长井庆爽（中央军校十期，山东人）

二队中校队长姜健（中央军校十一期，吉林人）

三队中校队长李海平（中央军校十期，广东人），李调走后，由蔡家良（中央军校十四期）接任中校队长。

四队中校队长泮荣辉（中央军校十三期，江苏人）

五队中校队长段超群（中央军校十四期，安徽人），段调走后，由鲍承愈（中央军校十三期，江苏人）接任中校队长。

六队中校队长韩承璋（中央军校十二期，辽宁人）

七队中校队长蔡振武（中央军校十五期，湖北人）

八队中校队长屈毓忠（中央军校十四期，江苏人）

九队中校队长殷维军（中央军校十一期，山东人）

十队中校队长何尚殊（中央军校十期，广东人）

十一队中校队长张锦明（中央军校十二期，陕西人）

十二队中校队长谢慰然（中央军校十二期，广东人）

十三队中校队长杨鹤立（中央军校十三期，湖南人）

十四队少校队长李华麟（中央军校十四期，河北人）

十五队中校队长杨春柏（中央军校十一期，湖南人）
十六队中校队长游乐智（中央军校十二期，湖北人）
十七队中校队长周益群（中央军校十二期，广东人）
十八队少校队长赖晋智（中央军校十四期，广西人）
十九队中校队长何龙庭（中央军校十三期，江西萍乡人），
原中校队长马新灿（中央军校十四期，浙江人）。

二十队少校队长李贵田（中央军校十五期，江苏人），原
少校队长陈威（中央军校十五期，广东人）。

各伞兵队的人员编制：

伞兵队队部：中校队长1，少校队附1，中、少尉通讯军官
1，中尉军需官1，准尉司务长1，部队上士1，技术上士1，军械
上士1，文书上士1，军需上士1，传令兵3，司号兵1，炊事班
9人，共23人。伞兵队下属6个分队（3个步兵分队及迫击炮、重
机枪、工兵各1个分队），全队人数198人左右（不包括炊事班）。

步兵分队（即伞兵一、二、三分队）分队长（上尉）1，
技术上士1，传令兵1。分队下设3个组，每组中、少尉正副
组长各1，士兵9（分3个战斗组，每组3人），全分队共36
人。

迫击炮分队、重机枪分队比步兵分队少1个组（11人），
其余人员编制相同，全分队25人。

工兵分队装备不同，其人员编制与步兵分队相同，全分队
为36人。

各伞兵队的武器装备：

各个伞兵队配有美式越野中吉普车1辆，美式中远距离手
摇式六九四电台1部（通话距离300公里以上）。在独立空降
作战时，队长、分队长各配有步话机1部（有效通话距离为5

公里半径)。

伞兵十九、二十两个队为搜索队，每队另配有二、三轮摩托车20辆及橡皮舟等器材。

伞兵队下属的每个步分兵队，配有40毫米火箭筒3具(每组1具)，火焰喷射器1具。每个组配有美式手提轻机枪1挺，四五汤姆式冲锋枪3支，带瞄准镜狙击枪1支，美式步枪4支，卡宾枪2支。

每个伞兵队下属的炮兵分队配有60毫米迫击炮6门(每组3门，每炮射手1，弹药兵2)，重机枪分队配有30吋气冷式重机枪4挺(每组2挺，每挺枪正副射手各1，弹药兵2)。

每个伞兵队下属的工兵分队，配有扫雷器爆破筒、地雷、炸药、橡皮舟及轻便修建器材等。

凡伞兵队副组长以上军官，每人配有8倍望远镜1架，四五手枪1支，航空手表1块，分队长以上还配有军用图囊及红白手旗。炮兵、机枪分队的射手每人配卡宾枪1支，每个官兵都有指北针1个。

每个伞兵在空降作战时的全部装备：

头戴绿色防震钢盔(内垫船形帽)，脚穿带扣的短腰皮鞋(根据情况有时穿短腰帆布胶鞋)，身负背囊(内装薄军毯1条、换洗衣服1套、薄尼龙雨衣1件及罐头、食品等)，肩挂武器，身背两顶降落伞(背后是主伞，胸前是副伞)，手雷4枚，折叠式小铁锹1把，伞兵刀1把，小电筒1个，军用水壶(连饭盒)1只，救急包1个(内装消炎、消毒、止血、止痛的高级针药及包扎材料)，每人带足一个基数弹药(配手枪的带手枪弹50发，其余伞兵带200发步枪弹)。因为伞兵空降敌后作战，弹药补充困难，全靠每个伞兵多带子弹来补充。队部

司号兵除军号外，还带联络手旗。

伞兵使用的降落伞，有人员降落伞和空投装备伞（包括装备筒）两种。人员降落伞有主伞和副伞。伞兵空降时如主伞不开，就立即拉开胸前副伞。在空降作战时，指挥官一般用白伞，其余伞兵用伪装的绿色花纹伞。武器装备用红色装备伞，弹药用黄色装备伞，空投电台及特殊重要器材，也有用花色伞的。这样在空降着陆后容易识别，便于寻找。当夜间或黄昏、拂晓天气黑暗时空降，各种装备伞都安装有同样颜色的灯光，供伞兵识别。

伞兵的服装：夏季着斜纹卡其布军便服，外罩防雨布茄克，冬季换罗斯福呢料衣服，外罩军大衣。平时军官带大沿帽，士兵戴船形帽，穿带扣短腰皮鞋，有时着帆布短腰胶鞋，扎美式带孔的宽腰帆布带（军官在帆布带上挂手枪），肩章是陆军特种兵军衔，领章为空军小飞机标志，臂章为降落伞标志并有鸿翔二字，胸章是跳伞证章（原规定士兵的胸章是陆军士兵符号，但都带跳伞章外出，很少有带士兵符号的）。平时伞兵军官随带手枪（士兵带伞兵刀）进出各种公共场所，这种特殊规定，对国民党其他任何部队，都是不允许的。

三、空军伞兵总队

抗战胜利后，由陆军总司令部隶属的陆军突击总队改编为空军伞兵总队，属空军总司令部建制。将原有20个伞兵队改编为4个大队，每个大队辖5个队。原补充第一第二大队合并为补充大队。组成人员如下：

司令部直属队有炮兵队、工兵队、通讯队、特务队。

参谋处：上校主任刘农峻。

参谋处一科——主管军官佐属人事及兵源，少校副科长张雯泽（中央军校十四期，河北人）。

参谋处二科——主管军事情报及防谍工作，少校副科长陈威（中央军校十五期，广东人），下设情报队，上尉参谋兼情报队长陈焕曾。

参谋处三科——主管作战、训练，中校科长刘祝多（中央军校十期，陕西人）

少校参谋有李盛龙（中央军校十四期，广东人），孙家驹（中央军校十六期，河北人），刘盛亨（中央军校十七期，湖南人）。

参谋处四科——主管后勤、通讯。

少校参谋有杜建宇（中央军校十三期，河北人），陈英（中央军校十三期，浙江人）。

秘书处：中校主任宋前佑（大学生，湖南人）

新闻处：（后改为政治部）少将主任段××

副官处：上校主任张信卿

运输科（科长少校） 辖辎重队

油料科（科长少校）

副官（少校1人、上尉1人）

军械处：中校主任陈子岐

军械科（科长少校）

修理科（科长少校）

军需处：上校主任吴子正

粮秣科（科长少校）

被服科（科长少校）

会计科（科长少校）

出纳（又称金柜）上尉

伞训处：上校主任李宜年

跳伞科少校科长罗宗冠（中央军校十五期，广东人）

摺伞科少校科长夏锦涛（中央军校十五期，广西人）

仓库主任（上尉）

军医处：主任（上校）下辖卫生队

军法处：中校主任宋锡纯（湖南人）

军法官2人（少校或上尉）

检查官、书记官2人（少校或上尉）

伞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陈兆璧（中央军校，八期）

中校大队附井庆爽（中央军校十期）辖伞兵第一——五队（当时伞兵总队没有副大队长编制，一律称大队附，实际执行副大队长职权）

伞兵第二大队：上校大队长张信卿（中央军校八期）

中校大队附姜健（中央军校十一期）辖伞兵六——十队

伞兵第三大队：上校大队长郭志持（中央军校九期）

中校大队附李海平（中央军校十期）辖伞兵第十一——十五队

伞兵第四大队：上校大队长刘拯（中央军校八期）

上校大队附过受卿（中央军校八期）辖伞兵第十六——二十队

伞兵补充大队：上校大队长赵位靖（干训团，四川人）

中校大队附钟汉勋（中央军校十三期，湖南人）

一队中校队长鲍承愈（中央军校十三期，江苏人），以后鲍调任伞兵五队队长，由张光汤接任少校队长）。

二队少校队长李贵元（中央军校十四期，河南人）

三队少校队长张道德（中央军校十四期，四川人）

四队少校队长李敬宾（中央军校十四期，山东人），以后李调任伞兵十六队队长，由队附周廷琦接任队长（中央军校十六期，湖北人）。

四、空军伞兵司令部

1947年5月，空军伞兵总队及配属部队国民党坦克一团（随伞兵行动1个营，团长蒋纬国中校）、炮兵团（随伞兵行动2个营）、工兵营、人力输送团（包含担架兵及弹药兵）、3个汽车团、1个空军支援大队（侦察机2架、战斗机8架），组成第三快速纵队，在津浦线，陇海线和鲁西南一带机动作战。至1948年3月，该部从河南商邱回到江苏黄口整编。将空军伞兵总队番号改为空军伞兵司令部。其司令部人员除个别调整外，编制未动。原伞兵司令马师恭在改编后调任国民党八十八军军长去芜湖，由副司令张绪滋升任司令，参谋长徐炎武接任副司令，新调戴杰夫（黄埔七期）接任少将参谋长。其伞兵司令部直属队扩大为5个直属营（即搜索营、炮兵营、工兵营、通讯营、辎重营），将4个伞兵大队及补充大队改编为伞兵第一、二、三团。伞兵一团由原伞兵一、二大队及补充大队的一、二队组成，伞兵二团由原伞兵三、四大队及补

充大队的三、四队组成。伞兵三团是新建团，由司令部及各伞兵大队抽调组长以上军官及部分老军士组成骨干到湖南、湖北、四川、浙江等地招考新兵（新兵条件规定高中毕业或部分成绩好的初中毕业生）。至1948年8月，伞兵各团编制满额，在南京岔路口训练。

改编后的伞兵团编制为3个伞兵营，5个团直属连（即团部连、迫炮连、通讯连、运输连、卫生连）每个伞兵营辖5个连、每连3个排，每排4个班，每班12人，每连编制人数170人左右（营部连编制4个排，全连人数200人）。

伞兵司令部直属营营长名单：

搜索营中校营长游乐智（中央军校十二期）

炮兵营中校营长杨××（中央军校十二期）

工兵营中校营长殷维军（中央军校十一期）

通讯营少校营长范紫正（中央军校十六期）

辎重营少校营长金钦洵（机械化学学校毕业）

伞兵各团、营、连长名单：

伞兵一团上校团长张信卿（中央军校八期）

中校副团长井庆爽（中央军校十期），以后张信卿调走，由井庆爽升任团长。

中校团附张景才（中央军校十五期）

一营中校营长韩承璋（中央军校十二期）

二营中校营长潘荣辉（中央军校十三期）

三营中校营长鲍承愈（中央军校十三期）

伞兵二团上校团长郭志持（中央军校九期）

中校副团长李海平（中央军校十期）

中校团附梅济南（中央军校十四期）

一营中校营长周益群（中央军校十二期）

二营中校营长张光汤（中央军校十四期）

三营中校营长赖晋智（中央军校十四期）

伞兵三团上校团长刘农峻（中央军校十一期）

中校副团长姜健（中央军校十一期）

中校团附李贵田（中央军校十五期）

团部主要军官：少校作战室主任胡爱华（湖南人），少校军需主任马继衡（江苏人），上尉副官姚家钺（湖南人），中尉书记官黄牧龙（湖南人），还有少校军医、少校军械官、中校政工室主任等人。

团部连上尉连长刘锦世（湖南人）

通讯连少校连长胡爱华（胡调作战室主任后，由上尉副连长姚千亿接任连长。

迫击炮连少校连长李济中

卫生连少校连长李景芳

一营中校营长钟汉勋（中央军校十三期，湖南人）

少校副营长李敬宾（中央军校十四期，山东人），以后李敬宾调伞兵三团三营中校营长，由熊弼（中央军校十六期，湖北人）接任少校副营长。

上尉营附杨绳祖（中央军校十七期，广东人），以后杨绳祖调营部连连长，由植德英接任上尉营附。

营部连上尉连长杨绳祖

中尉副连长郭文杰（湖南人），郭文杰起义后任第一连连长。

一连少校连长孙家驹（中央军校十六期，河北人），孙调二营副营长后，由上尉副连长马尊三（中央军校十七期，湖南

人）接任连长。

二连少校连长刘盛亨（中央军校十七期，湖南人），以后刘盛亨调八十八军，由上尉副连长曾用武（中央军校十八期，湖南人）接任连长。

三连上尉连长宁寄南（中央军校十六期，辽宁人）

中尉副连长刘勋（湖南人）

机枪连上尉连长章伟成（中央军校十七期，浙江人）

上尉副连长邓敬贵（中央军校十七期，湖南人）

二营中校营长杨鹤立（中央军校十三期，湖南人）

少校副营长熊弼。熊调一营后，由孙家驹接任少校副营长。

上尉营附杜仲明（中央军校十七期）

营部连上尉连长杨坤华（河南人）

四连少校连长陈奇夫（中央军校十七期，四川人）

中尉副连长徐若天

五连上尉连长陆志新（中央军校十七期）

上尉副连长陈寿筌（中央军校十七期）

六连上尉连长蒋能燮（中央军校十六期）

机枪连上尉连长范开智（中央军校十七期）

三营少校营长李华麟（中央军校十四期，河北人），以后李华麟调走，由李敬宾接任中校营长。

少校副营长周廷琦（中央军校十六期，湖北人）

上尉营附李国平（以后调营部连长）

七连上尉连长黄伟光（中央军校十六期，广东人）

上尉副连长钱浩然（中央军校十七期，浙江人）

八连上尉连长赵剑星（内蒙人）

上尉副连长方春华（中央军校十六期，浙江人）

九连少校连长王建庭（干训班，山东人）

机枪连少校连长唐宗善（干训班，河北人）

1949年3月，空军伞兵司令部直属部队及所属伞兵一团、二团分两个梯队由上海撤至福州，以后又海运台湾。

伞兵三团在海运福州途中，转向北开到连云港起义。

第二部分 国民党伞兵的训练

1945年3月开始，由驻昆明岗头村的美军伞兵顾问团，负责陆军突击总队的全部训练工作，由美军顾问考克斯中校具体领导，分为地面训练和跳伞、战术训练。地面训练由美军顾问白里德上尉具体负责，在昆明东南宜良地区进行，训练时间5—6周；跳伞训练在巫家坝飞机场进行；战术训练在昆明岗头村附近地区进行。训练时间3—4周。先装备起来的伞兵第一至四队及第六至十队9个队，到1945年5月底已全部训练完毕。至7月底，伞兵五队及伞兵第十一至二十队共11个队，除部分官兵空中跳伞未完成外，其余科目也训练完毕，待命出发作战。

在宜良的地面训练，主要是兵器射击、刺杀、投弹、爆破、侦察（抓俘虏）格斗、土工作业以及方向识别，气象常识和单个班的利用地形地物，在敌火下运动和冲锋等动作。训练时间4—5周，对原有基础的技术兵，分别进行摩托、汽车驾驶、电台使用、扫雷动作等训练。在地面训练科目全部完成后，每个受训官兵，最后进行一次战场心理测验（又名敌火下运动，即实弹近战演习）。在防御阵地前，设置有100公尺长，50公尺宽，8至10道等距离屋顶铁丝网。并有迫击炮阵地及轻、重机枪的火力网。演习分队（通常为一个分队或一个组）利用地形荫蔽进入出发位置（挖有壕沟）。这时，防御部

队的迫击炮、火箭筒向预设目标射击，轻、重机枪及步枪一齐开火。演习分队在敌阵地前逐段投掷各种颜色的烟幕筒，利用剪掉的铁丝网缺口匍匐前进，通过一道道铁丝网，至敌阵地前，演习分队的火焰喷射器、火箭筒、轻、重机枪、冲锋枪猛烈射击，突然冲入敌防御阵地刺杀、格斗，向纵深火力追击，最后巩固阵地结束。

在岗头村的跳伞训练，分两段进行。首先熟练地面跳伞动作，在考核合格后再在巫家坝飞机场实施空中跳伞。规定每人连续8次飞机跳伞无事故（如中途有一次受伤而中断跳伞者，需从头计算连续跳伞次数）就发给跳伞证章，并享受跳伞津贴。当时的跳伞津贴，每人每月2万元（可兑换银元25块），高出士兵薪饷1—2倍。

在地面跳伞场的训练很严格，器械设备也比较完善。每个受训官兵先从单杠开始。按顺序：双杠、跳马、平台（分高、中、低三级，从低级开始、练习着陆姿势）、天桥（慢步、跑步通过、个别从天桥跳下沙坑）、空中飞跃（从高跳台上握住一根粗绳，飞至空中单手转向跳下沙坑）、连续飞环（树一排杆子或在树上栓着8—10个吊环，每人从第一个吊环开始飞到第二个吊环，一手放开第一吊环，一手接住第二个吊环，按上述动作，依次作完）、吊伞架（先练习背伞，而后坐在吊伞架上，练习伞在空中的方向操纵）、机门跳出（每人先在废飞机上坐好，按“预备”口令起立准备，检查伞并挂好钩，听到“跳”的口令，按离机动作迅速跳出机门着陆），最后一次是塔门跳出（在高30至35米的垂直跳台上按空中跳伞动作，根据口令依次从机门口跳出，靠滑车下降到达终点，解开降落伞背带着陆）。这个塔门跳出科目，很多官兵害怕。因为从垂直高度

看地面胆怯。规定不敢塔门跳出者，不准空中跳伞。

在地面跳伞场训练检查合格后，到巫家坝机场实施空中跳伞。当时部队主要训练强制开伞（又名挂钩跳伞），不训练开备份伞（只讲解示范开备份伞动作），也不训练自己摺伞（美军摺伞是由专门摺伞士兵担任），对伞兵只进行摺伞动作的示范讲解。其摺伞士兵摺完一顶伞签上摺伞者名字并铅封，在实施空中跳伞时，摺伞士兵要亲到现场，如跳伞者降落伞不开，由摺伞者负全责。

空中跳伞高度，一般为400公尺，如能见度低或其他原因可升到600公尺跳伞。由徒手跳伞到武装跳伞连续8次无事故者为合格，发给跳伞证章，並享受跳伞津贴。

在战术训练中，首先进行组、分队、伞兵队基本队形及利用各种地形（山地、街巷、森林、河流等）在敌火下的运动及近迫作业等基本战斗动作，随后进行组、分队、伞兵队的攻击、防御、侦察和步哨勤务，最后进行两次空降作战训练。第一次是在预设阵地上训练，预设阵地构筑有各种工事，布置有各种情况及假设敌。训练完毕，总结讲评。第二次进行新地区的空降作战演习。在接受空降作战任务后，伞兵全副战斗装备乘飞机到达空降地区，按地面联络讯号着陆集结，根据假设敌情况及地面各种障碍进行逐个处理，直到夺取阵地、巩固阵地的任务完成，藉以锻练各级指挥官及部队的作战应变能力。

军官队、军士队的训练

1945年6月，陆军突击总队的第一、二、八、九、十队5个队，分别空降衡阳、广东开平、广西丹竹机场作战取得胜利

利：7月，其余各伞兵队已全部完成训练，待命出发空降作战之际，司令部由参谋主任李宜年领导，抽调补充大队大队附钟汉勋，参一科副科长张雯泽、参三科参谋李盛龙、刘盛亨等人，负责系统整理美军顾问团对伞兵训练及空降作战指挥的材料。马师恭接任陆军突击总队司令后，对此极为重视。为使全总队军官能熟悉和巩固已学的各种美式武器装备的使用保养，和美军对伞兵跳伞训练和战术训练方法，以总结提高伞兵军官的作战指挥能力和训练水平，决定在昆明岗头村附近上庄开办军官队，轮训伞兵中尉组长以上军官（共办三期，每期两个月）。由伞兵司令马师恭兼任队长，补充大队附钟汉勋任队附，具体负责军官队日常管理、训练工作（包括训练计划，总结及课程安排）。另一队附由伞兵各大队长轮流担任（不驻队）。当时有伞兵一大队长陈兆璧、三大队长郭志持、四大队长刘拯分别兼任军官队一、二、三期的队附，具体负责军官教育、训练考查和军官考核工作。

军官队按受训人数编成3—4个区队，每区队3—4个分队，每分队12人。区队长由调训的中校队长或少校队附担任，分队长由调训的少校队附或上尉分队长担任。军官队的训练，分制式教练、兵器射击、跳伞、战术训练4个部分。

1.制式教练：包含美军的立正、稍息、转法、步法、方向队形变换及基本战斗队形等。其主要训练目的是统一动作。其训练时间较短。

2.兵器射击：包含伞兵队内各种美式武器的分解结合，使用保养和射击技术训练。其重点是火焰喷射器、火箭筒、轻重机枪、迫击炮、阻击枪的实弹射击，以及爆破器材、扫雷器及橡皮舟的使用等。

3.跳伞训练:主要解决伞兵军官熟练掌握各种地面跳伞器材的使用保养和地面跳伞动作的组织实施方法。在空中跳伞训练时,主要提高伞兵军官的组织指挥能力。另外还解决未享受跳伞津贴的部分军官完成空中跳伞课目。由原有连续空中跳伞8次无事故的合格规定改为4次合格。

4.战术训练:以伞兵队的攻击、防御、战场侦察、驻军警戒为主要训练内容。每个课目,都是在伞兵队长的指挥下,锻炼各分队,各组的战斗指挥和战斗行动。在训练计划全部完成后,进行一次伞兵队的空降作战演习(与美军顾问组织的相同),邀请司令、副司令、参谋长、参谋主任及伞兵大队长参观,宣告本期军官队的结束。

1946年春,空军伞兵总队由昆明迁往南京。到南京后,在岔路口营房继续开办军官队第四期除调训原伞兵队部分军官外,还有从无锡中训团第十七军官总队选调伞兵部队50名军官参加训练。由上校大队长陈兆璧任第四期军官队队长,大队附李海平为队附,训练结束,受训军官回原单位或新分配单位报到。

1946年8月开始,还办了两期军士队,调训各伞兵队中文化程度较高、军事技术好,有培养前途的老中士、上士及个别准尉,以培养成为准尉、少尉副组长一级军官,时间定为半年。第一期军士队中校队长钟汉勋,少校队附李敬宾(中央军校十四期,山东人),第一区队上尉区队长周廷琦(中央军校十六期,湖北人。以后升为少校),第二区队上尉区队长莫汝群(中央军校十六期,广西人),第三区队上尉区队长杨绳祖(中央军校十七期,广东人),每区队4个分队,每分队12人。分队长由受训军士中选任。司令马师恭副司令张绪滋对军士队要求很高,他们在开学典礼上说:“伞兵总队的新风气要由军

士队创立起来。管理训练要象中央军校一样严格受训，训军士毕业后要达到初级军官标准。”

军士队的训练科目和军官队一样，分制式教练、兵器射击、跳伞和战术训练四个部分。因训练时间较长，受训对象和要求不同，重点放在对单兵的技术、战术及班、排长对组织训练和作战指挥能力上。

1946年秋，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以及蒋纬国（蒋介石次子）等，在司令马师恭的陪同下，来岔路口视察了军士队的武器装备、内务卫生和训练，表示赞赏。

1946年10月10日，国民党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国庆”军事表演。演习指挥部由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领导，由蒋纬国少校、衣复恩中校（空运大队长兼蒋介石专机驾驶员）、钟汉勋（伞兵军士队中校队长）三人具体负责。蒋纬国负责检阅台的组织及演习场的保卫工作；衣复恩负责空降部队的飞机调动和指挥（运输机9架、侦察机2架、战斗机8架），钟汉勋担任演习部队指挥官。在检阅台上参加检阅的有蒋介石、宋美龄、于右任，国防部长何应钦、副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海、陆、空军总司令桂永清、顾祝同、周至柔及蒋经国、蒋纬国和在南京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南京市民围观者达十几万人。此次演习为一个伞兵队的实弹对抗演习。双方使用了重机枪、迫击炮、火箭炮、火焰喷射器等全部新式的美式武器。因是真枪实弹，故情况逼真，俨如置身战场。

1946年底，奉国防部命令由空军组织伞兵军士队在岔路口进行一次“实弹近战演习”（与美军的战场心理测验相似，但演习设施更加完善），有参谋总长陈诚，海、陆、空军总司令

桂永清、顾祝同、周至柔，以及蒋纬国和在南京的高级军事要员，还有大批报社、电台记者及其他人士参观。全部演习过程拍了电影。在此次演习中，由于假设敌不慎用火箭筒将高压电线打断，使防御阵地前的铁丝网通了电，有3名军士通过最后一道铁丝网时，当场触电死亡，还有3名军士电伤。因当时在演习场地施放烟幕很大，参观人员并未发现，等到演习结束来清理场地时才知道。

1947年夏，继续办了军士队第二期，因原军士队长钟汉勋调留美预备班学习，由伞兵第三大队大队附李海平中校接任军士队第二期队长。

留 美 预 备 班

1946年春，伞兵总队总司令部奉命选拔一批文化程度高（高中毕业以上）、英文好、有培养前途的军官，准备于1947年送美国空军学校深造（时间2—3年），因而成立了一个留美预备班（即外语班）。由李宜年上校任班主任，陈家懋负责教务工作，钟汉勋任学员班长。学员人数48人。聘请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任课，有语法、听写、会话、翻译、写作等课程。以后伞兵总队迁南京，暂时停课，至1947年春在南京岔路口恢复上课，改聘南京大学外文系陈教授任教。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特别是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在孟良崮全部被歼之后，国民党政府极度恐慌，前方需人紧迫，伞兵留美预备班不久被撤销，学员限期回原部队报到。

第三部分 国民党伞兵的作战

1945年上半年，随着太平洋战局的发展和中國抗战的反攻

形势，国民党军队在美军的配合和支援下，在湘、粤、桂、黔部分地区对日寇转入反攻。为在这地区截断日军后勤补给和部队调动的水陆交通运输线，割裂日军各部队的相互支援，打击其要害部门及首脑系统，以配合战区的战略行动，决定首先使用伞兵5个队，分别空降在日寇占领区后方的湖南衡阳、广东开平和广西丹竹机场地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伞兵二队空降湖南衡阳

1945年6月7日，伞兵二队（中校队长姜健，队附美军少校）在严格保密情况下，全副战斗装备集结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附近的出发位置（在距离部队10公里半径范围内，禁止一切人员、车辆出入，只有队长、队附在起飞前一小时才接受空降作战任务，对其余官兵绝对保密）。以后乘美空军十四航空队的C—46及C—47运输机15架（每架飞机可载24—27人，即两个组的兵力），伞兵队部乘坐1架，6个伞兵分队人员乘坐9架，装载重武器、弹药、器材的空投装备伞飞机共5架。在24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凌晨从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于当日上午9时许，到达衡阳洪罗庙地区（距衡阳50公里，距台元寺25公里，距金兰寺30公里，距白马桥10公里），根据美军情报小组的地面联络讯号空降安全着陆（只有2人扭伤了脚）。

为了侦察了解伞兵队攻击目标的敌人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及防御工事等情况，与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决定将部队集结洪罗庙（大庙）休整待命。

第二天，伞兵派出一个组在公路桥附近，出其不意地击毁敌运粮军车3辆，击毙日军押车士兵6名，缴获全部粮食。

经过两天的战斗准备和休息，于6月11日凌晨2点30分，伞兵二队夜行军4点40分左右到达日军重要据点台元寺的前沿阵地，拂晓（5点左右）向敌发起攻击。其攻击部署是：两个分队迂回到敌后方阵地进攻，两个分队由敌右侧阵地进攻，一个加强分队（含迫击炮、重机枪）正面攻击，一个分队为预备队。当地游击队在敌阵地左侧配合作战。经过两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寇损失惨重，有一个联队被击溃，一个骑兵中队损失过半，近百匹军马被打死、炸死，大批武器弹药被缴获，有200余名日军被打死打伤。伞兵攻占台元寺后，切断了日军从衡阳以南沿零陵方向撤退的后路，对割裂、包围日军起了重要作用。经过伞兵攻占台元寺所显示的战斗威力，使衡阳城内和金兰寺的日军极度恐慌。他们为防止伞兵部队再次空降，就分散兵力，处处设防，打乱了原有的战略部署。

在此战斗中，伞兵二队阵亡上尉分队长周××1人，士兵5人。负伤官兵10余人（其中有2名美军顾问）。

当地游击队，不仅得到台元寺日军丢下的大批武器、弹药、装备，还通过伞兵二队队长姜健与昆明总部联系，给游击队空投了一批武器、弹药和药品，使他们大大装备了起来，战斗力显著提高。

伞兵一队空降广东开平

1945年6月，日寇约20万人由广东阳江方向出发，经开平、新会、沿西江至柳州转贵州与独山的日军会合，企图进攻贵阳。为堵截这股日军，粉碎其会合阴谋，决定使用伞兵一队空降开平，夺取南江口，阻止日军沿西江而上。

1945年6月12日凌晨2点，伞兵一队（中校队长井庆爽、队附美军顾问柯克斯少校）乘美军空军十四航空队C—46飞机13架，在24架战斗机的护航下，于昆明附近的呈贡飞机场起飞，经广西，于上午8时许，按美军情报小组的地面联络信号，在广东开平地区（距开平城3公里）空降着陆（淹死1人，无人受伤）。经过半天的休息和战斗准备，于当晚21点由开平出发，经新会到达罗定。随后步行1小时坐船，再步行1小时到达攻击出发位置，突然袭击日寇重要据点南江口守军阵地，全歼日军1个排，伪军1个连，打死日军33名、打伤日伪军百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日军由于南江口的失守，西江交通被切断，打乱了阳江方向的日军沿西江向独山会合的行动部署和时间。

在此次战斗中，伞兵一队官兵阵亡8名，伤30余人。以后部队折回罗定，直到日军投降后回到广州，又经香港转回南京。

伞兵八、九、十队空降广西丹竹机场

1945年7月3日，国民党伞兵3个队（约600人），乘美军C—46、C—47运输机40余架，在数十架战斗机的护航下，执行夺取敌人丹竹机场，切断敌人空中补给并掩护我空运部队着陆，向敌人占领区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行动。伞兵攻占丹竹机场，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在此次战斗中，日军拚命顽抗，伤亡惨重，击毙日军150名，打伤日军数百人。我伞兵队阵亡23名，负伤官兵100余人（其中美军顾问多人受伤），战斗力损失近1/3。

4个伞兵队担任受降警卫队

1945年8月中旬，驻衡阳的伞兵二队及岗头村的伞兵三、

四队奉命作为何应钦上将的警卫部队，于8月21日下午3时，在湖南芷江接受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的洽降。以后又随何应钦空运南京，负责南京黄埔路原国民党中央军校本校大礼堂（受降会场）的警卫。9月9日上午，亲眼看到侵华日军首脑以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为首的日本侵华战犯一伙的丑恶嘴脸和可耻下场。他们7人身穿军便服，光着头，灰溜溜地进入投降席。冈村宁次面色阴沉，他在受降书上把图章都盖歪了。

1945年9月16日，在昆明岗头村的伞兵五队，作为张发奎上将的警卫部队，参加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受降会场）举行的受降仪式。

有6个伞兵队担任东北九省保安总司令杜聿明的警卫部队

1945年冬，除军官队外，伞兵各大队在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的指挥下，参加了解除龙云职务的战斗。因为突然袭击，战斗只几个小时，双方均无重大伤亡。

不久，伞兵一大队的二、三、四队和伞兵二大队的八、九、十队共6个队分批空运东北，进驻沈阳北陵机场，担任杜聿明的“东北行营”及其本人的警卫部队。

伞兵总队担任沪、宁线警戒

1946年6月，伞兵总队（缺7个队）从昆明岗头村出发，经贵阳、长沙、武汉到达南京，进驻中华门外岔路口营房（伞兵基地）整训。补充大队驻南京大校场担任警卫。军士队留岔路

口训练，其余部队于8月底调往宁、沪驻防，归三方面军无锡指挥所主任陈大庆中将指挥。伞兵司令马师恭任阳澄湖“清剿”指挥官兼苏州城防司令，司令部及各直属队驻苏州城附近。

伞兵第三大队的5个队驻镇江、常熟；伞兵第二大队的六、七队及伞兵五队驻常州、丹阳；伞兵第四大队的5个队驻苏州、昆山、嘉定、南翔。1946年底，伞兵撤回岔路口整训。

1947年初，又奉命派出伞兵第四大队的十六、十七、十八3个队，担任太湖区域的柔山、金坛一线的“清剿”任务。3月撤回南京。

伞兵5个队企图空降延安

1947年春节后，为配合胡宗南10万大军向陕北解放区的进攻，根据国防部命令，派出伞兵补充大队的4个队与伞兵五队，在南京江宁机场和东山镇着陆场，秘密进行模拟训练（假设目标延安）。于3月中旬，在严格保密下，由车运西安机场，归胡宗南指挥，企图空降偷袭延安，因情况变化，随即撤返南京。

伞兵总队组成第三快速纵队、开赴鲁中南作战

国民党军为配合鲁中攻势，企图组成一支快速机械化部队，沿津浦线活动，在鲁南地区机动作战。国防部决定将空军伞兵总队配属坦克、炮兵、汽车和空中支援部队，组成第三快速纵队，开赴鲁中南作战，归徐州“剿总”司令刘峙上将指挥。为吸取

国民党第一、二快速纵队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1947年1月第一快速纵队在山东峰县、枣庄被人民解放军全歼，第二快速纵队在豫北汤阴被人民解放军全歼），第三快速纵队采取了“不攻坚、不守点、不停留、吃掉多少算多少，打了就跑”的高度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作战中，特别重视气象研究和空中支援行动（包括飞机侦察和战斗机低空扫射）。

伞兵总队组成第三快速纵队后，于1947年5月20日左右，在南京市郊汤山，组织了一次陆空联合演习，向蒋介石汇报。当时报纸、电台都作了夸张性的报道并拍成电影。

第三快速纵队的主力，包含伞兵总队所属的伞兵五、六、七队；伞兵第三大队的5个队；伞兵第四大队的5个队及司令部直属队。

配属部队有坦克第一团（随纵队行动的只有两三个连）。该团中校团长蒋纬国，当时兼第三快速纵队副参谋长。榴弹炮团（随快速纵队行动的2个营）、人力输送团（全团三个营、1,400人左右，负责弹药、给养、器材的人力输送及伤员后运等任务）和汽车3个团（有美式十轮、六轮军用卡车320辆左右）、工兵营配（有扫雷、爆破、修建、橡皮舟等器材）、中支援大队（侦察机2架、战斗机视任务机动使用）。

1947年5月下旬，快速纵队主力进驻徐州，在云龙山宿营（大部分人员在徐州体育场住帐篷），当时任务是：以徐州为中心在徐州周围150公里内，应急机动作战。以后，部队沿津浦线进入鲁中南，在枣庄、峰县、临城、成武、金乡、鱼台、滕县、单县、邹县一带，曾与鲁南军区张光中部发生过几次小规模战斗，双方均无重大伤亡。

第三快速纵队在1948年3月以前，全部出动仅有4次。第

一次奉国防部命令解滕县之围：当时滕县守军国民党二十军（四川杨森部队），被华东野战军一、四纵队等包围多日，攻城部队地道已挖到城门边，杨森的二十军据城顽抗，情况危急，派第三快速纵队与国民党交警总队前往解围。因战局变化，解放军主动撤离。伞兵总队只和一、四纵队的后卫部队稍有接触，均无重大伤亡。

第二次全部出动，是奉国防部命令解菏泽之围，因情况变化，中途折返。六月，参加普陀山登陆演习，企图攻占长山岛。

第三次奉徐州“剿总”刘峙命令驰援丰县。当时道路积雪，路面难辨，很多车辆掉进路旁的河沟里。部队从黄口出发，一整夜只走出黄口车站8公里，直到第二天晚上，全部队才进驻丰县县城。由于情报失真，并无战事，伞兵部队在丰县过的春节。

第四次是第三快速纵队参加牛王固战斗。1948年2月，刘、邓大军的十一纵队两个团掩护2000名新兵渡过黄河，南下大别山。第三快速纵队奉命堵截，妄图围歼。1948年2月11日，国民党伞兵前卫部队第二大队在沈庄至柳堤圈附近与解放军十一纵队警戒部队打响。十一纵队放弃沈庄，固守牛王固（大寨子），当晚，伞兵第一大队夜袭牛王固失败。12日上午，伞兵第二大队、三大队从牛王固两翼展开，在榴弹炮营的强烈炮火和坦克连的掩护下，由伞兵二大队七、八、九队3个队向牛王固寨子东北发动强攻，战斗激烈。十一纵队两个团打得十分沉着、顽强，边打、边撤，节节抗击。在黄昏夜幕掩护下，十一纵队往西南突围成功。第二天凌晨，当快速纵队主力、在炮兵、坦克支援下，突入牛王固寨子时，发现解放军早已撤走。此次战斗，伞兵官兵伤亡百余人，其中伞兵七队中校队长

蔡振武及伞兵八队少校队附被打死。

1948年3月，伞兵总队从河南商邱调回黄口改编为空军伞兵司令部后，伞兵三团的骨干返回南京岔路口伞兵基地，分别前往湖南、湖北、浙江、四川等地招考新兵。伞兵一团、二团及司令部直属营留在商邱、砀山一带机动作战。

1948年6月，当华东野战军三纵、八纵、十纵出敌不意渡过黄河，一举攻占开封，全歼国民党整编六十六师之际，蒋介石发动了“黄泛区会战”（即睢、杞战役），调集3个兵团分路驰援开封，妄图围歼华东野战军。

当时，国民党区寿年兵团（含整编七十五师沈澄年部、整编七十二师杨文泉部、独立二十一旅李文密部）特别卖力，部队首先逼近开封，前出睢县至杞县一带。国民党伞兵部队更是趾高气扬，凭着机械化的速度，单军突出到陈留以南活动。而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却很狡猾，部队在鲁西南定陶、单县、虞城一带，向开封缓慢移动，不敢向前。

华东野战军放掉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决心吃掉区寿年兵团。1948年6月27日，第三快速纵队与解放军一接触，就感到来势凶猛，即从通许、尉氏方向回缩，向整编七十五师沈澄年部靠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驻守帝邱店，伞兵一团展开于帝邱店东南，伞兵二团展开于帝邱店东北（整七十五师在帝邱店以东，独立二十一旅在整七十五师左翼）。经过5昼夜的激烈战斗，至7月2日，整七十五师主力首先被歼。独立二十一旅呼救无援（整七十二师杨文泉部已被一纵队分割），随即被歼。当晚，区寿年的兵团部也在龙王庙被消灭。

此时，第三快速纵队妄想突围逃命，无奈势单力薄，只得死守待援。华东野战军于7月2日晚在全歼区寿年兵团之后，

立即向第三快速纵队发起猛攻。经过一夜激战，伞兵第一团阵地首先被突破，伞兵第二团一个营前往增援，拚死顽抗。至3日拂晓，伞兵第二团也被分割包围。在伞兵二团阵地上白刃格斗，战斗极为激烈。伞兵二团团部连首先被歼，至7月3日中午，由于国民党黄伯韬兵团、胡璉兵团、邱清泉整编第五军从帝邱店以东、以南、以北向华东野战军合围。华东野战军在围歼区寿年兵团（歼灭两个整编师，一个独立旅共5万余人）的目的已达到，主动撤出战场向西转移。于是伞兵司令部、各直属营及伞兵第一团、第二团残部得以幸存。

此次战斗，伞兵二团伤亡惨重。该团上校团长郭志持及中校团附梅济南被击毙，该团一营中校营长周益群、三营中校营长赖晋智被俘。仅该团中校副团长李海平及二营中校营长张光汤逃脱。伞兵第一团损失过半，该团上校团长张信卿及二营营长潘荣辉受伤。

第三快速纵队残部从黄泛区撤回徐州后，于1948年8月，取消第三快速纵队番号，原有配属部队被调走，恢复空军伞兵司令部原有的3个团、5个直属营建制。于8月15日，全部调回南京整训，到9月底，伞兵各部队均按编制装备齐全，开始训练。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之后，伞兵一团、二团奉命开赴皖南贵池、铜陵一带，担任“清剿”任务，保卫南京外围。伞兵三团三营（营长李华麟）驻防大校场机场，并派该营八连（上尉连长赵剑星）担任在淮海战场上空投物资（弹药、给养、药品、器材）的任务。曾派兵携带陆空联络电台空降，送给邱清泉部队。

1948年12月，在蒋介石行将“引退”之前，在南京单独召见伞兵司令张绪滋，伞兵3个团长井庆爽、赵位靖、刘农峻，表示特殊器重。他重弹“要继承黄埔精神，发扬当年东征、北伐

的革命气概，重整旗鼓，完成戡乱建国大业，毋负党国期望”等等之滥调。

1949年1月2日，伞兵司令部及所属各部队撤至上海。伞兵一团（上校团长井庆爽）伞兵二团（上校团长赵位靖）驻防浦东亭林、奉贤南北一带，司令部及各直属营驻奉贤。伞兵三团（上校团长刘农峻）驻防浦东三林塘杨思桥、高桥一带，团部驻三林塘。伞兵三团第一营（中校营长钟汉勋）奉伞兵司令部转国防部命令，担任上海北火车站及麦根路车站的警备任务，归上海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管辖，由上海铁道二路（京沪、京杭）守备司令段仲宇少将直接指挥（段仲宇当时任上海港口副司令兼上海铁道二路守备司令中共地下党员）。车站设有执法队，权限很大。警备总部贴有布告，规定对严重肇事者，执法队可就地枪决，轻者立即逮捕，当时执法队长是汤恩伯总部派来的姓何的上校，副队长由车站警备营长钟汉勋兼任。每天从上海北站执勤连派出巡查队（带有执法队臂章）昼夜巡逻。由于铁道二路守备司令段仲宇与警备营长钟汉勋对执法队控制很严（任何情况不准开枪），在执勤期间，虽汤恩伯总部几次命令开枪镇压，但段仲宇司令采用各种方法应付，并与钟汉勋营长密切配合，未发生过任何流血事件或逮捕情况。有几次紧急情况，汤恩伯总部派来的执法队何队长，与段仲宇、钟汉勋见不了面，执勤部队他又指挥不动，气得拍桌大骂，扬言要追查责任，事后都被段仲宇挡了回去。

1949年3月中旬，伞兵各部队（除伞兵三团外）分两个梯队从上海海运福州。伞兵三团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策动下，由伞兵三团中共地下党支部直接领导，于1949年4月13—15日在海运福州途中转向北开，到达连云港起义。

国民党伞兵三团起义的前前后后

钟 汉 勋

一、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伞兵三团中进行策反工作

1947年至1948年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时机和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伞兵内部进行瓦解和策反工作。当时的策反对象主要是伞兵三团。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帮助下，国民党伞兵三团上校团长刘农峻、中校团附李贵田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团部电台台长许成生和一些班、排长及士兵，也都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参加了伞兵三团起义的各项工作。

从1949年2月开始，策动国民党伞兵三团起义的工作，统一由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领导。

二、起义的组织领导和行动计划

1949年2月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得到了国民党伞兵要南撤闽、台的情报以后，确定了组织伞兵海上起义的计划。成立了伞兵三团地下党支部，组织伞兵起义的工作。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与伞兵三团地下党支部研究了起义时船上力量的组织、对船上要害部位的控制、登陆点的选定以及遇到

紧急情况的措施等。并确定了向起义官兵宣布的政策：第一对支持起义的官兵绝对保证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第二到达解放区后，仍按原职原级使用；第三在蒋占区的家属，造具名册地点，由上海党组织尽量设法予以照顾。

三、伞兵三团起义

4月10日下午，刘农峻团长召开了伞兵三团连长以上军官会议，宣布了开拔福州的命令，并把部队的集结时间、地点以及离沪的有关事项作了部署。同时指定陈家懋（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中校主任）、李贵田负责检查船只和登陆艇的装载计划，任命周其昌（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孟虎（均为中共地下党员）为船上纠察队的正副队长。

4月11日上午，李贵田同志去招商局办理了船舶手续。随后李、周、陈同赴黄浦码头登上102号登陆艇作了细致地观察和周到的部署，对船上的重要部位和交通要点，都考虑了必要的控制办法。当日下午，陈家懋和白力行、武成迹又去102登陆艇，进一步作了观察和研究。

4月12日，伞兵部队的车辆、行李、粮食、成箱的弹药、装具、行军床等笨重物资，按装载计划在登陆艇上安排就绪。团部通讯连从船底到船上都架了电线。

4月13日上午，各连营在黄浦码头集结完毕，全团在码头广场上举行会餐，刘团长公布中校团附李贵田为航行指挥官。接着李贵田宣布了船上纪律：第一，全体官兵按指定位置休息，不准随便走上甲板；第二，士兵的手榴弹由各连军械上士集中装箱保管，防止走火伤人；第三，各人携带武器，不准装填子

弹；第四，各营、连轻重机枪、迫击炮及成箱弹药，一律放置舱板下面；第五，船上风浪很大，不要集中活动。饭后，按一、二、三营及团直属连的顺序上船。各营副营长以下安排在最底层的坦克舱；团直属连安排在二层舱内；全团家属在船尾部的小舱；陈家懋与军械处以及由周其昌、孟虎领导的纠察队住在甲板上的大厅（会议室）刘团长住船长办公室，李贵田与三个营长住在二层舱的小房内。30余部汽车及汽油桶安放在甲板上面。经过这样安排，船上的重要部位和交通要点，都在地下党员和纠察队的控制之下。

满载着伞兵三团2,500余人的中字102号登陆艇，于4月13日下午2时从上海启航南进，下午5时许通过吴淞口，7时左右出了长江口，晚8时登陆艇已到花鸟山岛附近的海面上。李贵田拿着“着伞兵三团立即增援青岛，国防部三厅”的假电报，找到登陆艇林船长，提出改开青岛的要求。经过一番周旋，中字102号登陆艇掉转船头向北航行了。

随后，在刘团长房间里召开了营长以上军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团长姜健，三个营长钟汉勋、杨鹤立、李敬宾，团附李贵田，司令部军械处主任陈家懋。刘团长拿出假电报说：

“国防部命令伞兵三团立即增援青岛。”因事出突然，副团长和三个营长思想毫无准备，对电报存有怀疑。此时刘团长将电台台长成许生找来，将来电密码及译稿让大家阅读。有人提出：“去青岛的任务是什么？”刘答：“任务不明。”这时副团长和几个营长都觉得国民党驻青岛部队已纷纷南撤，伞兵司令部及伞兵一、二团早已撤至福州，为什么伞兵三团要单独去青岛呢？疑虑未解。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就不再提问了。刘团长最后要求立即按国防部命令执行，回去后要注意稳定军

心，掌握好部队。

从4月13日晚8时到14日晚8时，登陆艇一直朝青岛方向航行。在此期间，船上许多人心事重重，坐卧不安，到处窃窃私语，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条船可能是重庆号第二。”有的说：“这条船去青岛是假，可能投奔解放区。”有的说：

“刘团长已被人软禁起来了。”特别担心的是带有家属在船上的人（当时姜健副团长一家6口都在船上），怕一响枪，全家都死在船上。更多的人为到青岛后的遭遇担忧。当时有许多连长在三个营长住的房间外来回走动，想探听一下营长的情况和想法。但三个营长只是睡觉，对船开青岛的问题，保持沉默。多数官兵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早已不满，继续跟国民党走前途无望，对船开何处，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4月14日下午4时左右，刘农峻团长在船上小会议室召开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会上刘就部队到青岛去的问题谈了些想法。他说：“现在青岛形势紧张，如果部队到青岛，那就会欲进不能，欲退不得，陷入了死胡同。考虑到船上的2500余人的身家性命，有的人还带有家小，到底怎么办？”又说：“共产党已派人来联系，欢迎我们起义去解放区，请大家表态。”大家沉默了许久，有人问：“共产党的代表在那里？我们想见见他。”刘农峻指着陈家懋说：“陈处长就是。”这时陈家懋站起来说：“我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伞兵三团起义去解放区。”陈要大家认清形势，摆脱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参加人民伞兵，到解放区后仍按原级、原职待遇等等。随后一些营、连长就起义有无把握、政策能否兑现、部队到解放区后会不会缴械投降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都由陈家懋、李贵田、刘农峻等同志作了解答。会议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刘团长最后宣布决定全团起

义。

会议以后，李贵田立即向102号登陆艇全体船员宣布伞兵三团起义的决定，希望他们予以支持。并向他们讲明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除有个别人犹豫外，绝大多数人都表示与伞兵三团一道投奔解放区。

4月14日晚8时，中字102号艇改变了航向，折向西北航线开向解放区的连云港。在午夜12时左右，船上雷达发现两只黑点，距102号约60至80海里。根据两方船速差计算，在4小时后可接近我们。因当时情况不明，地下党支部研究决定由纠察队作了应急战斗准备。一小时之后，雷达上的黑点消失，这两艘舰艇向上海方向开走了。

4月15日清晨，官兵们起床到甲板洗漱。李贵田把油印好的伞兵起义宣言发到了他们手中，大多数人已有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意外，只有少数人看到宣言后有些沉默，营、连长之间也互相猜疑。不少人还听说：“船上埋有炸药，起义不成，要同归于尽。”因此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4月15日6时许，登陆艇开进了连云港。此时，刘团长召集排长以上军官在甲板上开会。刘农峻和陈家懋再次讲明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并要求传达给士兵，带好自已的部队。上午8时，陈家懋和地下党支部书记周其昌下船联系，找到了连云港政府与驻军负责同志，商定了部队上岸的有关事宜。不久，由港口放来一条舢板，载着一名水手，将中字102号登陆艇引进港内靠岸。由李贵田指挥，按团部、直属连、一、二、三营的秩序，携带各人武器、行李，在连云港市政府前面广场上集中架枪休息。随后，船上的车辆、装备、粮食、弹药陆续上岸。至此，在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

策动的由伞兵地下党支部直接领导的国民党伞兵三团海上起义，取得了伟大胜利。使一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脱离了苦海，获得了新生。

四、伞兵的新生

1949年4月15日上午，起义伞兵到达连云港后，受到了中共新（新浦）海（海州）连（连云港）特委和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特委负责同志苏羽、警备三旅陆主任，连云港市长王允吾等同志来到港口进行慰问，对伞兵三团举义旗投向人民的英勇行动，表示高度赞扬。他们准备了茶水饭菜，使起义官兵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下午3时许，起义伞兵乘火车于暮色中到达新浦。4月16日上午，特委书记谷牧同志听取了陈家懋、周其昌的汇报后来到团部，对伞兵起义倍加慰勉。4月18日，特委在新浦召开了党、政、军、民数万人的欢迎大会。由谷牧同志致欢迎词，并向起义伞兵全体官兵发了慰问品。起义官兵在会上向全国父老发表了起义声明。向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其电文如下：

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

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遭受着国民党四大家族统治阶级的压榨而颠沛流离，我们亲眼见到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深深地感到苦闷。我们为使反人民的残酷战争早日结束，永久的和平早日来临，正当我们调防福州的时候，全体官兵认为这是我们脱离腐化集团统治的大好机会，在热血沸腾的情绪下毅然起义，于4月15日安全进入解放区。今后我们愿竭尽我们全体官兵的智能，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树立国防新生力量的人民伞

兵，建设民主繁荣幸福的新中国。

伞兵第三团 团 长 刘农峻
副团长 姜 健 率全体官兵

4月18日

4月28日，新华社报道了伞兵起义的消息。

5月18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起义伞兵，倍加慰勉。
电文如下：

刘农峻团长，姜健副团长并全体官兵们：

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1949年5月18

1949年5月初，起义伞兵部队由新浦移驻海州。由特委派来了袁风仪、宫建国、祝启慈、廖锡三等10多位同志帮助工作，加强了起义部队政治思想教育的领导。在这前后，起义部队虽发生过一些问题，但都无关大局。部队起义后不久，停在连云港内的中字102号登陆艇被国民党飞机炸伤。在海州，国民党飞机曾几次到新海连地区上空盘旋，每次4架，曾散发过反动传单。5月上旬，伞兵三营的一个副排长带领一个班携带轻机枪、冲锋枪深夜向青岛逃跑，次日凌晨被民兵截回。另一次有几个排长（各营都有）他们串通一气，利用营、连长下午在团部开会时，准备好了武器、弹药、干粮，计划深夜带兵向青岛方向逃跑，后被发觉未能得逞。5月下旬，根据个人志愿，

对愿意离队返乡的官兵分别发足了路费、生活费离开了部队。不久，起义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命名为华东伞兵训练总队，归华东军事政治大学领导。进行整训后，部队面貌为之一新。

1949年10月初，奉第三野战军前委命令，伞兵训练总队调往南京岔路口营房，编为华东军大第七总队。原伞兵三团团长刘农峻任七总队总队长，军械主任陈家懋任教务处长，一营营长钟汉勋任训练股长，孟虎任保卫股长，团附李贵田任第二大队大队长，三营副营长周廷琦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原伞兵三团的连、排长分别任中队长、区队长，士兵一律编为华东军大学员，作为干部培养。

起义伞兵经过华东军大一年多的军政训练，政治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提高很快。很多战士加入了共青团，不少积极分子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在华东军大全校的军事、体育项目检阅中，七总队不少项目都名列前茅。

1950年8月，为建设我军第一支空降兵部队，由刘农峻同志率领干部李贵田、钟汉勋、周廷琦、曾甲武等30多人，战士350人充当技术骨干到达开封空军陆战一旅。10月10日军委任命朱云谦为旅长，刘农峻为该旅参谋长，以后刘任空军陆战一师、伞兵教导师副师长，1963年转业到湖南省体委任副主任。李贵田任该旅司令部教育研究组组长，后调任中南空军伞训主任，1958年转业到宁波任四中校长、宁波机械工业学校副校长。钟汉勋、周廷琦、曾甲武均任空军陆战一旅、空军陆战一师、伞兵教导师司令部教员。钟汉勋1956年转业到山东省体委任国防体育科科长，曾甲武1956年转业到上海市体委任跳伞俱乐部主任，周廷琦转业到湖北沙市体委工作。其余干部，均任空军陆战一旅、空军陆战一师、伞兵教导师各营、连的军事教

员，于50年代后期，陆续转业到地方担任国家干部。

1950年秋末，有800余名起义伞兵（华东军大学员）调往九兵团开赴朝鲜战场，不少人任排长、文化教员，在抗美援朝斗争中，立下了战功。其余在华东军大七总队的起义官兵，编入华东军区教导总队充当骨干。孟虎任教导二团警卫营教导员，原伞兵连长唐宗善任警卫营连长，王建庭任警卫营参谋、学员中队长。原一营副营长熊弼调到总高级步兵学校任教员。编到教导总队的其他官兵都是基层骨干。

在党的正确政策感召和指引下，在党的亲切关怀和培养教育下，几十年来，这支当初的伞兵起义部队，不少人已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和先进模范人物，为祖国、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目前大多数人年过半百，少数人早逾花甲之年，但凭着一颗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赤子之心，仍然奋战在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上，为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积极贡献余热。

吴佩孚的晚年生活

王 振 中

吴佩孚在1939年12月4日，为保全民族气节，不愿投敌事伪，被日本人拔牙时，害死于现北京东城区什锦花园胡同14号家中。终年65岁。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明令褒扬，给治丧费1万元。並派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代表他举行国葬仪式（从前暂厝拈花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陪祭。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杨森，专程来北京吊唁、抚棺大恸。当时通衢要道，均设有路祭香案。丧葬典礼，极为隆重。李宗仁派副官长李宇清代为送葬执紼，华北各国民党军政要员，均参加送葬。冯玉祥、何应钦等人亦派有代表参加。纸糊冥器、铭旌、乐队、彩亭、香幡、纛旗、挽联，以及僧（广济寺和尚）道（白云观道士）、番（雍和宫喇嘛）、尼（净土庵尼姑）的笙管齐奏、鼓号齐鸣的四坛经。再加上80名杠夫，抬着吴的棺柩，以及送葬的长列马车、汽车；里面坐着送葬的女眷、至亲；以及吴过去部下的女眷。再加上送葬的军警、宪兵的队伍，浩浩荡荡，前面的队伍已到了西直门，后面的马车却还在东单呢。惹得北京人万人空巷，扶老携幼的停立在马路两旁看热闹，说是八十年来很难见到的大出殡。

吴佩孚的儿子吴道时（吴无子，系侄过继），和我甚熟。我幼年喜拉二胡，吴道时亦喜皮簧，能唱不少老生戏。性之所

近，暇时即去其什锦花园家中为其操琴。茶余饭后，每道其父1926年北伐战争失败后的晚年生活；和其本人之郁郁不得意。並曾在书房中看过一些有关吴佩孚本人的文章、书法、绘画，以及所保存的和吴佩孚的交往文字等，故略有所知，叙之于下：

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举足轻重。当其全盛时期，虎踞中州洛阳，拥兵50万，并有飞机可以助战；固一世之雄也。当其大办50岁生日时，海内冠盖云集：奉觴上寿。康有为亲手书赠吴一联云：

牧野鹰扬，百世功名才一半；
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

可谓之誉扬备至。

吴之前半生刚愎自负，野心极大，频年转战南北，想用武力统一全中国。中经湘鄂、直奉、榆关、联军、武汉各战役，大小数十战，疲于奔命。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合作下，进行北伐战争，势如破竹。民心所向，北洋军阀的军队望风披靡，汀泗桥一役，叶挺将军当时任团长，身先士卒，攻克武汉。吴以疲惫之师，不能当新羁之马，遂一蹶不振，势穷潦倒。所部主将，或降或逃，使吴众叛亲离，彷徨无路。在南北夹攻情形之下，败逃南阳、襄樊、宜昌，后到了鄂蜀交界的巴东，这时吴的部众尚有两千多人。吴佩孚感到天地之大，没有他容身之地了。他突然想起了在四川拥有重兵的杨森来了。原来四川军阀内战时，杨森曾被逐出川，败逃到川鄂边境，吴佩孚给杨森以大力支持，给了他北洋政府中央军第十六师师长的名义番号，给杨充实军械，收集残部，伺机反攻。后来杨森在吴佩孚的帮助下，得以重返四川。现在自己穷途末路了，何不暂时到杨森那里托庇一个时期呢。先通过了冯玉

祥部下第三十八路总司令张联升的防区，和鄂西山区的土匪啸聚的山林，使吴受了不少的虚惊。杨森当时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驻防四川万县一带。吴派参谋长张方岩和杨联系，要求入川。杨森想到自己在1922年6月，四川军阀内战时败退鄂西。由于得到吴佩孚的支援，幸未全师遭到覆没之恩，遂毅然排除部下反对意见，决定接吴进川，表示容纳欢迎之意。电令驻防巫山的旅长白驹（红岩中的白公馆，即其故居），供应粮食衣服，善为接待，并亲往迎接。杨森对吴佩孚说：“我已将玉帅入川之事，拍电报报告了蒋总司令。”吴除对杨森表示万分感谢外，并向杨表明，决不作任何政治活动，並要向全国通电表明心迹，自己是入川游历，不问政治。吴佩孚入川后，先住在奉节县白帝城，后又移居到万县西部杨家花园。这时的吴佩孚的日常生活，除去写字读书之外，对国事不发一言，曾自撰一挽联云：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但吴的影响和目标太大，不免还有些失势下台的军阀政客去拜访他，鼓动他东山再起，他们好从中渔利，吴均严词谢绝。在四川奉节居住期间，日本军方特派日本海军驻上海的特务机关长秀藤大佐，和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专程来访，愿意给吴步枪10万只，山炮500门，机枪2000挺，借款100万元，佐吴再起。吴如同意，连同弹药，即由兵舰分批运川。吴对秀藤、荒城两个日本人说：“我过去有枪不只10万，有钱不下百万。结果，我还未能成功。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即

天下事之成败利钝，并不在乎手里有多少枪、多少钱。中国人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管。外人盛意，我敬谢不敏。”秀藤等见所谋不遂，只得碰了一鼻子灰回去覆命了。

吴佩孚避门谢客，不愿再参闻国事，又移居四川北部的大竹县。半年后，四川军阀混战又起，刘湘赶走了杨森，邓锡侯部罗泽周乘机攻占大竹，吴佩孚的卫队被缴械，吴又转移居住到绥定的和河市坝大兴寺庙中。身边除百名卫士，和少数幕僚外，已无可战之兵了。

1930年中原大战，冯、阎、汪、李联合反蒋。蒋介石在双方势均力敌之下，请吴到南京去“共商国事”。一方面表示蒋不念旧恶，一方面想利用吴的声望。但吴佩孚为王陵基所阻，禁止吴在万县过境；使吴无法在长江登船而下，只得重返大兴寺。吴从1927年入川，到1931年离开四川到甘肃。以后，由甘肃到内蒙包头等地，步行绕道长城以外，吴夫人张佩兰也骑着骆驼随行。至包头时，始知日军已向东北进军侵略，吴当即兼程东下。时左右多加劝阻，谓入北平与入虎穴何异。吴当即拍案而言曰：“如此，我才不致受人包围也”。1932年1月到了北平。车抵北平时，张学良在车站迎候。吴劈头便问东北消息，张据实以告。吴大声叱张说：“国仇你不报，私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竖起了。”接着又说：“你怕抗，我帮你抗。我不是为名为利。我左手拿回东三省，右手交给你。你有仇不报，笑话！”后来吴和张除作两次礼节性的拜访外，从此遂不再见张。

吴佩孚晚年的生活寄居北京，情景如何，关系他一生的名节。吴的思想封建陈腐，不读新书。对于现代的政治经济一窍不通，对于有进步思想的人才，既不愿意接近，也不肯罗致。但在沦陷中的北京城，他应付环境的艰困与意志，却是他一生

作人最好的收场。1936年11月，段祺瑞病死上海，吴的挽联是：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

爱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吴既叹死者，又复自伤；发泄胸中块垒，愤懑不平，性格倔强如昔。吴的江山好改、禀性难移的本色，也在联语中表露无遗。可是此联的上款写的是：“慧本教统归真”，

下款则写成：“同门学生吴智玄拜挽”。

这是吴佩孚根据乩坛所谓“祖师爷”授受的称呼。我见到不少失意下台的大军阀官僚们，晚年无聊，皈依道佛，都好和“神鬼”混在一块。吴虽性格倔强，也走入这一歧途。这是当时社会病态的一种表现。吴佩孚书房中，曾遗留朝夕手不释卷的《吕洞宾文集》一部。用黄缎团花面为皮，红丝线嵌边。另外，还有一套《金刚经》。据吴道时说，其父“先信奉道教，后来又跳出圈改信起佛教来了。回到北平以后，给袁世凯当过步军统领，曾经代理过几天国务总理的大汉奸江朝宗请我父亲当北平悟善社的社长。社内分设乩坛，一月好几回，互相唱和不辍。”

平津刚沦陷时，江朝宗任北平维持会会长，欢迎日军入城，吴佩孚即和江断交，并且大骂他说：“你年纪比我大，乃当日本人走狗，卖国求荣。真是白发苍苍，老而不死。”遂与江朝宗永绝，不再往还。

吴佩孚出身清代秀才，但缺乏固定信仰，因之本人思想常在游离。读了《吕洞宾文集》，便信道教，再看《金刚经》，

又改信佛教。过了些时，加入旁门左道式的会道门“悟善社”，却又信起迷信扶乩来，这些都是反映他本人思想游离，走入迷信的深渊。吴晚年日常生活，不过是念经、写字、吟诗而已。常和家人说：“生活不成问题，家中尚有几亩田，中央每月补助3000元。这个年头过得去，已是福气了。”

吴佩孚又经常给北京各店铺写匾，解放前，东西南北四城，吴的门匾颇多，下款多写“子玉吴佩孚”，匾额中间则盖有“孚威上将军印”汉隶大章。

1938年秋，武汉沦陷敌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逃往重庆。日本在北平成立以大汉奸王克敏为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督办”兼“华北绥靖军总司令”大汉奸齐燮元，在日本特务土肥原、杉山等授意下，劝吴佩孚下水当汉奸。吴屡拒日本人的诱迫，大义凛然，杉山到北京时，吴问张燕卿说：“杉山这家伙，是几时做大将的？”张回答说：“大概在两、三年以前。”吴说：“哼，咱40岁即做大将了，还是民国的初期呢，到现在差不多30年了，想来杉山确实是后辈啊！”吴常和家人说：“我不能禁止人威逼利诱我，但我决不受人威逼利诱。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吴在环境险恶沦陷中的北平应付环境，坚决拒绝日伪的劝驾。日军司令坂西，劝吴和汪精卫合作，出任伪军部长官，统治华北五省。吴答称：“日本既需要和平，何不先行撤兵，向国民政府议和？”坂西说：“这在现时，还办不到。”吴便说：“既办不到，何必找我？”此外，汪精卫派陈中孚来北平，劝吴与汪合作。吴答曰：“汪先生既口口声声提倡和平，又欲自建伪南京政府，可说是捣乱分子，我何能和他合作共事。”

吴佩孚不仅不怕硬，并且也不吃软，更不会中任何人的巧言

令色和谄媚。1937年10月土肥原曾竭其谄媚之能事，再三恳求吴说：“请大帅救救日本，出来主持中国国事。”吴当时即不客气斩钉截铁地答复说：“我是中国人，我该先救救中国。”

土肥原在北平，逼吴佩孚出来，並拟通电主和。一副官持土肥原所拟电稿给吴看，吴扔在地上说：“是谁拟的，难道我这里还没有人会拟电文么？”立呼左右，把秘书长陈廷杰喊来。陈廷杰早已被日本人给收买过去了，陈不置可否。吴遽起入室，表示拒绝。吴故意向土肥原提出先撤兵后谈和，并须日方亲赴重庆，商得国民党政府同意，僵持数日，迄不能决。日方允先撤出北平，以为就伪职条件。至于武汉前线，必须等吴就伪职后，亲往武汉缓冲，日军始能逐渐撤退。吴深为不满，乃允先招待中外记者，意图借此表明他本人坚决抗日拒和的态度，以断绝日方幻想。吴当日在家招待中外记者，大意说的是：“恢复和平，必须是全面的和平，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故必须日本先撤兵，然后和重庆政府商谈全面和平。”一面让他的秘书丛大经翻译成日语，又散发所著的《大丈夫论》小册子给中外记者，招待会就算是结束了。日人大为惊恐，就歪曲捏造假的翻译，交各报社发表，并封锁外国记者的消息，闹得一时真假难分。事隔数日，日方马脚全部露出来了后，土肥原承认失败，备受训斥。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牙疾又犯，右颊肿痛，不能饮食。日方见拉吴无望，由日本特务川本介绍日本医生须藤、秩田为他开刀拔牙将吴害死于家中。

国民党济南空军与宪兵的一场冲突

黄 倜

1947年春，国民党统治下的济南，发生了一场空、宪冲突事件。这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一个身穿军装的国民党空军场兵，大摇大摆地想走进大华电影院看电影。正在电影院门口值勤的两名国民党宪兵向前查询这个空军场兵的电影票。因为这个场兵没有买票，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起来，结果是空军场兵挨了宪兵一拳后灰溜溜地逃跑了。他一口气跑到胜利大厦空军招待所，找到值星官诉说被打经过。达个值星官听了后，一气之下带着被打的场兵，直奔大华电影院而去。官兵两人到电影院后经过一番舌战及武斗，仍寡不敌众，其中有一名宪兵用枪上的刺刀背把这个空军值星官的颈部皮肤磨破。就这样，一场战斗的序幕拉开了。负伤的国民党空军值星官，甩下场兵，一口气跑到济南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司令官的办公室，口称要找王耀武解决问题。这天晚上约9点来钟，王耀武正在开会，接见值星官的是王耀武的秘书。这个秘书经过一再赔礼道歉才把这个空军值星官打发走了。等到王耀武开会回来，秘书向他回报了这件事。王耀武拿过“来访”空军军官的名片一看，立刻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棘手。挨打的这个空军不是一般的军官，而是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飞行员，飞行员竟然挨了打，这确实是个不好处理的问题。王耀武为了平息此事，当晚决定第二天派济南城防司令吴斌携带慰问礼品，到机场慰问

受伤飞行员。

第二天清晨刚一上班，一辆小轿车后边尾随着一辆卡车，上面满载着苹果、桔子、烟、糖、罐头等，向国民党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济南指挥所的办公大楼驶去。到达后，吴斌司令吩咐士兵将沉甸甸的慰问品一筐一筐地抬到楼上，自己步入二楼会客室，开始向驻济空军赔礼慰问。接待吴斌司令的是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第三处副处长、空军中校苑金函。空军济南指挥所是个临时机构，没有正式编制，由北平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处级以上负责军官轮流来济执勤。苑金函是当时指挥所的负责人，代表北平司令部指挥驻济空军各单位。

在吴、苑谈话过程中，驻济空军二十八中队的一部分飞行员，两三人一伙，抬着吴斌送来的慰问品，有的到二楼办公室的后门外，有的登上三楼的晾台，如同荷枪负弹的战士，个个严阵以待。苑金函把吴斌送到楼下，还没等吴斌打开车门，从二楼和三楼上铺天盖地的一筐筐慰问品从天而降，朝着吴斌的小轿车砸下来。这时候吴斌什么也顾不得了，两手抱头，钻进车厢一溜烟地逃跑了。

这次行动意味着一场战斗即将开始。苑金函送走吴斌以后，大约上午9点左右，他下达了命令：凡驻济空军官兵坚守岗位，一律不准外出，违者以军法论处；命令汽车五中队准备10辆卡车，刷去军号及车门上的空军二字，开到指挥所门前听候调用；命令空军济南油弹库准备步枪200支，轻机枪10挺，每辆卡车配备步枪20支，轻机枪1挺，命令济南空军站挑选场兵220名，每人操持1支步枪，两人操持1挺轻机枪；命令空军二十八中队派飞行员10名，机械士10名，每辆卡车各分配1人，负责指挥作战。

冲突是因为宪兵打伤了飞行员引起的，攻击的目标理所当然还是宪兵。国民党宪兵在济南驻一个营，营部设经二路纬二路；负责大华电影院等地值勤的连部驻经二路纬五路。于是确定攻打营部、连部及大华电影院三处。当时苑金函对“敌情”的判断是：宪兵在大华电影院一定是有所准备，故对10辆作战卡车的分配重点放在大华电影院方面，决定派4辆卡车攻打大华电影院，各派3辆卡车攻打营部和连部。下午6时，10辆作战卡车从济南西郊机场急驶市区。

正如苑金函所分析的一样，驻守在大华电影院的宪兵确实作了准备，他们搞了个三角形的防御工事。大华电影院二楼放映室上架设了机枪；对面的海岱旅馆的房顶上也架设了机枪；在西北方的北洋大戏院的屋顶上也架设了机枪。空军的4辆作战卡车到达大华电影院门口，还未等车辆停稳，操持机枪的两名场兵就把板机一扣嘟嘟嘟地朝大华电影院放映室的窗口射去，立刻打死打伤了6、7名宪兵。由于空军场兵原来都是从高中生招募来的，平时缺乏操练，一下子把机枪子弹都打光了，他们高声呼喊：“没子弹了！没子弹了！”司机一听急中生智，放大油门，加快行驶，从经一路西拐，一溜烟地跑回飞机场。在空军动用真枪实弹并打死打伤宪兵的情况下，宪兵也进行了反击。当时三处房顶上的机枪都是朝高空打的，当发现空军朝人打时，他们立即调转枪口，但是空军的汽车早已逃跑了。大华电影院的这场战斗空军获胜而归。袭击宪兵营部的3辆卡车，到达营部以后，如入无人之境，撞进门去见什么砸什么，连小墨水瓶也没留下，砸了个乱七八糟，凯歌而归。袭击宪兵连部的3辆卡车到达经二路纬五路连部以后，打昏了门岗值勤宪兵，冲进连部院内，在宪兵连的院子里发生了激烈的肉搏战，经过一

段时间的战斗，空军的两个指挥员被逼钻进了一道墙旮旯。这时从房顶射来了子弹，结束了这两个空军指挥员的性命。空军场兵们在混乱中抢来尸体扔上卡车，拚命逃回飞机场。

连部战斗中的惨败，使指挥官苑金函的笑容一扫而光，他布置了如何停放尸体以后，大步流星地迈进自己的办公室。约10分钟后，手中拿着亲自起草的一份电报稿，交给译电人员，吩咐用十万火急的速度发往全国所有空军单位，把驻济宪兵打死我飞行员、机械士的事件通报全国。电报发出以后，支援战斗的复电连夜如雪片飞来。驻上海、重庆、西安、沈阳等地的轰炸机、驱逐机、运输机的作战部队都在来电中表示：不解决济南问题，决不起飞作战。所有空军场站也来电表示全力支持。一时间全国空军掀起了总罢工浪潮。

山东战区的莱芜战役，这时正在激烈进行。要求空军出动助战的电报，从莱芜战场上如雪片飞来。空军指挥官苑金函接到手里，连哼也不哼一声，顺手扔进字纸篓。

几天来驻济空军人员，守在机场，谁也不敢进城。城里制造的恫吓消息，一阵阵朝飞机场吹去。有的说宪兵联合了七十三师，准备攻击飞机场；也有的说宪兵已经越过十二马路卡子朝飞机场进发。负责飞机场警卫任务的八十四师吴化文，一再向空军表示，保证空军安全。为了打击对方，空军二十八中队阳永光中队长，打算驾P—51飞机，对驻济宪兵营地进行轰炸。他这个计划没有得到苑金函的同意，所以也就没有行动。

空、宪冲突后的第二天上午，一个身穿黑色毛哔叽西服、戴着眼镜、礼帽、提着手杖的高级人物，乘坐一辆黑色小轿车，来到空军指挥所，刚上到楼梯中间，正好遇上苑金函从楼上下来。两人相遇后，苑问：“你是哪里的？”这人递过名片，

苑金函二话没说，居高临下一抬脚，把这位高级人物踢下楼去，口中还自言自语地说：“有你什么事，你来干什么！”这位高级人物挨了一脚，爬起来登上汽车逃命了，后来在楼梯上拾到这个人的名片，才知道他是大华电影院经理。冲突发生的第三天下午，一架民航飞机在机场降落，一位少将衔的宪兵团长走下机舱后直奔空军指挥所办公大楼。在二楼会客室里，团长一股劲地向指挥官表示歉意。在双方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中，团长以责备自己的口吻说：“我们宪兵对绥靖地方的任务尽职不够。”谁知这句话惹起了苑金函的反感，他把桌子一拍，声色俱厉地对团长说：“你们绥靖地方？呸！那么由你们绥靖地方吧！我们马上撤走。”团长自知话又说错了，只好赔礼，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团长只好告辞。

事件至此并没有结束，全国空军仍在继续罢工。事情的严重性，已经发展到非蒋介石亲自过问不可，他命令陈诚负责处理。胆小怕死的陈诚从南京到达徐州以后，不敢继续北上，他坐镇徐州往济南发来一封电报，电报是由空军转给王耀武。电报大致内容是：“奉总座谕：限期解决济南空、宪冲突。接电后立即着手处理，并将处理情况电告。”电报转到王耀武手中以后，王耀武很快来到机场，与苑金函协商解决办法。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研究，最后陆空双方达成的条件是：（一）由济南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优厚抚恤死亡飞行员和机械士的家属，并发给烈士证；（二）驻济宪兵调离济南，由青岛宪兵营来济接防；（三）济南的陆、宪、警纠察队都不得检查空军人员，空军自己组织纠察队，负责对所属官兵进行检查监督；（四）济南各娱乐场所都设空军招待席招待空军。达成以上协议后，王耀武向徐州陈诚作了回报交了差。驻济空军也向全国空军发了通

报，恢复了正常活动。

事件平息后一个月左右，国民党南京空军总部公布了因掀起空宪冲突事件，给苑金函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同时将济南指挥所由归北平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领导，划归为由汉口空军第四军区司令部领导（半年以后，又重归北京二军区领导）。

苑金函一手制造了这么一场严重事件仅给予记大过处分，这里边是有缘故的。苑金函是河北保定人，抗战时期航校毕业，分配到驻重庆部队担任见习飞行员。一天，只有苑金函一人在机场的时候，忽然接到空中电报：蒋介石乘飞机由成都返重庆，途中遇到三架敌机，命令重庆空军起飞营救。这时苑金函独自一人驾起P—51飞机腾空而起迎战敌机。敌机被苑金函击落一架，其他两架狼狈逃窜，蒋介石得以安全返回重庆，但是苑金函的飞机在空中受伤，苑金函跳伞，在跳伞中把脸腮部撕破。苑金函因救驾有功，青云直上，步步高升，由见习飞行员很快担任了分队长、中队长、空军第三大队大队长等职。驻济南的空军二十八中队是三大队的隶属队，二十八中队的飞行员挨了打，这个顶头上司要出来争这口气，再加上他救驾的政治资本，所以才导演了这场冲突。

封面题字：高启云

封面设计：鲁鸿恩

ISBN 7-209-00097-6 / K · 12

统一书号：11099 · 343 定价：1.29元